



2005 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

一. 安徽省*

(一) 合淮阜高速公路发掘地点:

合淮阜高速公路自合肥经过长丰、淮南、寿县、凤台、颍上止于阜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沿途各市县文物单位的积极配合下,发现了从新石器时期遗址到战国、汉代以及宋代和清代的墓葬等大量遗迹遗物。2005年9月至12月,对其中位于高速公路路基内的墓葬和遗址部分进行了清理发掘,经过初步整理,主要收获有:

1. 淮南市九里战国及两汉墓地

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唐山镇九里行政村东南50米,共清理古墓葬236座,出土各类文物600余件。

战国晚期墓20余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近直,底平坦,墓向多为南北向,墓室长2.8~3.0、宽0.8~1.8、深2.8~4米不等,均为单人葬。葬具为木制的棺槨,基本上都是一棺的小型墓,一棺一槨的较大的墓葬只有一座。人骨保存较差,葬式不详。随葬品多置放在墓室的一端,其种类有陶器、铜器和玉石器等。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盘、罐等;铜器主要是剑、戈、镞、矛等兵器,盖弓帽等车马器和小型饰件铜镜、带钩等;玉石器为玉牌饰、玉环、玉饼等。

汉代墓葬约二百座,主要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砖室墓10余座。墓口长2.8~9.6(包括墓道)、宽1.30~3.5、深3~6米不等,墓向180至360度。这类墓多无墓道,深至一定深度时内收0.30至0.50米形成二层台,未见夯打痕,葬具为木棺,保存较差,仅见棺痕,保存稍好的棺由盖板、档板、壁板、底板四部分组成,棺外有朱砂痕迹和模糊图案。随葬器物置放在墓室的一端或一侧。随葬器物种类有铜(铁)器、玉石器和陶器等。铜器有剑、洗、镜、带钩、矛、钱币等;玉石器有环、璧、耳饰,琉璃器一件,玛瑙器二件以及石璧、黛镜等;陶器组合为钺、壶、敦、杯、匋、盘、匱、灶、井、圈,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俑。

该墓地发掘为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文化面貌和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家族墓地的分布、形制、葬俗提供一批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墓地还发现少许六朝墓。

2. 淮南市孟岗墓葬群

孟岗古墓群位于淮南市李郢孜镇孟岗行政村南部,墓地面积数万平方米,共发现、清理古墓葬三十四座。

三十四座墓葬分为土坑墓、砖室墓和石板墓,其中以土坑墓居多,计二十八座;土坑墓中又可分为大型土坑墓和中、小型土坑墓。大型土坑墓共三座(编号M13、14、21),

略呈“品”字型排列,其中M21居北,早期盗掘严重。M13和M14均为长方形带墓道(朝北)的多台阶式土坑木槨墓,体量大,建造技术先进、考究,尤其M14,台阶人工加工痕迹明显,表面涂抹白灰土,台阶斜坡面下端涂施约10厘米高的朱彩。墓室填土均经夯打,层次清晰,可见局部夯窝。

M13和M14均遭盗掘,葬具和人骨架皆已腐朽。两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玉器、铁器和骨器。陶器绝大多数残碎,从初步整理看有鼎、豆、壶、钺、盒、杯等仿铜礼器组合。铜器主要为戈、矛(包括镞)、剑、箭镞等兵器和铜镜。从墓葬形制、结构特征和随葬品的组合关系与特点,我们判断三座大型土坑墓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属于楚式墓葬。

中小型土坑墓,带墓道,除少数外,墓道朝北,斜坡式,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长度在1.5~3.5米,墓口距墓底1.5~4.0米不等,多数墓室内填土经过夯打,但无夯窝痕迹。葬具与人骨架基本腐烂无存,只在少数墓葬内发现人牙。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陶器为鼎、壶、盒、钺、杯、罐等组合,泥质灰陶,素面,少数器物里外施红彩绘,纹饰简单。陶器除本地特色外,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较明显。铜器为铜镜和带钩、铜铃。从发掘情况看,中小型土坑墓有窄坑和宽坑之分,部分墓葬被盗掘。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型土坑墓的平面布局特征为两个(少数3个)一组,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二十五座中小型墓的年代,二十四座从西汉早期至中晚期,还有一座属于清代。

砖室墓五座,均为带墓道的单室墓,其中两座狭长形的可见券顶,另两座则不见券顶。葬具和人骨架已腐朽。出土的器物数量少,全为陶器,有泥质灰、红陶之分,其中少数器物为模型明器。初步判断五座砖室墓的年代属于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

孟岗三十四座古墓葬的发现与发掘,尤其是三座大型战国晚期楚墓的发掘,为探索江淮地区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3. 淮南市新河古墓群

新河古墓群位于淮南市唐山镇新河行政村北部,墓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计清理古墓葬八座。

八座古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不带墓道,绝大多数遭盗掘。墓口距地表20~50厘米,墓口距墓底1.2~3.5米不等,墓壁较陡直且规整,墓室多数窄长,部分墓室填土经夯打。八座墓葬除M4外,都不见葬具和人骨架残留痕迹随

* 南方地区各省区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

葬品甚少,仅从M4出土六件陶器,分别为楚式高兽足鼎方壶、杯盒和耳杯,多为泥质灰陶,素面,为仿铜陶礼器。

从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陶器的组合关系及特点,我们初步推断新河墓群八座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时期,个别可能早至西汉初期或战国晚期。

4. 淮南市蔡郢汉代墓地

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唐山镇蔡郢自然村东北部。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共发掘两汉时期墓葬三十座,出土各类文物150余件,以土坑墓居多,砖室墓较少。土坑墓平面为长方形,墓向10°至288°之间,墓口、墓底同大是这批墓的特点,墓室内见木棺痕,棺外有朱砂痕,人骨朽,葬式不详。组合陶器多置放在墓室的侧或一端,镜、钱币、饰件多在棺室内出土。砖室墓为单室墓,方向多为南北向,无墓道、墓顶早期坍塌,断面为三顺一丁砌成,葬具、葬式不详。铺底砖为人字形。出土遗物有陶器、玉器、铜器、铁器等。陶器组合为鼎、罐、壶、钺、盘、耳杯、井等,玉器见璧、蝉、塞,铜器有剑、镜、车马饰件及五铢钱。

5. 淮南市邱岗古墓群

墓群位于淮南市唐山镇邱岗队南200米,清理古墓葬七十三座(其中九座为砖室墓),均为小型墓葬。墓向为南北向,土坑墓多无墓道、壁近直,底平,见木棺痕,人骨已朽,葬式不详;砖室墓墓顶早期坍塌,残留墓室由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壁为顺砖错缝叠压向上砌成,铺底砖见人字形,未见葬具及人骨。

出土随葬品184件,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罐、仓、井、灶、磨、猪圈等,铁器有剑,环首刀,铜器有镜、刷、车马饰件,玉器有玉牌(饰),石器有石璧。

6. 淮南市北洼古墓群

墓群位于淮南市唐山镇廿店村北洼队南侧清理古墓葬三十二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单室墓,墓向在180°~360°度之间,墓室长2.6~3.0、宽1.2~1.6、深2~4米不等。墓壁、底未见明显加工痕迹,墓室内有木棺痕、人骨全朽,葬式不详,随葬品多出现在棺的一端或一侧。

三十二座墓共出土各类文物300余件,以陶器为主,铜、铁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陶器组合为钺、鼎、罐、盒、井、圈、磨等,铜器有镜、车马饰件、钱币。铁器有剑、环首刀。部分墓室发现漆器痕均已成漆皮。

7. 寿县南山墓地

南山墓地位于寿县县城北门外。经过钻探,共发现了战国——明清时期的墓葬201座,实际发掘127座墓葬。

战国时期墓葬近十座,其余基本都是汉代的,还有少量唐宋时期的墓葬。明清墓葬近四十座。战国时期墓葬形制主要有土坑墓、砖室墓和石板墓三种。土坑墓有的有墓道,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刀形和正方形;砖室墓都是长方形,小部分有斜坡墓道,都是拱顶;石板墓为长方形,在墓门的旁边有一个专门用来放置随葬品的正方形侧室,有两座石板墓东西并列,应该是异穴合葬墓的一种。在两墓的

两个侧室里出土完整组合的陶器。在本次发掘中,有近十五座墓葬组合完整,其余墓葬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盗掘。主要出土了铜器、玉器、漆器和陶器等各类器物300多件。其中M168最完整,出土器物最多、器物也最精美,发现了铜器、玉器和陶器等近八十件。M168呈东西向,西边有一个斜坡墓道,被M164打破了,墓室分头箱、脚箱、南北边箱和棺室五部分,玉器等随身小件重要器物随葬在棺室,陶器分多层叠放在脚箱,还有部分彩绘陶,头箱有漆器、青铜弩机等、北边箱出土了大量陶钱,南部有两柄铁剑。

南山墓地应该是寿县北水泥厂墓群的一部分,这里和淮南接壤,应该和淮南为同一个墓地。此次发掘,是该墓地最大的一次发掘。其中具有完整组合墓葬的发现,为了解这个墓群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属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8. 阜阳市颍上县蔡庄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唐宋墓葬群

蔡庄子遗址和唐宋墓葬群位于阜阳市颍上县慎城镇朱庙村蔡郢子西600米。遗址发掘面积65平方米,在墓地清理出唐墓一座、宋墓十七座、清墓十二座。

遗址文化内涵较单一,清理灰坑一个,形状近圆形,斜壁平底。出土大量陶片,夹砂陶比例较大,灰陶为主,黑陶次之,红陶较少,纹饰经绳纹、弦纹、附加堆纹为主,器形主要有鼎、杯、盆、罐、釜等。从典型的龙山时期扁圆形鼎足、敞口杯、直领罐来分析,其年代为龙山文化早、中期。

唐墓为前、后室砖室墓,有墓道,后室腰鼓形,前室近长方形,长4.7米,宽1.4~2.2米,墓向186°遭扰动,出土瓷碗1个、瓷罐1个,银丝2截。瓷碗为玉璧底,结合墓葬形制分析,其时代为唐中期。

宋墓均为砖室墓,形状分近长方形和船形两种,长1.75~3米,宽0.58~2米之间,墓向在145°~174°之间。基本上为二次葬。仅一座墓出土黄釉瓷碗1件、铜钱5枚,其年代下限为熙宁。墓葬形制均为仿木结构。分析推断其时代为北宋中、晚期。

清墓均为土坑墓,形状分为近长方形和梯形两种,长2.14~2.4米,宽0.7~2.02米,墓向在108°~360°之间。出土陶罐11件、瓷灯1件、铁灯5盏、银簪1件、铜镜1面、金耳钉1枚、鎏金顶戴1项、铜扣33枚。出土钱币年代上限为顺治,下限为通先。该清墓群时代为清代早、中期。

9. 阜阳市颍上县陈庄金代及清代墓葬群

该墓群位于阜阳市颍上县六十里铺张圩村陈庄西200米。共清理墓葬二十一座,出土陶器5件,瓷器2件、铁灯4件、铜钱30枚,铜饰件12件。

墓葬中二十座为土坑墓,平面形状分长方形和近梯形二种。一座为长方形匣墓,长0.46米,宽0.24~0.33米,墓向190°;为骨灰葬,其时代为金。一座土坑墓,近梯形,残长1.5米,宽0.7~0.8米,墓向32°;出土双唇圆腹尖底瓶1件、正隆元宝3枚,其时代为金。其余土坑墓,长1.6~2.85米,宽0.25~1.4米,墓向多在35°~130°之间。出土铜钱年代在康熙至嘉庆之间,因此其余19座土坑墓时代为清代早、中期。

10. 阜阳市颍上县龙庄汉代遗址及宋、清墓葬

该遗址、墓群位于阜阳市颍上县六十里铺镇张圩村龙庄东北200米。发掘探方面积232平方米,清理宋代墓葬六座、清代墓葬三座。

遗址文化内涵较单一,清理灰坑5个,水沟2条、水井1口。灰坑形状多为近椭圆形,斜壁、圜底。水沟形状不规则,斜坡、平底。水井为土井,井口为圆形,下部为直壁方坑。出土大量陶片,多为灰陶,红陶次之,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盆、罐、豆、板瓦、筒瓦、缸等。出土灰陶纺轮1件。该遗址年代为汉代。

墓葬均为土坑墓,宋代墓葬形状多为梯形,长2~2.3米,宽1.1~1.3、1.67~2.02米,墓向在22°~46°之间及150°。葬式多为仰身直肢,有棺木痕迹。出土瓷罐4件、陶罐4件、铁钺2件、铁犁1件、铜钱16枚、铜耳环1付。清代墓葬形状多为长方形,长2.6~2.68米,宽0.8~1米,墓向140°~151°之间,葬式为仰身直肢,见棺木痕。出土陶罐3个、瓷盅1个、铁灯1盏,铜簪2件、铜钱18枚、铜扣9个。

合淮阜高速公路沿线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批重要的遗迹遗物,尤其是在寿县、淮南、长丰等地发掘的大量墓葬,它们分布集中,排列密集,年代自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汉代唐宋,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在寿县和淮南两地的发现,验证了分布在寿县北部地区的大型春秋战国墓葬群的存在,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进行科学发掘,取得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说明了寿县到淮南长丰一线是当时楚国的重要中型墓葬的集中分布地点,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的历史提供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二)亳州市程井遗址

2004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东营——香港(亳州——阜阳)段高速公路建设,在安徽省亳州市谯河镇南于行政村程井自然村东北取土发现程井遗址。总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其上全部被1.5米厚黄泛层覆盖。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从7月开始,至2005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发掘区域主要位于程井遗址的中东部,计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遗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时代包括龙山、商周、战国、汉代、唐宋等若干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发现有龙山时期的灰坑、储藏坑;商周时期的墓葬、壕沟、灰坑、祭祀坑、土水井和柱洞等;唐宋时期的砖水井、路面、炼铁炉、灶和陶窑等。

龙山时期的灰坑,主要位于取土场的西南部,坑口有不规则形、圆形与椭圆形等,多数为口大底小、斜坡状,少数为直壁,口径0.5~5.3、0.4~1.65米,出土遗物有陶鬲、盆、罐、甑、碗、蛋壳陶杯、三角形鼎足、骨锥、骨钺、残石斧及石镑、卜甲和卜骨等;商周时期祭祀坑均为圆形,直径0.6~0.7、深0.35~0.5米,内有一头猪,为猪分解后对称状放置坑内,猪头有向南和向北之分。壕沟位于遗址的中部,形状近似圆形,直径80~100、沟口宽8~10米,沟壁为斜坡状(稍陡),深2.2~2.5米,出土遗物有大口尊、甑、瓮、鬲、鬻、罐等

口沿、锥状和袋状鬲足、鬲足、弹丸、网坠、纺轮、蚌镰、蚌铲、骨镞、铜削等。

大批商周——唐宋时期的古墓葬是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计461座,其中商代1座,西周30座,春秋190座,战国128座,汉代54座,唐宋18座。

先秦时期的墓葬皆打破龙山至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及文化遗迹,墓葬分布非常密集,仅在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324座。墓葬之间的叠压和打破关系异常复杂,许多早期墓葬被后期的墓葬打破或叠压,部分墓葬残缺不全仅残存头颅或下肢骨骼部分。墓葬均属小型墓葬,主要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部分有生土二层台。西周墓内有腰坑,坑内都殉狗一只。墓葬一般长2~2.4、宽0.5~0.8、深0.7~1.3米。墓葬方向,除西周墓为南北向外,大多数为东西向。墓葬多数为成人墓,也有少数儿童墓。人体骨骼保存较好,除被打破外,均能清理出完整的人体骨架。葬式主要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一般两手交叉于下腹部或两手上抬置于胸部;其他葬式有侧身直肢与侧身屈肢。葬具已全部腐朽,只有少部分的墓葬能清理出葬具的痕迹。墓葬随葬品大部分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有的墓葬随葬品则放置在墓坑的一侧,随葬品多寡不一,多者10几件,少者2~5件。随葬器物组合,西周时期为簋、鬲、豆、罐、盆;春秋时期为罐、鬲、盆、豆、壶和鼎、豆、盆、罐;战国时期为鼎、豆、壶与鼎、豆、罐。

汉代墓葬主要有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均为长方形。空心砖墓有单室、双室(设有脚箱)、三室(设有头箱和脚箱)等结构。墓室长2.02~5.04、宽0.85~1.4米。空心砖的尺寸大小不一,一般长0.93~1.5、高0.33~0.8、厚0.12~0.18米。空心砖正面有纹饰,饰4个方格对角线,方格纹内饰云雷纹或柿蒂叶纹,中间饰1个圆涡纹。砖室墓均为长方形,多数为单室墓,双室墓较少。部分墓有斜坡形墓道。墓砖多数为素面,少数墓砖一面饰绳纹。墓壁均为错缝平铺砌法。墓室长2.05~6.3、宽0.78~2.54米。唐宋时期的墓葬形制有长方形、船形、龟形和方形圆角穹隆顶等。除方形圆角墓稍大外,其余形制的墓葬均较小。

这次发掘出土文物1500余件,主要有陶器、骨器、蚌器、料器、玉器、铁器、铜器等。陶器占大宗,有簋、鬲、盆、罐、豆、鼎、壶、勺、盘、匜、钺、灯、纺轮、弹丸、网坠、管等,铜器有带钩、镜、环、铃、镞、戈、矛、剑、敦和印章等,骨器有簪、标等,蚌器有珠、蚌、耳鼻塞、兔饰、环饰等,料器有珠、圭形挂件、项饰等,其他有贝币、玉珎、铁削、铁剑、铁佛像、石砚台、黛板以及钱币等。

程井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其龙山、商周遗存的发现,提供了该地区先秦古文化的遗存信息。尤其是周代墓群数量多,分布密集,年代跨度大,叠压和打破关系复杂,对建立皖西北地区周代墓葬年代标尺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汉代空心砖墓的发现,对该类型墓葬的分布范围及特点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探索皖西北地区龙山、夏、商、周诸时期

文化的特征、源流及与淮夷和焦、夷古氏族的关系,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 淮北市体育中心 1、2 号汉墓

1. 2 号汉墓位于淮北市体育中心南部,原属相山区李楼行政村,当地村民称之为“双垅子”。为配合淮北市体育馆建设,2005 年 1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发掘清理。

两座墓葬均坐北朝南,M1 居南,M2 居北,两墓均被多次盗掘。

M1 和 M2 均为土坑竖穴多砖室墓。M1 由斜坡墓道、前庭、甬道、东西耳室、横前室(前堂)以及后室组成,整体略呈“丰”字形。墓葬南北总长 23.46 米、东西最宽 8.34 米,墓穴占地面积约 150 平方米。M2 由斜坡墓道、甬道、横前室(横堂)和后室构成,整体略呈“中”字形。墓葬南北总长 21.44 米、东西最宽 8.16 米,墓穴占地面积近 100 平方米。M1 扰土内发现一残断文字砖,残留“五”、“日”、“年”3 字;M2 券顶砖的外表残留有“黄元”2 字。

M1 的遗物共计 30 余件(组),器类有陶器、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以及钱币。其中以釉陶器居多,器形分别为壶、盆、罐、家禽俑和楼、井、灶、圈厕等模型明器,器形规范,泥质红胎,旗黄绿釉。动物俑为鸡、鸭,形态逼真可爱。铜器有环首刀、弩机、箭镞、熊俑、鎏金扣饰件及近百枚钱币。一件铜缕玉衣的出土,为其重要发现。380 块完整和 300 余块残断的玉衣片出土于前、后室和盗洞以及扰土内,玉衣片为白玉,褐玉质地,受沁,形状有方形、长方形、梯形;还发现一双靴底及一件玉塞(肛塞)。

M2 共出土器物 20 余件,器类为陶器、釉陶器和铜器。以陶器居多,有罐、盆、灶、磨、圈厕、楼。铜器为弩机和饰件。

在 M1 前室盗洞和扰土中发现残碎的人骨,葬具则腐朽无存,而 M2 均未发现人骨架和葬具,但 2 座墓葬都有多枚铁质棺钉出土,我们认为当时的葬具应为木棺。

尽管 M1、M2 均未发现明确纪年的器物,但依据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组合和特点综合判断二座墓葬的年代应在东汉中期、晚期比较合适。

淮北体育中心发现的东汉墓葬,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为淮北地区少见。1 号墓出土的铜缕玉衣片,其数量之多目前为安徽之最。

(四) 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

三国新城遗址位于今合肥市西北三十岗乡陈龙行政村境内。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配合“三国新城遗址公园”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4 年 9 月~2005 年 7 月,对其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局部发掘工作。

据史料记载,合肥三国新城始建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 年),于青龙元年(233 年)建成,至 280 年东吴被晋军所灭,宣告三国时代结束,此后逐渐被废弃,距今已有 1700 余年的历史。

通过钻探与发掘,了解到该城的平面布局为不规则长

方形,南北长 380~420 米,东西宽 200 米,总面积达 8 万平方米。外环护城河,河面宽 12~25 米,深 3~4 米。城墙土垒夯筑,墙基宽 18~20 米,现残存高处 7 米左右,原城设有三座城门(即东中门、东侧门和西门)。整个城区内地面均经过夯筑处理,地层堆积大体分为三层,即 层:耕土层;层:近代扰土层;层:三国时期文化层。发现的遗迹有:房基 10 余处,分三开间和里外双间二种组合形式,每个单体建筑内均有一个灶坑;夯土台基 1 处,长宽高为 32×20~0.80 米。推测为练兵指挥台;铸造兵器(铁镞)作坊遗址 1 处和东中门与西门之间的一条双车道。另外还发现城墙四角外侧有马面设施。

出土文物主要是铁箭镞和建筑上使用的板、筒瓦,其次为大量供守城用的礮石,陶器的器形有缸、盆、罐、钵、盘、盏及火锅,特别是火锅无论是器形还是结构都与今天使用的完全相同,实属罕见。

通过对发掘材料和出土文物的初步整理分析,确认“三国新城”是一座专门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城堡,与史书记载“屯兵于此”相吻合。

(五) 宣城市电厂墓地考古勘探与发掘

国投宣城电厂厂址位于宣城市东南向阳镇和黄渡乡交界处,地跨赵家边、松课、外棚村和郭村 4 个自然村,东临华阳河和水阳江。2004 年 10 月~2005 年 6 月,为配合该电厂基建工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城市文物管理所,对电厂建设区内古墓葬、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调查、勘探古墓葬、遗址区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共发掘古墓葬四十一座(不包括残破特别严重的砖室墓和明清墓葬),其中东汉砖室墓九座、六朝砖室墓二十八座、唐代砖室墓四座。整个墓地被盗扰严重,几乎没有完整墓葬保存下来。出土的随葬品也很少,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文物共计仅 187 件,且大部分保存状况都很差。

宣州区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邻江苏省。宣州秦属郢郡,设置宛陵县、宣城县,东汉永和四年(281 年)宣城始置郡,隋以后为宣城县、丹阳郡、宁国府等治地。本次宣城电厂墓地考古发掘是建国以来在宣城地区针对古墓地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性发掘墓葬总数最多、墓葬延续年代最长的一次发掘,对于研究古宣州的历史、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次发掘,我们认识到宣城电厂墓地是一个曾被各个朝代所沿用的公共墓地,墓葬的主人主要为官僚士族和中小地主,墓地的葬俗基本上属于江南地区埋葬制度的范畴。

(六) 霍邱县洪集镇畈村老店古墓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霍邱县文管所联合发掘的畈村老店古墓群共发掘清初土坑墓十二座,战国晚期——西汉土坑墓四十九座。其中清代土坑墓都为小型墓,墓口长 1~2 米,宽 1 米左右,随葬品位于头部龛中,组合为碗、灯、罐,碗为青花瓷,罐为陶质,油灯多为陶制,少量瓷质。

战国晚期——西汉土坑墓分布较为密集，多为小型墓，长2~4米，宽1~3米。有的墓底没有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搁置随葬品。出土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玉器等。陶器组合以鼎、豆、壶为主，其中有钊、罐、灶等模型明器。玉器较少，有璧、玦、环等，铜器有铃铛、戈等。从出土器物的形制及组合情况判断，这些墓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西汉早期。

较为重要的发现是在M17中发现了刻铭青铜戈一件，上有文字10个。推测为战国晚期。

(七) 枞阳县旗山战国墓葬群

为配合枞阳县银塘路、东湖路工程建设，安徽省考古所和枞阳县文管所于2005年11月17日~2006年1月10日联合对旗山墓葬群中的小湾战国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完成勘探面积三万多平方米，发掘清理战国墓十三座，出土青铜器、玉器各1件，出土陶器44件。

旗山战国楚墓群是我省迄今发现为数不多的大型楚墓群之一，是研究战国时期楚文化和枞阳地区丧葬制度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与生产、生活情况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

此次发掘清理的十三座战国墓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有熟土二层台，只有一座有生土二层台(M12)。一般墓室长2.5、宽1.5、深2.5~3米，个别墓深度超过3米(M4残存深度仍达3.2米)。方向以东向西为主，少数为南北向。墓室规整光滑。填土多为红褐、灰褐或黄褐色砂土。葬具和骨架多未保存下来。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仅M3出土了一把青铜剑和一块玉璧。

墓葬陶器组合主要四种：M5、M12、M13为同一种组合，即：罐1、钵1；M2：豆3、钵2、高领罐1；M7：簋2、壶1；M1、M3、M4、M6四座墓陶器组合中均有鼎1、豆1、长颈壶1，3座有豆柄壶1，3座有勺1，2座有钵1，而杯、盘、罐则分别仅见于1座墓葬，可见，鼎1、豆1、长颈壶1、豆柄壶1、勺1是一种基本组合，基本组合分别加钵或杯、盘、罐即形成一种新的陶器组合。由此可见：上述9座墓葬陶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组合为鼎1、豆1、长颈壶1、豆柄壶1、勺1；其次为罐1、钵1；再次为豆3、钵2、高领罐1和簋2、壶1。

从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陶器鼎、豆、壶、豆柄壶等器形特点看，上述墓葬应属楚墓范畴。陶器组合中不见觚、敦、簠亦已不见，而多出豆柄壶这一战国晚期常见器物，豆、豆柄壶器形特点与江陵战国晚期楚墓以及淮阳、长丰楚墓所出极为相似，所出青铜剑、青玉璧亦为战国晚期常见器物，可见，这批墓葬时代应在战国晚期，有的已到战国末期。

(八) 安庆市棋盘山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

棋盘山遗址位于安庆市区，迎江寺东侧，向南紧临长江，原是一处略高于周围地面的长条形土岗，土岗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

为配合安庆市深安投资发展公司人民路一期工程(潜水湾小区)建设，安徽省考古所和安庆市文物局于2005年

8月~2006年1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共完成勘探面积4万多平方米，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水井、灰坑等重要遗迹11处，出土陶器、石器、原始瓷器、铁器等各类文物48件，包括大量生产、生活用品和建筑构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由于早期城市建设破坏，该遗址上部地层和遗迹多已破坏，仅存下部地层和遗迹，从典型剖面看，主要地层有四层，分别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发现的遗迹主要有四口水井和七个灰坑。水井均为圆筒形土井，圆口直壁平底，个别水井深度超过5米，灰坑多呈不规则圆形、椭圆形圈底状，除个别灰坑晚至战国以外，大部分为两周之际到春秋时期遗迹。

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石器、铁器等。这些器类包括连裆柱足鬲、豆、高领罐、深腹盆和瓮。在时代上不连贯，少量出土的器物有孟、甑、南瓦、双耳直筒罐、鼎等，除鼎可能为仿铜陶礼器外，其它均为生活用品。此外发现少量两周之际到春秋时期的陶纺轮和网坠一类的生产工具。

除上述陶器外，春秋、战国时期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遗物的一大特点。瓦当主要有云纹半瓦当、乳丁纹圆瓦当；板瓦、筒瓦均为正面饰粗绳纹，背面饰粗斜方格纹，此外发现少量脊饰类建筑构件。

棋盘山遗址是第一次发掘。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和建筑构件，特别是这一时期水井类遗迹的发现，正好与安庆市及周边地区发现和发掘的同时期墓葬材料形成互补和相互印证，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填补了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材料，对当时安庆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安庆城市建设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出土遗物看，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印纹陶器、原始瓷器类遗物与同时期楚及吴、越文化均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对研究这一时期楚及吴、越文化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九) 霍山县戴家院遗址

为配合六安-潜山高速公路建设，安徽省考古所和霍山县文管所联合对该遗址于2005年10月~12月进行了发掘，面积共700平方米。发现西周时期的祭坛1座及与之相关的红烧土建筑3处、大型房址1座、木桩遗迹3个，另有大量柱洞、少量灰坑等。出土了小件青铜器、陶器，以及少量木器、石器和铸铜石范，并发现了木头堆积及其他植物遗存龟甲等。祭坛是此次发掘最主要的发现之一，这种平地起建、堆筑讲究的形式较为罕见，年代应在西周中晚期，延续时间较长。分间清晰、体量较大的弧形排房也颇有特点，年代应在西周早中期。从遗址发掘情况看，有以下特点：一、陶片出土数量大大少于其他遗址，而铜器出土数量则明显多于其他遗址；二是出土的木、竹和其他植物遗存少于其他遗址；三是未发现与祭坛同时期的可作普通居住用和房屋建筑。因此，该遗址在功能上与其他遗址并不相

同。

(十) 天长市船塘墓葬群

船塘墓葬群位于天长市釜山镇釜山行政村船塘自然村东南约150米,由于淮(阴)——宁(南京)高速公路建设,安徽省考古所和天长市文管所联合对工程建设的10号取土场进行了发掘。发掘工作于2005年8月开始,9月结束。共发现汉代墓葬十二座,明清墓葬一座,墓葬分布集中,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2.6~3.8、宽1.83~2.45、深1.68~2.6米。方向基本一致,为东西向。由于土壤酸性严重,葬具、骨骼以及随葬铁器锈蚀厉害。随葬品多者10多件,少的只有2~3件,多放置在墓葬的一端,主要有铁器、铜器和陶器等。器形有铜弩、带钩、铜镜、铁剑、串饰、耳塞、鼻塞以及陶鼎、陶盒、陶罐、陶壶等陶器。

船塘墓葬群的发掘,丰富了当地古代墓葬资料,这批材料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非常广泛和密切,为我们研究皖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埋葬习俗、民风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以上材料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各考古发掘工地领队提供,程蓓负责编辑整理。)

(十一) 宣城市麻村羊山旧石器早期人类石器制造场

2004年,在配合宣城市至杭州市铁路复线工程文物调查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宣城东南14公里的孙埠镇麻村羊山发现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旧石器遗址。2004年6~8月对遗址进行野外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500多件。石制品主要埋藏在水阳江支流的二级阶地中的网纹红土与均质红土中,阶地相对高度约26米。根据土质颜色和粒度可划分为4层。

麻村羊山遗址文化层含石制品最丰富的是第4层,T3④层出土了许多石片,并有石核、石锤、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断片、残片,以及大小砾石等;T4④层见有石核、石片、手镐、直刃砸器等。T3石制品集中分布在探方东北角,T4集中分布在西南角,石制品有规律分布,具有一定数量石片废品和石器等,说明该遗址应该是一处人类石器制造场。石制品的用料主要经过河流搬运砾石,成分是石英砂岩、石英岩、含砾石英砂岩、燧石等。石器可分为:大三棱类状器、手镐、直刃砍砸器、双刃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器形多样,文化内涵丰富。石片基本上是用锤击法打制,多数石片台面属于自然台面。最具特色的是一种尖状器,它是利用三角形砾石从一侧修理,或用小型砾石从两侧进行修理,最终修理出一个尖端。这种尖状器加工方法充分利用了天然砾石的形状,进行巧妙简单的加工而成型,反映当时这一群古人类打制石器技术的熟练性。遗址所发现尖状器占石制品总数6%左右,数量较多,说明这种尖状器可能是当时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之一。另外遗址发现大石核17件,石料多数为灰褐色燧石砾石,少量为石英砂岩砾石;最大一件多台面石核重达81.25公斤,大小为54.5×

47.7×28.5厘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最大的石核之一。石核上从多个方向进行剥片,可见到残留片疤14个,测得片疤长、宽分别在150×200、85×195、155×115毫米之间,打片角度在41°~49°之间。其他一些大石核分别为7.5、17.5、64.5、20.4公斤等。这些石核绝大多数都是多台面石核,有少量的双台面石核,没有发现单台面石核。石核上残留片疤个数在9~22之间,每个石核上都进行多次剥片,剥片角度在20°~62°之间,片疤大小在长185~94、宽200~72毫米之间。这些大石核在打片时无法用手抓起来,只能放在地面上进行,这种打片方法目前国内还是首次发现。由于地面是作为一种软石砧,从石核上打下的石片不会出现砸击石片的特征,这种打片方法是否可称作砸击法打片还有待研究。

麻村羊山旧石器遗址石制品埋藏在网纹红土与均质红土中,时代与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相当,根据赵其国、杨浩对宣城网纹红土与均质红土剖面的研究,时代距今73~10万年,因此麻村羊山遗址时代也应在距今73~10万年之间。麻村羊山旧石器文化类型应属南方砾石工业文化,但是它同南方砾石工业文化又有区别,它出现的尖状器和大石核,在南方砾石工业文化中还未发现;它与安徽水阳江旧石器文化在砍砸器方面基本相同,但是水阳江旧石器文化没有尖状器和大石核存在,麻村羊山旧石器文化应属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新文化。(韩立刚)

(十一) 宁国市安友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2004~2005年,安徽广德县至宁国市在老公路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工程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宁国市文物管理所联合进行了文物调查,于宁国市城郊5公里处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坐落在宁国市中津河的西岸,距中津河100米处的安友庄附近。经过3个多月的野外考古发掘,布探方25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198件,分别有石核、石砧、石锤、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

砾石工业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秦岭以南地区,安友庄遗址工具组合应属南方砾石工业文化。砾石工业文化目前所发现打片方法主要是锤击法,但是在安友庄遗址发现一件石砧,石砧长16、宽11、厚7厘米,中部保留集中砸击凹坑,说明该石砧经过多次利用进行砸击石片加工。在石砧周围分布有零星散落的石片。在南方砾石工业文化中,以前还没有发现过石砧。安友庄石砧的发现在南方砾石工业文化中尚属首次,证明砾石工业文化不仅存在锤击法打片,同时存在砸击法打片。

从安友庄旧石器遗址发现石砧、石锤、石片等工具组合,证明该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人类制造工具的活动地点。安友庄遗址文化主要分布在网纹红色亚黏土中,根据长江中下游第四纪地质研究,网纹红土形成时代在中更新世,时间大约从73~40万年。该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类型属南方砾石工业文化,最具有价值的石砧发

现说明运用砸击法打片与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时代相当。

(韩立刚 吴强)

(十二) 蚌埠市太平岗北宋初期墓

2005年4月4日,安徽省蚌埠市文物管理处获悉,蚌(蚌埠)宁(南京)高速公路蚌(埠)明(光)段太平岗房建工程A段行政监控中心楼基础施工中发现一座古墓。4月8日,蚌埠市文物管理处对该座北宋初期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

此墓为“凸”字形单室砖券墓,清理前,券顶已遭破坏,短甬道,弧方形墓室,墓室四角均有仿木的转角结构,四壁有多处砖砌小坎。墓室长176、宽170、残高25厘米。墓室分前后二部分:后部为棺床,由4纵排砖平铺;墓室前部有1纵砖多宽,无铺地砖,与南部甬道相连,低于棺床20厘米,甬道口用5纵排砖斜向平塞封堵。墓砖均为灰色,长

31.5、宽15、厚5厘米。墓东西两壁变形略内弧,且四壁墓基下沉,造成棺床西、北、东三侧边砖向壁基下倾斜。墓室规格不大,但出土了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砖雕20余件,为蚌埠地区近年来考古发掘所少见。

从墓葬形状、出土器物分析,初步断定墓葬年代为北宋初期,或可早到唐末五代,从出土的大量精美瓷器分析,墓主人应为一般的下级官员或庶人中的富豪。

此墓填补了2004年发掘的南北朝、北宋晚期墓葬时代上的缺环,构成两晋南北朝到宋的序列。此墓规格不大,却齐聚了安徽境内三大名窑:繁昌窑、寿州窑、白土窑的器物,说明唐和北宋时期安徽的制瓷业相当发达,也反映了当时整个淮河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赵兰会 高和平)

二. 重庆市

(一) 潼南县明代纪年墓葬

2005年,重庆潼南县在崇善镇白沙村梁家嘴发现一处明代纪年墓葬群。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清理发掘。梁家嘴墓地共计墓葬十座,出土文物二十四件。其中最有价值的有藻井顶式雕刻、纪年题记及买地券等。

墓葬均为石室墓,平面呈长方形,结构有藻井顶式和平顶式。藻井顶式墓较精美,以M3为代表。长方形双室相连,相邻壁共用。墓葬全长360、宽340、通高330厘米,由墓道、封门墙、墓门、墓室、棺台、藻井、侧壁龛和后壁龛组成。藻井顶、壁龛、圭脚等雕刻纹饰工艺精湛。左室藻井壁上有大明成化庚寅年的造墓题记。墓室棺台与后壁之间的两端设置有石质莲花纹豆形座,其上放置随葬品。墓壁基座下部为长条形衬石,上部为圭脚,饰如意云头纹。在圭脚上面开凹槽。两外侧壁均有2个长方形壁龛。前龛阴线浅刻莲花纹开光,中刻圆环,圆中涂朱砂,有太阳之义;后龛阴线浅刻芭蕉扇。共用壁上开2扇镂空的漏窗,左右室以漏窗相通。前漏窗中有圆形窗户,窗口刻云纹,左面阴刻“日”字,并涂朱砂,右面阴刻“月”字;后漏窗作双合四抹隔扇,透雕斜双交四椀棂花,缘环板透空,裙板刻字,左刻“清气”二字,右刻“纹莹”二字。后壁上均有壁龛,龛为仿木结构,两侧为柱,柱上施柱头科;柱间有枋,枋呈拱形,上施平身科;其下有雀替,雕刻云纹。龛内浮雕神位牌,牌座为须弥座图案,神位两侧及顶刻如意云纹。左龛神位阴刻“康宁福寿堂”,牌位两侧阴刻“元亨生万岁、利真保千秋”;右龛神位阴刻“富寿荣华轩”。左室后龛内放有“掌墓符命”买地券,右室后龛内放有“墓中亡人契券”买地券。室顶部均为二层叠涩方形藻井构造。左室藻井顶为莲花纹宝盖顶,于圆形开光内凿莲花边圆形井顶,井顶中心团花外凸,上刻右旋四出纹,周围饰4组3幅云纹饰,顶内刻着伞形纹饰。藻井顶圆形开光外均满刻云纹,云纹多作3幅云纹饰。在左室藻井后侧第一层井壁正面楷书阴刻“大明成化庚寅年

季冬月戊寅日明星黄道竖造”题记。

出土文物较丰富,主要集中在M3,择要介绍如下:

石买地券2件。《墓中亡人契券》、《掌墓符命》券。另有金指环、银指环、银簪、铜挖耳、“正隆元宝”铜币、瓷楼阁式塔形罐、瓷碗、瓷灯盏、带座石雕豆形器、陶罐等随葬品。

M3规模宏大,构造复杂,纹饰丰富,有明确的修造时间和下葬时间,是重庆地区明成化时期石室墓的标准型墓葬。墓室的建造时间是“大明成化庚寅年”,第一次下葬女主人的时间是成化十一年(1475年),第二次下葬男主人的时间是成化十九年(1483年)。第一次下葬时间与建造墓室时间相距5年,第二次下葬时间与第一次下葬时间相距8年;说明M3在男、女墓主人生前建造,是典型的“生墓”墓。出土器物的排列组合清楚,是明成化年间重庆地区墓葬随葬器物的标准组合器物。M3隔墙漏窗上的“日”、“月”刻字和M9后壁龛的火焰纹有明教文化的因素。

M3出土石质朱书买地券,更是难得的文献资料,买地券对男女墓主人及墓葬地理有所记载。(林必忠 刘春鸿)

(二) 云阳县旧县坪遗址

三峡库区A级项目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历经七年的连续发掘,至2005年整个发掘工作结项之际,通过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使该遗址最终得以确认为汉晋六朝的胸忍县城故址。

1999-2005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旧县坪遗址有计划地进行了全面揭露,总计发掘面积21000平方米。通过发掘,确认该遗址主要埋藏有战国—六朝时期的文化堆积,尤为重要,汉至六朝时期堆积体现的是文献记载的胸忍县治所的文化遗存。

旧县坪遗址由江边三个较大台地共同组成,考古工作者将其分为十二个区域。1999年发掘的C区狮子坪,是旧县坪遗址战国时期遗存的密集分布区。纵观七年的发掘资料,战国时期的遗存鲜见于其他区域。

汉代遗存分布于遗址的东部,具有鲜明的城市性质的布局特点。其中,C区狮子坪继续发挥冶铸功能;S区为衙署区,发现战国—六朝遗迹多处。2003年清理出汉代大型夯土台基一座,台基的上部叠压有利用汉代台基改建的六朝衙署建筑,建筑设施等级很高。遗址的A、B区和遗址西端的台地是主要的居住区,中部地势最低的长坪为当时的制陶工业区。

支持旧县坪汉代遗存为胸忍县治所的证据主要包括:2000年在C区出土了带有“胸”字刻款的汉代陶钵;2001年在C区发现了“君”封泥和S区SK1中的记事木牍,进一步显示了遗址的行政地位——胸忍县治的可能;2004年胸忍令景云碑的出土,应该是确认胸忍治所更为直接的证据。

2005年在遗址北部清理出的一段夯筑城墙和城区至江边通道的发现,则进一步增进了对于胸忍故城整体布局的了解。

城墙是在北边凹处见到的,用夹杂有汉瓦残片的黄土夯筑而成。城墙残长约40、宽6~7、存高不足1米,边坡为六朝地层叠压,应该筑于汉代。城墙的发现,验证了史籍中胸忍“有大小石城”的记述。和中原习见的规整汉城不同,峡江地区的汉城城防与东北地区一些山城的构筑有些相似,即主要凭借天堑,只在地势低处筑墙。人为修筑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可以说是峡江地区的一个特色。

2004至2005年发掘清理出残长约70、宽约2米的城市道路。道路位厂遗址东南部,直抵江边,为石板修筑的阶梯式路面。清理情况表明,该路修建于汉代,六朝时期进行过修整,应是胸忍城衙署连接峡江的唯一通道。

发掘表明,六朝时期的城市布局在汉胸忍城的基础上

有所扩充。在E区清理出的EF401是六朝时期的大型建筑。该建筑构筑在汉代夯土台基之上,面阔四间,修建有整齐的砖砌暗渠,是遗址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六朝时期建筑,当为该期的衙署治所。A、D区和遗址西端的台地仍然是当时的主要居住区。中部地势最低的长坪。其东半部存在六朝时期的陶窑,仍为制陶工业区,其西半部在六朝后期被辟为居住区。六朝时期的城市道路与城墙未见明显变化。

旧县坪遗址整体分布约1平方公里,年代跨度为西周末至六朝。从堆积情况看,城址是不断扩大的,但总体而言,得以留存的相对完整的遗迹很少,可能是可资利用的空间有限,只得新旧建新的结果。西周至春秋时期遗迹仅在铸造区北部有零星发现,战国时期遗迹则见于大坪南、北侧,分布有所扩大。汉代遗迹不仅环绕沟谷,且在西面台地和北侧坡上也有分布,其时的常住人口除官员、部曲、工匠外,可能也有少量军队。六朝时期的沟渠、房址已遍布全城,一度兴盛。史载胸忍于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年)迁治汤口,改为云安,旧县坪当即衰落和萧条。今旧县坪遗址东、西大型基地——马沱和张家嘴墓地的发掘已接近尾声,所见为战国至六朝时期墓葬,与旧县坪遗址的年代跨度相始终,也和史书记载相吻合。从遗址R、K、B、E诸区六朝层位普遍堆积有厚达2~3米纯净红土的情况看,县治迁出后不久曾发生二次大范围、大规模的滑坡,最终导致汉晋胸忍城湮没间。

云阳旧县坪遗址历经七年的连续发掘,借助考古学手段印证了学术界有关胸忍城位于“旧县坪”的学术推想。

(王洪峰)

三. 福建省

(一)三明市尤溪县街面古文化遗址

遗址位于三明市尤溪县坂面乡街面村,包含福记坡商周遗址、店子坂宋元窑址、北斗湾清代窑址等三处古代文化遗址。上述三处遗址均为2005年5~6月福建博物院考古所配合街面水库而进行的考古发掘。其中北斗湾遗址发掘面积140平方米;福记坡遗址发掘面积220平方米;店子坂遗址发掘面积120平方米。

街面遗址位于群山环抱之中的山间开阔盆地上,二溪交汇,台地、坡地沿溪分布,是一处非常适合早期人类生存的理想居住地。考古发掘证明,街面早在相当于商周时期的福建青铜时代即已有人类活动,并遗留少量实物遗存;街面主要的文化层,集中体现为南宋、清代早中二期等。

在发掘的三处古文化遗址中,福记坡遗址位于冠带状河水内侧的高起台地上,地理位置优越。考古证实,福记坡是一处起自青铜时代,历宋元,而于清初达到鼎盛的古代遗址。地表采集到包括早期磨制石器等在内的早期文化遗

物,并揭露出相对完整的宋代夹砾石黄土路面、清初卵石道路等与码头、交通有关的遗迹现象。其中的清初卵石铺道路直逼河沿,路面规制整齐,设计科学,其宽达2.5米,二侧有排水明沟,揭露长度逾20米,并有上下石阶等;该路面遗迹可以与原位于街面村西的清雍正九年(1731年)《永平滩碑记》相印证,是研究我国古代水路交通、反映街面历史繁华的重要实物证据。

店子坂遗址位于街面通往福建古代“瓷都”德化的交通要道上,背山临河,有发展窑业的极好条件。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匣钵残片以及青釉瓷片等,证实店子坂遗址是一处宋元之际主要生产青瓷的窑口;其出土的瓷器以碗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器形厚重,具有较典型的南宋末至元代的风格特征;匣钵残片有的与碗残片相互粘结,有的有刻划符号等,是对当时烧窑制度的重要佐证。

北斗湾遗址经考古发掘,证实是一处专门生产各类陶器的清代陶窑遗址。在极小的发掘面积内,出土了数量极其可观的各类陶器制品,其器形基本涵盖了已知的大部分

古代陶器器形,如罐、盆、缸、钵、壶、水注、急须(药罐)、器盖等;陶器基本都是用支钉、粘土等各类间隔具裸露叠烧,不用匣钵;陶土制成的胎体多数较为粗松,部分施有青釉、酱褐釉等。北斗湾遗址出土的这批陶器,是研究当地乃至我国清代制陶工艺、产品的极其重要的实物材料。

(楼建龙)

(二)漳州市岱山院明清寺庙遗址

岱山院遗址(古称大山广岩禅寺)位于漳州市北郊莲花池山南麓,遗址西距莲花池山旧石器遗址点约150米,北距环城北路约80米。遗址东南有存活至今的古菩提树五株,其中最大的一株围径逾10米,高近30米;另保存有清康熙三十八年所立《大山广岩禅寺碑记》一方。

2005年11月~2006年1月,福建博物院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共发掘探方44个,探沟4个,发掘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发掘共揭示出由明至清、迄民国的前后五期建筑群遗迹,共9处房屋(F1-F9)、8处水沟(G1-G8)、3处天井(J1-J3)以及10个灰坑(H1-H10)等,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及建筑用材等。考古发掘显示,古代的岱山院始建于明后期,清初沿用,在清康熙年及清中后期分别有过至少二次的较大规模维修与扩建,此后形成的岱山院占地宽广、香火鼎盛、影响颇众。最盛期的岱山院建筑由前往后由前埕、前殿、前庭、大殿、经堂、后殿以及偏殿、厢房等众多建筑组成,建筑群外侧以水沟与周边建筑相隔,中轴线建筑由前往后,分四层重重高起。建筑群中的前庭大天井南北长12.3米、东西宽19.7米,天井内铺三合土,外砌浅沟,天井中轴线上铺砌石板甬道,直通北面的大殿。大殿立于高台之上,面阔五间(宽15米)、进深六柱(深11米),是建筑群中的主体部分。大殿二侧各有一个小天井与偏殿相隔离,小天井前侧铺埋暗管,排水可与大天井相通;大天井中的水则由前殿下方暗埋的呈“几”字形曲折缠绕的陶水管排出。岱山院沿用至清末同治年间被毁,之后在寺院的前部及西北侧利用其旧有建筑,改建成后来的私塾学堂等;进入民国后,在学堂的东南部位即现今立碑处又有过二次小范围的重建。到解放初期,岱山院已经完全被毁,仅余残垣断壁,湮没于荒草丛中。

此次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古岱山院遗址的西侧进行,其后殿及大殿东侧的遗迹因为拆迁进度及发掘面积的限制,未能进行考古揭露;但是由于此次考古发掘已经揭示出沿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根据古代寺院建筑基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的格局,已经可以基本上复原出当时鼎盛一时的古岱山院平面格局及部分立、剖面形制及建筑手法等。

(楼建龙)

(三)建瓯市水南机砖厂晋代墓群

墓地位于建瓯市水南镇机砖厂后山,浦南高速公路K187+680+800米附近山坡。2005年12月,福建博物院考古所在此墓地清理发掘三座较大型的砖室墓,平面形状呈“刀”字形、“中”字形。出土了青瓷碗、钵、杯、盘口壶、器

盖、虎子、纺轮、陶灶和铁剪等文物。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特征分析,其年代为西晋。(温松全)

(四)浦城县吕处坞两晋南朝墓群

墓地位于浦城县莲塘镇吕处坞村的后门山、鸡脖岗山,浦南高速公路K40+100~850米穿过该区域。2005年9~12月,为配合高速公路建设,福建博物院考古所和浦城县博物馆对此墓地进行考古发掘。采用探沟、探方相结合的发掘办法,共清理两晋、南朝时期砖室墓11座,均为单室券顶,形状有长方形、刀字形、凸字形,长2.3~4.3米不等。墓砖多饰有钱纹、叶脉纹、网格纹、圆圈纹、绳纹、十字圆圈交叉纹等。常有纪年砖铭,可见有“元嘉十五年……八月……日丙建安吴……”(438年)、“咸康五年……”(339年)、“兴宁三年(365年)……”。出土了瓷碗、罐、盆、盘、钵、盘口壶、唾盂、纺轮、铁剪、环首刀、石砚、石猪等文物100多件。(温松全、陈寅龙)

(五)浦城县仙阳镇高速公路改线路段考古发掘

为了保护猫耳弄山商代窑群这一全国罕见的珍贵考古遗迹,高速公路局部改线,绕过古窑群。2005年底,福建博物院考古所和浦城县博物馆对猫耳山商代古窑群所在位置改线路段即K29+700米至K31+100米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布5×5探方54个,发掘面积1350平方米,发现墓葬18座,均为土坑墓,出土石器2件、陶器百余件。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2座,出土陶器13件,均为泥质灰陶,素面无纹,器类有鼎、釜、罐等;商代早期墓葬16座,出土陶器数量多为2至5件,最多有28件,少则1件。陶器以着黑衣陶为主,少量泥质灰陶。器类有罐、盆、釜、簋、钵、盅、豆、桶形罐、单把罐、尊、碗、勺、虎子形器等,器型与窑内所出着黑衣陶相同或相似;石器有戈和箭镞。初步推断该墓群为窑工墓葬群。(张文岑、陈寅龙)

(六)明溪县南山遗址

南山遗址位于明溪县城城南约2公里。遗址山名叫狮子山,整个狮子山共有5处洞穴,1987年发掘了3号洞。2005年7月~8月对该遗址的4号洞及山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4号洞发掘面积17平方米,山顶发掘面积70平方米。发掘面积共87平方米。4号洞地层共分5层,1~2层为明清时期堆积,3层以下为新石器时代地层。目前已揭露出四期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迹。其中各期均具有明显多层人工铺垫层遗迹现象,目前第一期只揭露局部活动面遗迹;第二期房基局部作了解剖,建造相当讲究;第三期主要分布于4号洞东半部,局部有墙的遗迹现象;第四期规模最大,从目前揭露的情况来看,很可能覆盖整个洞穴。出土较多磨光黑陶、泥质灰陶,从灰土层中水选出300多粒水稻及一些小哺乳动物骨骼。

山顶通过考古钻探,一区(西区)顶部遭推土破坏,南北两侧保留有文化层堆积;二区(东区)文化层保存完好,文化层平均厚度达70~80厘米,局部超过150厘米,个别地段在红黄土层下还发现一层厚约30厘米的灰土层,其

性质尚不明。山顶开探沟进行试掘,发现青铜时代墓葬3座,出土豆、罐、盆等器物,并揭露出青铜时代灰坑、柱洞、台基等遗迹。(彭菲)

(七)漳州市莲花池山遗址

该遗址于1990年3月发现,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和漳州市文化局联合组队,对莲花池山进行试掘,2005年11月,福建博物院考古所、漳州市文管办联合组织考古发掘队,正式对莲花池山遗址进行第二次科学发掘。

该遗址位于漳州市北郊环城路边,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公路剖面上可见石英砾石条带。此次发掘面积600平方米。经初步发掘,莲花池山遗址地层可分为10层,1~3层为历史时期地层,4层为浅黄红色土,其年代约在晚更新世,无文化遗物。5层为砖红土,6~10层均为网纹红土。目前在所揭露的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均在网纹红土中,现提取上文化层标本约600余件,其中石制品数十件;中文化层提取标本约1100余件,其中石制品近100件;下文化层目前仅提取仅200余件的少量标本,其中石制品数十件。目前我们对发掘范围里的上、中文化层标本全部提取,下文化层文化遗物最为丰富,目前仅提取少量标本。该遗址所有石制品原料均为石英砾石或水晶,90年的发掘及张森水教授的研究说明莲花池山的石制品分为石器、石片、石锤和断块等,石器中又可以分为刮削器、雕刻器、砍砸器等。本次发掘中发现一些水晶晶体有被使用的痕迹,且有些端部已经残断,说明很有可能古人使用水晶晶体作为石锤。这又为莲花池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增添了一个元素,具体的室内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我国南方地区广泛分布着红土和网纹红土,它们代表热带、亚热带暖湿环境下的产物,根据地质地貌的研究,通常把具有菌丝条纹结构的红土称之为网纹红土,时代属更新世早期红土,一般认为网纹红土的年代要大于40万年前。此次发掘在网纹红土顶部发现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层,我们采集了整套地层标本送北京大学环境学院进行测定,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年代、环境信息。

(彭菲)

(八)浦城县仙阳镇管九村商周时期土墩墓

管九土墩墓位于闽浙赣交界的浦城县仙阳镇管九村西面山坡上。该地属山间盆地,闽江源头之一——南浦溪自北而南从盆地中央经过,地势开阔,周边散布有众多的低矮山头。经考古调查、勘探,管九村西面的社公岗、洋山、麻地尾、晒谷坪等山头分布有众多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了配合浦南高速公路(浦城——南平)建设,2005年9月开始,福建省闽越王城博物馆对这些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土墩墓30座,出土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计200余件,取得了重大收获。

1. 社公岗遗址。在四个邻近的山墩中发现了11座土墩墓。其中D1、D3、D4各一座,D2有8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底多铺筑一层河卵石。D1M1,东西长4.8、宽2.7、深

0.2米,出土青铜短剑、矛、刮刀、原始青瓷尊共五件器物。D2M01,南北长5.6、宽2.2、深0.6米,共计出土15件器物,有青铜戈、矛、镞、镞7件,石枕1件,泥丸1件,陶尊1件,原始青瓷豆5件。在D2M01周围的封土中清理出7座无圻墓(D2M1-M7),出土了陶尊、罐、豆、盆、盅等25件。D3M1,东西长4.1、南北宽2.4、深0.15米,出土原始瓷罐1件。D4M1,带墓道,墓室东西长5.7、南北宽2.8、深0.96米;墓道长5.6、宽1.3米。出土陶罐、器盖、原始青瓷豆等9件器物。

2. 洋山遗址。在8个相连的山墩中清理了9座墓葬,形制与社公山相同。D1M1,长5.7、宽4.0、深0.2米,方向25度。共出土青铜矛、刮刀、镞和原始青瓷罐、簋、豆、碟、鸭形壶等14件器物。D3M1,长4.6、宽2.7、深0.1,方向30度,出土青铜剑、矛、刮刀、镞、原始青瓷罐、簋等8件器物。其它墓葬情况大致相同,随葬品多为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共出,多者20件,少者仅3件。

3. 麻地尾遗址。在7个相连的山墩中清理了9座墓葬。其中D3、D4各有两座,其余山墩各1座。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D1M1、D3M2带有墓道。随葬品有青铜剑、戈、矛、陶尊、罐、钵、盆、壶、杯、盂、纺轮,原始青瓷尊、罐、豆、簋、盅及砾石等73件。

4. 晒谷坪遗址。清理1座(D1M1),方向255度,带墓道。墓室长4.2、宽2.1、深0.8米,墓道长1.4、宽0.8~1.3米。出土青铜剑、陶罐计4件器物。

管九土墩墓的发掘清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它填补了中国南方地区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我国先秦土墩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浙江、苏南、皖南(江西近年来也有一些发现)地区,福建以往没有发现,此次管九发现的30座土墩墓,填补了这一空白。其次,出土了一大批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原始青瓷器、印纹陶器组合,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阶段,填补了福建地区该阶段考古学研究的许多缺环。出土的39件青铜器,有剑、戈、矛、镞、匕首、刮刀、铸等,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考古发现;五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特别是一件铁箭镞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早期铁器的起源、铸造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杨琮)

(九)浦城县仙阳镇猫耳弄山商周窑群

猫耳弄山商周窑址位于浦城县仙阳镇所在盆地西南,距仙阳镇镇政府约一公里,修建中的浦南高速K30+400-600米猫耳弄山东西两侧之间山坡穿过。西侧山坡地层堆积有五层,清理窑炉六座,分布集中,其中长条形窑炉一座(Y4),开口于层下;椭圆形窑炉四座(Y2、Y3、Y5、Y6),圆形窑一座(Y1),均开口于层下;六座窑炉中,长条形窑Y4叠压打破层和椭圆形窑Y5,椭圆形窑Y2叠压圆形窑Y1,Y1又叠压椭圆形窑Y6。东侧山坡地层堆积有三层,清理窑炉三座,均开口于层下,其中长条形窑一座(Y8),椭圆形窑二座(Y7、Y9)。

在发现的九座窑炉中,椭圆形窑有六座,圆形窑一座,长条形窑二座。椭圆形窑结构相似,大小不一,最大的为Y2,长4.04、宽2.08米,最小的为Y3,长2.62、宽1.28米;窑炉结构分火膛、分焰柱和窑室前后三部分。火膛位于窑炉前端,底部较为平坦,大多均有二至五层烧结层,部分窑炉火膛仅有一层烧结层;火膛后壁呈斜面向上与窑室底部相接;分焰柱位于窑室前端,呈圆柱状,粗细不等,二至三根;窑室底部呈斜面,坡度 20° - 31° 不等,为青灰色烧结硬面;窑顶为拱形,Y2窑室后部仍保留部分拱形窑顶,高1.26米。长条形窑残存腰身和窑尾,残长约5.38和5.56米,窑底呈斜坡,分二至三层青灰色烧结层;窑尾圆弧,Y8窑尾仍存拱形窑顶和长方形烟囱。圆形窑Y1仅残存底部。

椭圆形窑和圆形窑后部均未发现烟囱等设施,从其结构看,均属升焰窑,部分椭圆形窑火膛前保留有多层活动面。长条形窑窑底坡度在 4° 和 10° 之间,属平焰窑,窑尾部均未发现有挡火墙的迹象,亦未发现垫具等窑具,属早期龙窑类型,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出土陶器主要有罐、盆、釜、盅等,以泥质陶为主,部分含较多粗砂,胎质大部份较坚硬,器表多施黑衣,纹饰有条纹,方格纹等,初步推测窑址年代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

此次发现的圆形窑、椭圆形窑和长条形龙窑数量较多,分布集中,之间存在着叠压和打破关系,且长条形龙窑还残留着部分窑顶和烟囱,这样的早期窑炉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窑炉特别是龙窑的历史、结构和发展演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了科学、准确地判定该遗址的性质和价值,2005年12月底,国家文物局派出以张忠培研究员为组长的考古专家组,对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形成了专家论证意见,认为“此次发现的窑群,形成一定规模,保存较完整,全国罕见,属重大考古发现,且三种形制窑炉间存在叠压关系,表明圆形窑与长条形平焰窑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发展关系,特别是长达6.5米的长条形窑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南方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和龙窑的起源及

原始瓷的产地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保存价值”。

该遗址考古发掘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陈明忠)

(十)浦城县连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位于浦城县石陂镇连墩村东面,为一独立低矮山丘(山名为下山尾),东、南两侧为断崖,西、北面为连墩村民房。为配合浦南(浦城-南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福建博物院考古所、南平市博物馆及浦城县博物馆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根据地貌现状及高速公路线路情况,选择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山顶南部平台,采用探方方法进行布方发掘,总计发掘面积为425平方米,发现南朝土坑墓葬1座,新石器晚期墓葬2座,出土了石、陶、瓷、青铜、铁器等文物标本近百件。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南朝墓(M3)随葬器物有青釉瓷碗、青釉瓷盅、青铜镜、铁鼎、铁剪、铅钩等共计7件;新石器晚期墓葬两座(M1、M2)。M1底部有长方形生土二层台,M2底部垒有熟土二层台,且二层台底垫有一层灰色青膏泥加固层,这种做法与省内其他同类遗存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细节上亦有所区别。随葬品器物有陶豆、罐、釜、钵、三足盘、纺轮、石镑、砺石等,共计86件。陶器有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黑陶、夹砂红褐陶四种,器类以陶豆数量居多,豆足多见镂孔装饰,形式均为高喇叭形圈足、矮喇叭形足。具有地方特色的是三足盘的鱼鳍形扁足,上部居中位置多见镂孔装饰,这类器形省内除闽西地区有见以外,其他地区均较少见。在石器方面,该遗址所出石器较为单一,仅见有石镑与砺石两种,石镑多见外弧刃,平尾,且通身打磨光亮;砺石有单面使用,亦有双面使用,使用痕迹易见。

从出土器物分析,该遗存与浦城县牛鼻山遗址文化面貌相似,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4500~5000年。

(程璐、陈寅龙)

四. 广东省

(一)惠常高速公路文物调查勘探

惠常高速公路东起惠东大岭,西至东莞常平。2005年1月~5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惠州市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惠东县博物馆联合对工程建设中的文物点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主要发现有:

1.商时期遗址1处。位于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黄洞村委会大坪村背窝尾坳。总面积约3千5百平方米。采集有较多绳纹、方格纹、梯格纹黑、褐色夹砂陶和灰白色泥质陶片;大石铲,梯形镑,有段镑,戈,镞等。经试掘:商时期文化层分两层,第一层厚20~38厘米,灰黄色亚粘土,出土梯格纹、凸棱纹夹砂黑褐陶、褐陶和泥质灰陶片,包括方唇卷沿

罐、高领罐、圈足盘等。第二层厚35~40厘米,黄色亚粘土,土质较纯净,出土较多陶片,包括罐、高领罐、圈足盘等器形,还有3件梯形石镑。

2.商周时期遗物点1处。位于惠城区沥林镇君子营村委—会深坑村书房背心西边,发现细绳纹灰褐色硬陶片;在君子营明宗小学南约300米处采集到黑褐色方格纹陶片,黑色素面圈足盘等。

3.宋代墓葬1座。位于惠阳区平潭镇高明村委会寮屋山西边,发现并做了清理,随葬品为两个并排放置的釉陶罐(谷仓),上以青瓷碗反扣作盖,置于室内前方。

4.春秋战国遗址1处。位于华泰科技园后东莞市谢岗

镇大龙管理区竹头角山。采集有方格纹、菱纹、菱格篦点、弦纹、菱格凸块以及圈点、篦点、弦纹、附加堆纹陶片,多是泥质灰色硬陶,器形有罐、盒等。另有3件梯形石铤。总面积约2万5千余平方米。

5.商时期墓地1处。位于谢岗镇大龙管理区榕树岭。采集有绳纹、方格纹、叶脉纹、圈点纹陶片以及梯形石铤,有段石铤,石戈等5件石器。清理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座,长2.3米,宽0.6米,残深0.25米,方向75°,随葬器物2个,放置于墓坑中部偏东位置,其一为灰褐色夹砂直口扁腹矮圈足壶,与福建昙石山晚期及粤东商时期同类器物相似;另一个为黑色夹砂釜,出土时已破碎。总面积约2万7千余平方米。

6.战国村落遗址1处。位于谢岗镇大厚管理区打鼓岭。采集有方格纹、雷纹、菱纹、米字纹陶片,梯形石铤等。陶器有罐、鼎、豆、盒、孟等。文化层分两层,第一层厚12~40厘米,黄褐色粘土,结构较紧密,出土较多陶片。陶片以泥质灰陶为大宗,夹砂陶次之。器形有鼎、豆、罐、簋、釜。纹饰有方格纹、水波纹、菱纹、弦纹、篦点纹、米字纹等,以方格纹居多。该层叠压柱洞5个。第二层厚20~52厘米,红褐色粘土,结构紧密,含少量烧土和炭粒,只见极少的陶片。遗址呈S形,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广东考古发现的第一个战国时期的聚落遗址。

7.战国遗物点1处。位于谢岗镇金满湖度假村后与养猪场之间山头。采集到方格纹罐片,素面泥质灰陶豆等战国遗物。(冯孟钦)

(二) 天汕高速公路蕉岭坪顶炭遗址

2005年5月~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蕉岭县博物馆联合对天汕高速公路蕉岭坪顶炭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蕉岭县文福镇红星村文槐付屋坪顶炭东坡。此次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山顶较薄,山边较厚。

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要陶系,另有夹细砂的灰黑陶、红陶和黄陶等。泥质陶又以硬陶为主,约占60%,火候较高,掷地有声。细砂陶火候较低。陶器纹饰有复线菱格纹、菱格纹、粗弦纹、间断条纹、曲折纹、方格纹、条纹、条纹附加堆纹组合、水波纹、网格纹、菱形对角线纹、圈点纹等,而以复线菱格纹最为常见。陶器器类有大口尊、罐、钵、豆、杯、盆(簋?)、小罐、器座和纺轮等。石器包括铤、斧、镞、戈、环、饼、网坠。铤35件,镞5件,环、戈各2件,斧、网坠、石饼、杵、镰、拍、圭(?)和砺石各1件,共51件。其中石戈是这个时期的典型器物。初步分析,坪顶炭遗址与“后山类型”和“浮滨文化”相关。高领罐、折肩罐、钵等与“后山类型”同类器相似,大口尊与浮滨文化同类器有相似点,但差异也很明显,它口大而器身较短,浮滨的却是大口长颈。凹刃石铤、石戈与浮滨同类器有类似点。综合分析,坪顶炭相当“后山类型”晚期或晚于“后山类型”,而早于浮滨文化。年代约当商代早、中期,距今3300年前后。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不见于“后山类型”,与浮滨文化的大口尊也明显

区别,因此,该遗址很可能填补了“后山类型”与“浮滨文化”之间的缺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冯孟钦)

(三) 电白县“谯国夫人冼氏墓”勘查与建筑发掘

冼夫人是六世纪时岭南地区杰出的民族首领,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岭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陵园位于电白县电城镇北五公里山兜村。2004年曾进行过初步勘查,发现了“三组”墓上建筑。为了弄清“三组”建筑的相互关系和规模,以便制定保护规划,2005年7月~2006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电白县博物馆对其联合做进一步的勘查,并对地面建筑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发现了“广东隋唐时期第一个陵园建筑实例”。陵园南北约110米,东西约160米,四周墙垣多已毁坏不存。从残存部分看,底宽5米,先挖槽再夯土,旁树柱栏板挡土。建筑位于陵园中部,坐北朝南(偏东11°),北部为主体建筑,主体前为天井,东西两侧为厢房,并见门、廊柱础。根据层位关系和遗物,建筑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隋唐建筑,第二期为北宋建筑。初步推断,两期建筑形制一致,但宋代规格比隋唐规格略为缩小。建筑建于高出隋唐地面约50厘米的朝北呈“凸”字形的土台上。土台南北长42米,东西最宽33米。两期主体建筑也作“凸”字形,向北凸出。北宋主体面宽22米,初步判断为七开间,进深6米,北面龟头屋南北1米余,东西3米多。隋唐主体与北宋主体相似,所不同的是龟头屋较大,南北6米余,东西8米多。天井东西长12.5米,南北宽2.5米,深30厘米。主体建筑、天井、天井前面及东西厢残存排水设施都铺设铺地砖。天井前面有一对莲花纹柱础,间距3.3米。土台前部有东西两排柱础,西边残存5个,东边残存1个,东西相距近4米,可能是廊一类建筑遗迹。出土遗物较丰富,建材类有覆莲式、覆盆式、圆柱式柱础,莲花纹瓦当,各种板瓦、筒瓦,其中包括琉璃瓦;陶瓷类有陶罐、盆,青釉仰莲香炉、砚台,青瓷碗和黑釉盏等;此外还有铜镜1面,铜钱2枚(皇宋通宝和元通宝)。该建筑当是祭祀类建筑。

(冯孟钦)

(四) 湛江硇洲岛海域清代沉船调查

广东省文化厅于2005年开办了广东省首届水下考古培训班,2005年11月~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培训班在湛江市硇洲岛海域进行水下考古实习,对一条沉没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商船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和试掘。沉船位于硇洲岛以西的东海湾南部海域,东距硇洲岛约8.5海里。该海域水深7~9米。通过调查和试掘,共采集和发掘沉船遗物468件,其中以铜钱的数量最多,占67.5%。其余遗物有银币、银锭、陶瓷器及陶瓷碎片、铜砵码、铜灯、铜锁、铜器座、石砚、压舱石等。其出水遗物清晰地揭示了沉船的大致年代是在乾隆时期,出水的铜钱95%以上是乾隆通宝,还有少量是较早些的康熙通宝。出水银币是在中国流通过,打上了商号印记的银币,其上有公元纪年,但纪年年号大多模糊不清,隐约可以看到卡洛斯世和卡洛斯世

的等文字。据史料记载推断,其年代应该在公元16世纪中后期,与中国清代乾隆时期大致相当。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该水下遗址是一条清乾隆年间沉没于这片海域的商船。(崔勇 魏峻)

(五)广州市出土西汉南越国木简

继2004年上半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后,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继续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最重要的发现当数在2004年11月23日~2005年1月24日期间于一口南越国井(J264)内清理出的百余枚南越国木简。从考古学史看,在王宫御苑原址上出土简牍的情况较为罕见,该批木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岭南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改写了广东无简牍的历史,还极大地扩展了南越国史的研究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木简的J264位于1997年发掘的南越国曲流石渠西北约15米,井口距地表深4.2米、井自深约3米。上部用扇形井砖砌筑,砖15层,高85厘米,下部为6节陶制圆形井圈叠砌,高2.06米,节高约33~35厘米,每节井圈有4个基本对称、穿透井圈壁的椭圆形孔。

该井上层用井砖砌筑的井壁部分有3个缺口,均为井壁砌筑时专门留出,东、西侧缺口分别与外侧的东西向木质水渠相连,为入水口;北侧有椭圆形陶制管道口向北延伸,为排水口,说明这是一口渗水井。

井内堆积分16层,木简出土于第6~15层。经清洗确定,井内共有整简和残简100多枚,均为木质。完整的木简长25、宽1.7~2.4、厚0.1~0.2厘米左右。绝大多数为单行文书,仅一枚为2行半字。简文均墨书,字数不等,完整木简的文字最多为23字,最少者3字,一般以12字左右居多。清洗时木简上尚未见到编连痕迹,从内容看有一部分为一事一记的单简,而大凡12字简原应为编连成册。木简上的文字字体多为扁横、波磔明显的成熟隶书,少数文字含有婉转圆润、端庄凝重的篆书意味,隶书的总体书写风格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书文字,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文字接近,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文字有一定区别,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经初步考察,这批木简的性质主要有籍簿和法律文书2种,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南越国的各项制度和南越国王宫生活,可大大弥补南越国史的记载不足。如宫室管理,多枚木简上出现了“出入”二字,可能属宫内外人或物品的出入籍;职官制度,简文中出现“陛下”、“公主”、“舍人”、“左北郎”等官职,其中“左北郎”文献未载,而简文中的“陛下”、“公主”更是自南越王墓发现“文帝行玺”等重要文物后又一次发现的可直接证明史书汉南越传中关于南越王称帝内容的文物;地理内容,简文中出现了“番禺”、“南海”、“横山”等地名,对于南越国政区地理、疆域沿革、秦汉地理等的研究意义重大;法律内容,简文中有“当笞五十”、“不当

笞”等内容,反映出南越国施行的法律制度,一些爱书性质的木简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南越国法律文书;社会风俗,简文中出现的“大鸡官”等内容为文献所不载,学者认为其可能与《汉书》等文献中越人善用鸡卜的记载相应;宫苑管理,简文出现如“宫门”、“守苑”等与宫室苑囿相关的内容,是对南越国宫苑所在地性质确认的最重要物证。除上述内容外,很多简还直接或间接反映出南越国时期的物产、禽鸟和树木种植等方面的内容。

从传世文献看,《史记·南越列传》作为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南越国历史的资料,全文仅约2400字左右,而这次出土的简文文字的数量已经逾千,不仅数量几近其一半,而且其时代还要早于《史记》成书80余年。从简的埋藏情况看,木简可能是当时在文件废弃后将其扔进井内,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也是最直接的第一手文献,是名副其实的王宫档案。它们的发现不仅会大大扩展南越国史及秦汉史的研究范围,还以其出现的“守苑”、“宫门”及明确的纪年等内容,彰显出南越国遗址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进一步证明以往对该遗址定性、定位和定名的正确,为南越国考古的分期断代树立起新的标尺。

(韩维龙 刘瑞 莫慧旋)

(六)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

墓葬位于农林东路24号大院工地。2004年2月~2005年3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该墓方向282°,其“凸”字型墓坑残长15.86米,最宽处8.9米,残深1.47~3米,坑壁上半部因早期崩塌呈不规则形状。墓室由墓道、前室和人字顶主室构成。前室位于主室西侧,平面作长方形,内长3.45~3.7米,宽1.7~1.84米,残高0.81~1.42米。主室平面为长方形,内长6.96、宽3.74、残高2.26米,顶部由南北两排枋木构成的人字形顶板。

该墓早期被盗严重,黑漆单棺已散,棺板周围见墓主头发、牙齿、人骨碎片的零星残留。仅余陶、漆、木、皮、石、骨等遗物19件套,其中髹漆皮甲为战国至西汉早期能复原的第一套实用皮甲。

该南越国人字顶大墓是继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福建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室墓之后全国发现的第三座人字顶墓葬,也是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此类墓葬。由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等综合判断,该墓当为南越高级贵族的墓葬。

(全洪)

(七)广州市增城金鸡南越国时期木椁墓

古墓位于增城市新塘镇沙埔村荔新公路南侧地名金鸡的一个土丘上,在施工挖土中遭破坏。2005年3月4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清理。该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坑东西长6.75米、南北宽4.82米、深2.3米,规模较大,用料讲究,椁室外经白膏泥夹炭封固等特殊处理,显示墓葬规格很高。在散落在墓口附近的泥土中,检出被破坏的随葬遗物残件30多块。经器物残件的拼对,有铜鼎、铜甗、铜四山纹镜、铜器盖、玉璧、绘画漆盘、陶鼎、陶提

筒等,大多数制作精美。这是一座典型的西汉早期的南越木椁墓,距今约2100年。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增城属首次发现。史志记载增城东汉时期建县,但早在建县前二百多年就有这样的大墓,显示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为南越国时期墓葬分布及其形制发展演变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全洪)

(八)广州市中山四路南越国、南汉时期遗址

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与北京路交汇十字的东南,2005年9月~1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南越国时期的建筑基础堆积最厚达2米左右,发现一口打破基础垫土的水井。井由扇形青灰砖砌成,口径1.2米、深6米。该井为西汉时砌筑和使用,后世一直沿用,至清代仍在用。建筑基址出土南越国时期的灰陶罐、器盖、万岁瓦当、印花方砖残砖。南汉的建筑基础修在南越国时期的基址之上,基址保存不多,发现建筑礅墩2个,东西并列,间距约7米;石柱础3个,直径1米,其中2个石柱础保存完好。由于受宋代大型抗坑的破坏,石柱础均倾倒于该抗坑内。在抗坑内发现大量南汉建筑材料,有双凤狮子纹印花方砖、双凤纹瓦当,莲花纹瓦当、乾亨重宝铅钱等。宋代的建筑基址分别发现三个层面,为砖铺地面,每一层面上均有断续的建筑砖墙基础、礅墩等,还有门阶一处。

南越国、南汉时期的建筑基址均被宋代建筑严重打破,但从保存下来的部分建筑基址看,其规模与处理方法均与中山四路北侧儿童公园内的南越国、南汉时期建筑基址具有相同的特征。该工地发掘发现南越国、南汉国时期的建筑台基址是此次考古发掘的一大收获,尤其是南越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表明中山路以南也有南越时期的建筑遗迹分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洪)

(九)中山五路大马站商业中心东汉至三国木简

2005年9月~1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商业中心发现的古代遗存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00余平方米,在探方内清理出南越国时期的建筑垫土层及建筑的木结构残迹、东汉—三国时期的房基柱洞、晋南朝的房基柱洞、唐—五代的建筑垫土以及各时期的水井、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瓦当和陶瓷质的罐、碗、杯、碟、盘、盆等建筑材料和生活器具。

这次发掘重要的收获是:在一口砖砌水井中发现了有字的木简。现存井口距地表4.9米,井口直径0.7米。井壁上部用扇形砖错缝平铺,下部用绳纹条砖和楔形(刀)砖丁立交错结砌。井里堆积可分两层,上层为黑灰色粘土,厚约1.5米,出土大量陶罐、钵、盆等;下层是沙质灰土。在距井口深约2.1米处,发现一串“五铢”铜钱(约700余枚)。在井中发现木简3枚。其中2枚较为完整,墨书文字,经初步辨认约有20余字。木简的字体近行书,其年代可能为东汉以后,结合水井及共出的遗物分析,有可能是三国时期的。这是续原儿童公园南越木简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全洪)

(十)广州市中山四路旧仓巷东汉至宋代城墙

城墙位于中山四路北侧,旧仓巷西侧,2005年7-9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100平方米。揭露长9米,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

该段城墙始建于东汉,东晋、唐宋时期扩展沿用。东汉城墙为夯土墙,修筑于灰黑色河滩淤土之上,上窄下宽,残高2.8米。基部保存较好,宽约8米,上部残损。东晋城墙东汉的夯土墙体上加宽,并在两侧壁砌砖包边,部分砖上印有“泰元十一年(386)”铭文。唐代在东晋城墙基础上再次扩宽,基部以石块垒筑,上部包砖收分明显,墙垣包砖为双隅。第四期约建于南汉或北宋,墙体进一步加宽,单隅砖墙包边,用砖讲究、规格统一,并发现局部可能与马面、瓮城有关的遗迹。出土遗物有东汉陶器、绳纹板瓦、筒瓦、东晋“泰(太)元十一年十月”纪年砖、晋南朝青釉瓷、唐代黑釉瓷、宋代青瓷等。

此处发现与1996-1998年在中山五路清理的东汉、东晋、南朝城墙有密切关系,经发掘基本上可以确定东汉至唐代广州古城和宋代子城的东、西城墙位置,对研究广州古城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暂无证据表明此始建于东汉的城墙是否与汉末孙吴步骖重修广州城有关。

(全洪)

(十一)广州市淘金街淘金花园西汉至清代墓葬

墓地位于淘金坑淘金路42号淘金花园建设工地,2005年5-10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古墓葬18座,其中西汉中晚期墓3座、东晋墓2座、唐墓1座、宋墓1座、明墓3座及清墓7座,出土有陶、瓷、石、玛瑙、琉璃、铜及铁等不同质地的文物共186件。

西汉墓三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由墓室、封门、墓道组成,墓道均为长方形斜坡式。西汉墓出土有铜碗、铜勺、玛瑙珠、滑石炉、陶罐、瓮、壶、鼎、温酒樽、簋、匏壶、提筒、五联罐、小盂及小碗等随葬品。

东晋墓两座,M10为长方形砖室墓,长3、宽0.9、残存深度0.66米,墓室四壁为单隅错缝结砌,底部横、竖相间平铺砖,其顶为叠涩。墓砖灰白色,多为长31、宽21、厚4.5厘米。该墓出土“大兴三年”纪年砖一块,是广州地区首次发现有确切东晋纪年的叠涩顶砖室墓,为墓葬的断代提供了准确依据。两座东晋墓出土有青瓷碗、盆、圆形六格果盒等随葬品。

M8是一座宋墓,由地上建筑和地下墓穴两部分组成。地上建筑包括坟圈、活动面、墓口上部封土、祭祀区及通道等。其坟圈为圆形,内径4.4、残存深度为0.1~0.2米,用青砖单隅错缝结砌,砖长29、宽14、厚3.5厘米。地下墓穴位于坟圈的中部略偏西,墓室长2.88、宽1.4、深1.6米,四壁用砖单隅错缝结砌,墓室底部横向往平铺砖,上部用八块红砂岩石板横向盖顶。石板多为长125、宽40、厚12厘米,打制规整,墓道均匀。出土有铜镜、铜带扣、铜钱、石环、青釉四系罐及青釉碗等随葬品。该墓的发现为广州地区宋墓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全洪)

(十二) 深圳市赤湾右炮台遗址

2004年12月~2005年1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赤湾右炮台进行试掘,7~8月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62平方米,清理出炮台遗迹及一批当时炮台驻军的生活用品和军事用品。

赤湾右炮台位于广东深圳市南山区赤湾港西侧的岬角上,东南有赤湾左炮台,东北为小南山,西南是珠江口的伶仃洋,它与赤湾左炮台形成犄角态势,是清朝重要的海防军事设施。

赤湾右炮台枕山面海,坐东北,朝西南。炮台西面设置大炮的露天实心高台已毁,炮台围城由东、南、北3道围墙及西面的露天实心高台构成。围墙宽厚坚固,围墙基址用不规则石块构筑,东围墙基址宽3.38、南围墙基址宽2.15、北围墙基址宽2.25、围墙残高0.3~1.8米。炮台台门设在炮台北围墙西端,残高1.8、宽1.6、门深2.2米。在台门处设一门槛,门槛为长条形青麻石,两侧各置有0.2×0.25米的石门臼。台门内有一竖门栓的条石,长1.5、宽0.2米,中间置7个8×8、深3.5厘米的方孔。台门内一侧建有一道台阶,由围墙连接设置大炮的露天高台。

围城内有面积大小不等的7间房屋,其中有4间住房,1间伙房和2间弹药库房。住房及伙房建在围城西部,弹药库建在围城东部,由一条0.8米宽南北走向的过道把住房和伙房与弹药库区分开,过道下设青砖构筑排水道,南侧为暗沟,北侧为明沟,深42、宽18厘米。西部中间有一东西走向宽1.6米通道连接台门,通道南、北两侧有5间房屋,南侧为3间住房,北侧为1间住房和1间伙房。东部的弹药库外设一大门,大门与西部中间的通道连接,大门残高0.38、宽2.29米,用青砖砌筑。弹药库内设2个库房(南

侧的库房大部分已毁)。住房、伙房及弹药库房的墙基为砖石构筑,墙体为三合夯土,宽0.32、残高0.35~1.25米。住房和伙房墙面残留灰沙抹过的明显痕迹,火药库房的墙面部分灰沙已脱落。房门宽0.7~0.75米,房屋地面用青砖铺砌。

右炮台出土炮台驻军的生活用品及军事用品180件。其中生活用品105件,包括陶器36件,主要有罐、壶、钵、虎子、陶饼、盒、灯盏托等;瓷器60件,有碗、盘、碟、壶、杯等;石器3件,为砺石;铁器3件,2件铁镰刀,1件铁耙;铜钱4件,2件为康熙通宝,1件为嘉庆通宝,另1件锈蚀严重。军事用品75件,其中陶器6件,有火药缸、盆;石器5件,为石炮子;铁器64件,为63件铁炮子,1件铁炮残件。

从器物的造型、釉色及纹饰来看,出自香港大埔窑、佛山石湾窑、江西景德镇窑及福建德化窑等;器物的年代,上限为清初康熙,多为雍正、乾隆,下限为道光时期。

赤湾右炮台遗址的发掘,为判断其修筑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唐宋时期,香港屯门为海外交通枢纽,明正德九年(1514年)~正德十六年(1521年)葡萄牙人强占屯门七年之久,此时广州对外滨海下舶处已移至今日之宝安(深圳)南头。而“深圳赤湾等港湾阳古代海外交通住泊之地,可以窥见运载倾销于世界各地中国瓷器的船只在此补给,装卸转运情况。”赤湾右炮台遗址出土如此丰富的陶瓷器物与上述记载相吻合,说明明清时期位于珠江口岸,作为广东省会门户的赤湾港是重要的海外交通港湾。

赤湾右炮台是清初政府修筑的海防军事设施,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广东在清初筑有此类炮台65座。赤湾右炮台遗址基本保存了当时的原貌,它为研究清初的海防和军事设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刘均雄)

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 百色市枫树岛旧石器遗址

2004年12~2005年1月,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由广西自然博物馆主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右江民族博物馆和田东博物馆参与的研究小组在位于百色盆地西部澄碧河风景区内的枫树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首次从地层原生网纹红土中发现出土五件手斧以及同层位的十二件玻璃陨石,同时还发现近百件包括石手镐、石核、石片等石制品。

枫树岛遗址位于百色市西北约15公里,属于右江支流——澄碧河的第四级阶地。含石制品的网纹红土分布于枫树岛北坡,厚约10米,底部砾石层厚约1米。遗址顶部海拔高度190米。石制品位于网纹红土中部。五件手斧均为二面加工,原料为砂岩和火山岩,上面保留网纹红土留下的印记,与百色盆地其他遗址发现的手斧相似。该遗址发现的手斧等与玻璃陨石处于同一层位,因此枫树岛遗址

手斧的年代应该与玻璃陨石在亚澳散布区散落的时代一致,为距今70~80万年。

枫树岛遗址首次从地层中通过考古发掘发现手斧,而且与原地埋藏的玻璃陨石位于同一层位,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百色旧石器的地层和年代,对解决目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百色石器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该发现是从地层中发现石器、从地层中发现玻璃陨石和石器共生之后,百色旧石器研究的又一重要进展和突破。对进一步研究东亚早期人类的起源、演化和相关环境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王颀)

(二) 都安县北大岭遗址

2004年6月~2005年5月,为配合乐滩水电站工程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都安瑶族自治县北大岭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战国、汉代、宋至明清共五个时期的文化遗迹和大

量遗物。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玉器等种类,以石器的数量为最多。遗迹包括石器制作场、墓葬、灰坑、柱洞等,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大规模石器制作场揭露面积近16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多达5万余件。

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对各期发现的墓葬、出土遗物特征分析,北大岭遗址第一期出土的陶器火候低,制法原始,多见泥片贴筑法,纹饰较单一。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磨制部位以刃部为主,不见双肩石器,打制石器仅见极少量的砍砸器。墓葬埋葬方式以屈肢葬为主,出现肢解葬。综合广西革新桥遗址、顶蛳山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分析,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第二期文化出土的陶器以泥质、夹细砂陶为主,不见第一期的粗砂陶,纹饰也以细绳纹为主,第一期的粗绳纹已消失。陶器器形增加,有高领罐、带耳罐、小陶罐、陶钵、陶盆等,以高领罐居多,并出现装饰花边。石器则以双肩磨制石器为主,选料讲究,磨制精美。此期的文化内涵与第一期有明显区别,特别是有肩石器、石铲的出现,表明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三期墓葬形制单一,随葬品简单,数量较少,不见兵器。广西的平乐银山岭、武鸣安等秧山等地发现了大量的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等器物。根据与这几处墓地材料比较,此期墓葬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第四期墓葬的形制、出土的陶器、铜器、玻璃器与广西合浦、贵港、平乐银山岭等汉墓出土的器物相似,为汉代墓葬无疑,但十七座墓葬可能也有早晚关系。第五期的遗迹、遗物稍为凌乱,但出土的瓷器中有广西宋代民窑瓷器常见的器形和釉色,陶器也有宋代常见的器物,并发现清代墓葬和铜钱,因此年代为宋至清代。

北大岭遗址的发掘,使广西首次在一处遗址中发掘出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代基本衔接的不同时期的遗迹和墓葬,为研究红水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社会经济形态、生活风貌、丧葬习俗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发现的双肩石器坑,为探讨广西大石铲的起源找到了新的证据。

(林强 谢广维 宁永勤)

(三)百色市百达遗址

2004年4月~2005年3月,在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百色市右江区文物管理所,对百达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发现一批重要遗迹,出土遗物五万多件。

百达遗址是一处露天遗址,位于百色市以西约50公里的阳圩镇六丰村百达屯西侧的山坡上。本次发掘分为A、B、C、D区,发掘深度一般为1、最深的地方达5米。4个区的文化堆积基本一致,即上部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下部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其中A区的第3、4层含有大量的螺壳。

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至少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以大量

的打制石器和少量的斧、锛坯件为主要特征;第二期以一种形制独特的尖状砍砸器和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经测定,第一期文化距今约9000年,第二期文化距今约7000年。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也可分为二期,第一期的石器个体较大,工具类型中含有手镐;第二期的石器个体较小,缺乏手镐。初步推测应为更新世晚期,年代可能早到距今约10万年。

此次发掘不仅出土大量的文化遗物,而且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遗迹:

1. 新、旧石器时代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 遗址的文化堆积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堆积的上部为新石器时代,下部为旧石器时代。地层叠压关系清楚,文化遗物也明显不同。

2.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场 在第3、4层各发现一处石器制造场,分别位于A区北部和B区东南部。A区制造场的面积约20平方米,场内分布着大量制作石器的原料、制作工具、不同制作阶段的产品以及断块和碎片等,此外还杂有少量螺壳;B区制造场的面积约80平方米,场内分布的石制品和A区相同,但没有螺壳。

3. 新石器时代的建筑遗迹 在C区东南部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柱洞群,均开口于第3层底,打破第4层。柱洞平面均为圆形,直径一般为10~15厘米,深10~20厘米,排列有一定的形状和规律。这一柱洞群应是一处建筑遗迹,可能属于古人类居住的地方。

4. 新石器时代墓葬 在A区发现墓葬三座,分别编号为M1、M2、M3。其中M1、M2位于地层的第4层,M3位于第6层。3座墓葬的入骨架均不完整。M1仅见残破的头骨及数段肢、肋骨,头骨上方压着一大块石头;M3只残留头骨和下颌骨,且头骨和下颌骨分离;而M2则保留大部分骨头,应为仰身屈肢葬。三座墓葬人骨周围均发现一些石制品,可能是随葬品。特别是M3随葬的石制品集中成一堆,位于头骨和下颌骨一侧中间,呈三角形分布,其周围无任何石制品,显然是有意识放置的。

5. 新石器时代用火遗迹 在A区的第3层发现一处用火遗迹,面积约2平方米,厚达30厘米。在遗迹范围内,分布大量的炭屑、红烧土以及相当数量的兽骨和石制品。

6. 出土数以万计的文化遗物 此次发掘,出土文化遗物5万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其数量之多,是广西历次考古发掘中前所未有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另有少量陶器和骨器。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原料几乎都是取自河滩的砾石,器形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斧、石镑、石凿。石刀、研磨器、石锤、石砧等;陶器均为夹砂陶,饰以绳纹,从可复原的器物看,器形仅见罐一种;骨器有骨针和骨锥等,其中骨针有单尖和双尖,这些骨针和骨锥均发现于A区的螺壳堆积层。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种类有石锤、石核、石片等。石器均用砾石直接打制而成,器形有砍砸器、手

镐、刮削器等。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初步鉴定,水生动物包括螺蚌、鱼、龟鳖、螃蟹等;陆生动物种类有猴、熊、鹿、野猪、野牛、竹鼠、鸟类等;植物有橄榄核等多种。在A区的第4层,发现大石砧周围分布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的破碎肢骨和砍砸器等石制品,可能与古人类在消费这些动物时敲砸骨头有关。

百达遗址分布面积为2.5万平方米,是广西西部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跨越新、旧石器时代的史前遗址,也是我国华南地区第一处具有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的露天遗址,其文化堆积之厚、遗物之丰富、跨越时间之长,在我国也是少见的。这对于研究古代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构建我国南方乃至东南亚地区史前年代框架

及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次发掘不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化遗物,而且在新石器地层中揭露出多种遗迹和古人类活动面。特别是发现的建筑遗迹——柱洞群,其分布范围之大,在广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在新石器地层中发现了螺壳堆积区域、石器制作场、柱洞群等遗迹,包括了生活区、石器制作区、居住区等不同活动区域,而且这些区域分布在遗址的不同部位,表明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分区。

此次发现的墓葬为研究华南地区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壮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葬俗等,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大量动植物遗存的出土,对于了解遗址所在地区古人类的经济生活、生存与环境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谢光茂 彭长林 黄鑫 周学斌)

六. 贵州省

(一) 威宁县中水遗址

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单位对贵州威宁中水史前至汉代遗址与墓地进行了首次发掘。2005年9月至11月,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对其中的鸡公山遗址进行了进一步发掘。两次共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清理出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初步建立了黔西乃至滇东地区青铜文化的时代序列,新确认出鸡公山文化等新的考古学文化,并为认识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状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新资料。

中水盆地位于威宁县西端的云贵两省交汇处,东南距威宁县城110公里,西北距昭通市区22公里。盆地由高原原面、湖积台地和河流阶地构成,其中河流阶地面积仅约数平方公里。这一带地势开阔,环境优越,适宜人类生存。迄今为止,在盆地内低山和湖积台地上已发现近12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遗址与墓地。此次发掘,分别在鸡公山、吴家大坪、营盘山、红营盘和银子坛几个区域进行,以鸡公山发掘成果最为丰富。

1. 鸡公山遗址

位于盆地中部中河东侧的一小山顶。海拔1939.5米。山呈南北向,遗址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发掘采用象限法统一布方,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整个遗址地层堆积薄,许多遗迹开口于表土层下或直接出露于地表。在发掘的3000平方米面积内,清理出坑、墓葬、房屋建筑、沟和路等遗迹343处。其中坑315处、墓葬19座、房屋建筑遗迹7座、沟和路各一条,出土遗物中完整和可复原者千余件。

遗址中坑是数量最多的一类遗迹,基本上整个遗址就由众多的坑构成,坑分布密集但少有打破关系,坑按坑口形状可分为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相当部分的坑壁和底均涂抹一层青膏泥。坑的分布具有规律,山体东侧由下到上分圈分布,山北侧、南侧和东南侧又可相对独立分开,南北两侧的坑区别明显。北侧坑大,且多有用火

痕迹,坑内填土夹大量木炭、红烧土和碳化水稻,填土中出土许多完整陶器与石器,陶器基本组合为瓶、罐、杯和器盖,部分坑的坑内有人骨遗骸,有的为严重扭曲的未成年人,有的只有少量肢骨或人头骨,有的骨骼还被火烧过,推测可能与祭祀用人有关。南侧和东南侧的坑较小,基本不见用火痕,出土器物也少,坑内多放置一至二件陶瓶和罐。这种差异可能反映着功能的不同。在近山顶东北侧,有被开凿平整的大平台,平台上南北向分布着数个巨大的圆形坑,均有较厚的烧土壁,可能是活动的中心区。

墓葬主要分布在遗址南侧,北侧只有一座。墓分布散乱,没有规律,墓向也互不相同,墓与墓之间的间距较宽,没有打破关系。已发掘的十九座墓葬,皆为不规则的竖穴土坑墓,面积在2平方米以内,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其中仰身直肢葬十三座,屈肢葬五座,二次葬一座,屈肢葬中有二座为二人合葬(M12、M13),随葬品不多,有的一无所有。

建筑遗迹由于地形原因,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侧和山顶北侧较平处,多被密集的坑打破,不完整,根据残留的柱洞和火塘情况看,为地面建筑,规模较小,一般呈长方形,火塘位于中部。

沟位于遗址东南侧,沟口宽近5米,残深1米余,沟壁弧直底近平,从沟底土质和沟的位置分析,该沟可能系挖膏泥加工遗址中众多坑的坑壁而形成。路在东侧第一圈坑与第二圈坑之间的陡坡下侧,破坏严重,路内壁面上还残留有烧土,路的整体结构不清楚。

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锛、穿孔石刀、石镰、石镞等。有肩有段石锛、梯形石锛、弧壁穿孔石刀等最有特色。在数量上,有肩有段石锛和穿孔石刀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穿孔石刀多为两孔,弧形壁,尾端呈尖锥状,顶端有尖锥形和圆弧形,是主要生产工具。

骨器、玉器和铜器数量很少,骨器主要有骨镞和骨饰。玉器主要有有领镯、玦,铜器主要有细耳饰、有段铜锛和铜

凿。

陶器制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并多经慢轮修整;小型器物则直接用手捏成。陶器器形不太规整,有的器物如瓶分别将腹和颈部做好后再粘接在一起,可明显看到套接痕,器耳等也是粘接上的。陶质以夹砂陶居多,有少量泥质陶。夹砂陶又分为夹细砂和粗砂,细砂陶多于粗砂陶。陶色基本是褐陶,由于火候不均,常见一件陶器不同部位陶色不同的情况,有的器物内外侧陶色不同。褐陶中最多的是红褐陶和黄褐陶。器物装饰简单,多素面,纹饰主要有罐口沿内外侧的瓦棱纹和陶瓶肩腹部的戳刺纹和颈部的细线纹,瓦棱纹不施于腹部。有极少量陶器器表经打磨光滑,并施有黑色陶衣。主要器类有细颈小平底瓶、单耳折沿罐、单耳带流杯、双耳带流盆、高领罐、敛口单耳小罐、碗、杯、圆饼形器盖、钵、豆等,其中,细颈小平底瓶、单耳折沿罐、折沿小平底罐(无耳)、带流盆、高领罐、单耳带流杯、器盖等是典型器物,其中尤以细颈瓶、单耳折沿罐、杯为基本组合。总的来说,该遗址的陶器特征是以小平底器为最多,偶有圈足或假圈足器,不见尖底器和三足器。造型特点是瓶类器形瘦长,大小悬殊。

鸡公山遗址中清理的遗迹数量丰富,种类齐全,出土遗物地域特征明显,组合关系固定且经常伴出,是代表分布在这一地域内的相同文化遗存的典型遗址。

2. 吴家大坪遗址

遗址位于中水镇中河村4组东北侧的吴家大坪坡地上,与鸡公山遗址相距约1.5公里,海拔1878米,面积近3万平方米,是中水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一处。但遗址破坏严重,绝大部分地方耕土下即是遗迹和生土,且遗迹异常分散。发掘采用象限法布方,揭露沟3条,灰坑11个,水稻坑3个,房屋柱洞三十多个。水稻坑是新发现的最重要遗迹,水稻数量大。出土遗物有陶器、磨制石器和大量螺壳。陶器多碎片,少量可修复,陶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陶为主,主要有黄褐陶和灰褐陶,纹饰主要有罐口沿内外侧的瓦棱纹和戳刺纹,器类主要有细颈瓶、折沿罐、高领罐、小杯、纺轮等,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锛、石凿。出土物的陶质陶色以及器类与鸡公山遗址陶器基本相同,碳14测年也一致,表明它们是同一文化的聚落遗址。

3. 营盘山遗址

遗址位于中河东侧云盘山西南侧半坡上,海拔1840米,隔河与吴家大坪遗址相望。2004年调查发现,面积近4000平方米。本次试掘探方6个,实际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地层堆积较好,最深处近1米,可分为4层,文化层主要是3至4层。试掘中清理的遗迹有房屋柱洞9个、灰坑3个和沟1条。出土大量陶片和石器。石器有弧壁穿孔石刀、石锛、磨石和打制石器。陶器基本上是碎片,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以夹砂陶为主,占85%,泥质陶占15%。夹砂陶中以夹砂黑陶为最多,占陶器总数的48%,次为夹砂白陶,占19%,夹砂红褐陶也占有一定比例,占13%。泥质陶中

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陶。陶器制法以手制为主,主要使用泥条盘筑法。以素面陶为主,占陶片总数的80%以上。纹饰主要有瓦棱纹、乳钉纹、齿纹和少量细绳纹。遗址下层出土陶器如细颈瓶、折沿罐等与鸡公山遗址基本相同,上层陶器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型如蒜头口小罐、折肩钵、圈足碗等,陶质陶色也有了明显变化。营盘山遗址的下层碳14年代与鸡公山晚期年代相同,说明其时代晚于鸡公山遗址和吴家大坪遗址,营盘山遗址可能系鸡公山文化的较晚类型。

4. 红营盘墓地

清理了26座墓葬,全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规模小,面积不超过2平方米。墓向具有一定规律但不一,其中11座朝北,8座朝南,7座朝东。葬式主要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但有两墓(M3、M6)为侧身屈肢。这批墓葬中15座墓有随葬品,随葬品数量少,种类单一,一座墓只随葬一至二件陶器或铜器。

出土随葬品56件,有陶器、铜器和玉石器等。陶器16件,均夹砂黑陶,手制,火候低,器表均素面,另有少量乳钉装饰。主要有带流鼓腹平底罐、鼓腹圈足罐、单耳折沿罐、圈足碗(钵)、直腹杯等,器型独特。墓葬中陶器一般放置在头顶,少数放置在胸部;铜器主要是铜兵器和装饰器,其中兵器10件,有柳叶形青铜剑、青铜刀、青铜箭镞等,其中青铜剑明显受巴蜀文化的影响;铜剑和磨石一起放置在胸腹之间,配套使用;装饰品12件,有铜镯、铜指环;玉石器主要有石璜、玉珙等,均为随身佩戴之装饰品。

红营盘墓地出土的陶器如带流罐、单耳折沿罐等与鸡公山等遗址陶器具有密切联系,表明它们之间具有传承关系。该墓地出土的直内铜钺、带穿柳叶形铜剑等时代较为明确,而墓地出土物和墓葬形制与银子坛墓地下层墓葬之间具有一定联系但更为原始,说明其时代要早于银子坛墓地,该墓地的时代处于营盘山遗址与银子坛墓地之间,大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

5. 银子坛类墓地

该墓地位于红营盘墓地西南,面积约2万平方米。此次发掘近700平方米。墓葬分布密集。清理墓葬82座,出土陶、铜、铁、玉、骨、漆等质地的器物近300件。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复杂的叠压打破现象,墓葬形制有从狭长形向长方形再向近方形发展的趋势,不同层位墓葬墓向不一,有朝北、朝东或西和朝南等,以朝南者为多。目前发掘的早期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葬式多为仰身,上肢和下肢摆放情况富于变化。上肢有直肢、内屈于胸、交叉等多种情况;下肢有直放和交叉等情况。后期出现多人二次合葬的现象,一墓内所葬个体在2~5人之间,并出现将颅骨置放在肢骨之上的捡骨二次葬现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清理的墓葬中有20座墓葬墓圻短小、入葬者的骨骼纤细,较明显是儿童墓葬,表明夭折的儿童也可以一并葬入公共墓地。在死者尸骨的处理上儿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葬具痕迹的发现,是此次发掘较为重要的收获之一。有31座墓葬发现明显板灰葬具痕迹,占墓葬总数的38%,说明木质葬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从板灰痕看葬具呈长方形,但四角侈出角状装饰。

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多放置在墓主头侧。陶器多手制,器形不规则,陶色有灰黑、灰黄、灰白等。纹饰简单,多素面。主要有单耳盘口罐、敞口单耳深腹罐、高领陶瓶、浅盘高圈足镂孔豆、喇叭口杯、陶碗等。部分陶器的肩部或口沿有刻划符号。早晚期墓葬之间陶器组合有所不同,早期主要以陶瓶和深腹陶罐为基本组合,中期除陶瓶、深腹陶罐外,新增加高杯镂孔陶豆,晚期又增加陶碗,形成罐、瓶、豆、碗组合,陶器在器形演变上一脉相承,口沿内外侧的刻划符号各期均有。

除陶器外,墓葬中还出土有铜(银)镯、铜钗、指环、铜带钩、骨块、玛瑙管和玉珠等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少数墓葬随葬铜矛、铜剑等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与滇池周围的滇文化风格相近,表明此时两地之间具有密切联系。银子坛晚期墓葬中出现了棺槨式葬具,随葬品中也出现了五铢、盖弓帽、铁器等,这些应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因而银子坛墓地时代在战国至西汉。

贵州威宁中水遗址是贵州近年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收获也最丰富的发掘,它不仅辨识出一个新的地方考古学文化——鸡公山文化,而且在一个小区域发现数种早晚不同的遗存之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和演变关系,可初步建立起滇东至黔西局部地区的史前考古遗存发展序列,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植物考古标本对遗址性质的认定和云贵高原早期稻作农业的研究至关重要,特别是南北不同文化因素的出现为探讨古代不同民族集团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该遗址考古发掘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张合荣)

(二)六枝老坡底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

2005年3月,为配合贵州六枝老坡底火电站大型工程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电站建设用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蔡家坟和青岗林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5至7月,省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了重点钻探和第一阶段抢救性发掘,同时展开详细调查,又发现下大田、台子田、丫口地、对门坡、包包寨和罗家寨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我们对位于电站施工区内的蔡家坟、台子田、下大田和青岗林4处遗址进行了重点钻探和试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

遗址群位于六枝特区县城西北约30公里的岩脚镇老坡底村,这里系一狭长形坝子,遗址就分布在坝子周围地势稍高的坡地上。蔡家坟遗址位于坝子西坡,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迹主要开口在生土面上,有房屋建筑、柱洞、灰坑、水坑等,出土物主要是陶片和少量石制品。台子田遗址位于蔡家坟遗址西南侧,相距仅约500米,面积2万平方米。遗迹主要有房址、围栏、灰坑、沟等。特别是在生土面上

发现数排围栏遗迹,这在贵州属首次发现。出土物主要有大量碎陶片和少量石器。下大田遗址位于坝子西南侧,地层最厚处近2米,清理出的遗迹有房址、灰坑、灶坑和许多零散柱洞。房屋遗迹呈长方形,单间面积10平方米左右,中间有一灶坑。出土物有大量陶片,少量石器。青岗林遗址位于坝子东南侧,新石器时代遗迹主要开口在生土面上,有房屋建筑遗迹、灰坑和大量零散柱洞。房屋建筑遗迹外侧还发现围栏或篱笆墙遗迹。出土遗物除大量陶片外,还有磨制骨器和石器。

上述几个遗址地层堆积厚薄不一,但地层特征和出土物基本相均夹砂,且主要夹粗砂。陶质疏松。陶色不纯,基本上是褐陶。纹饰同。新石器时代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均为碎片,陶质主要是方格纹。器形可辨者有釜、平沿罐、敛口钵、镂孔靴形空心支座、网坠、陶饼、弹丸和器足等。石器有石斧、石砧和砍砸器等。骨器有骨刀、骨铲和骨纺轮等。

老坡底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贵州近年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不仅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许多空白,而且对探讨中国南方早期聚落的构成与分布等提供了典型材料。遗址虽只作了较小规模的试掘和发掘,但揭露出的遗迹却比较丰富。出土陶器虽较破碎,但层位关系明确,一些器形如靴形镂孔支座、宽折沿釜等在贵州新石器时代还是新器形,有助于早日建立起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张合荣)

(三)黔西县汉墓

2005年5~6月,为配合黔西火电厂施工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黔西火电厂建设区域内所涉及的汉墓进行清理发掘,共发掘汉墓十座。

墓葬分布于黔西县甘棠乡红星村瓦窑、松林、三角村杨家寨以及城关镇双星村、石园村附近小丘陵地带,周围地势较为开阔。多为三、两座墓葬聚集在一较小区域内。所有墓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盗扰。十座墓葬按结构可分为土坑墓和石室墓两种。均分为长方形、刀形两种。其中石室墓结构较为复杂,墓室内有石砌二层台或边箱,部分墓葬形制为贵州汉墓第一次发现。墓室长度一般在2.82~7米之间,宽度多为1.38~5.4米左右,墓向20°~250°之间。葬具及骨架均已腐朽无存,仅少量墓葬发现有棺木残留漆皮痕迹。

随葬器物120余件。从质地上分有银、铜、铁、陶、石、琉璃、琥珀;器形有瓮、罐、甑、钵、豆、釜、釜、灯、碗、井、俑、刀、锄、削、锯、钎、带钩、铺首、泡钉、模型、钱币等。由出土文物分析,墓葬年代在东汉中期。(胡昌国)

(四)沿河县洪渡汉代窑址群

窑址群位于洪渡镇政府以北1.26公里,小地名丰产坝和大坝田,中心位置东经108°18.723,北纬28°58.527,海拔259米。2005年10月~12月,为配合乌江彭水水电站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群进行了

发掘。发掘采用探方法,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共揭露汉代砖瓦窑6座。灰坑10座,沟1条。窑址群的整体揭露是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窑结构分前室、窑门、窑室三个主体部分,有的窑窑门中还保存有火门;窑室内又分火膛、窑床、排烟设施(烟火槽、烟道等)几种结构。窑室的平面形状呈“马蹄”形。烟道设置在窑室后壁。

窑内出土物主要有汉砖、瓦、瓦当、纺轮和青铜镊子等。主要是汉砖和瓦,说明该窑址群是汉代专门烧制砖瓦的。砖形制有花纹砖和普通砖两种,砖呈青灰色,常见的一种花纹砖具有子母口或类似木作中的“榫卯”结构,一端中间位置凸出一个半圆形的“舌”形结构,相对的在另一端则制作出一个可以套合的凹口。瓦与瓦当颜色以青灰色为主,少数呈棕色,皆装饰有绳纹。瓦之形制可以分作板瓦与筒瓦两种,其中板瓦又可以分作大、小型。筒瓦形制简单。瓦当出土数量极少。

该窑址群是贵州境内首次发掘的规模大结构清楚的汉代窑址群,通过发掘,了解了汉代砖瓦窑的形制以及生产程序,为以后的复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其中的五号窑(Y5)是各窑中保存最为完整者,是一笔很有价值的资料;在过去发表的汉代砖瓦窑中,尚未见保存如此完整者。另外,Y6作为一座生窑,对于复原此类砖瓦窑的建筑方法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根据在本地发掘的汉墓资料,这些窑址中出土的花纹砖应是专门为营建墓葬而生产。通过对乌江流域等地汉墓资料的比较,可以分析这些窑的产品的消费范围。这样可以进一步了解沿乌江的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问题。

(张合荣 刘文锁)

(五) 贞丰县木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为了配合广西天峨龙滩电站的建设,2005年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贞丰县白层镇兴龙村木耳山遗址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90余平方米。

木耳山遗址位于贵州省贞丰县白层镇兴龙村,地处北盘江贞丰段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46'560、北纬25°26'016附近,距贞丰县城约30公里,距白层镇政府驻地约10公里,遗址东临北盘江西岸,与贞丰县鲁容乡政府隔江而望。木耳山为一高约30米的小山包,山的东、南、西三面为一些小台地,北面为一小峡谷,下有一小河经过,在东面靠近山的顶部还有一岩厦。

此次试掘共清理出墓葬1座,灰坑2个,出土器物二十余件,计有陶、石和玉器。由于出土的陶片过于细碎,而且没有完整器出土,因此其器型不清楚,陶片主要以绳纹夹砂陶为主,石器主要有锛,玉器主要为玉环以及玉料等。

该遗址的试掘为下一次的大规模发掘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丰富了贵州地区的新石器时期的材料。

(吴小华)

(六) 安顺市镇宁田脚脚、贞丰小河口汉代遗址

田脚脚遗址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良田乡顶坛村坝包组,小地名田脚脚,距镇宁县良田乡政府驻地约10公里,处于北盘江的西岸,属于北盘江一、二级台地;小河口遗址位于贞丰县者相镇下毛坪村董菁村民组,小地名小河口,距者相镇政府驻地约8公里,距董菁村民组约1公里,处北盘江的东岸,与田脚脚遗址隔江相望,属于北盘江一、二级台地。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5年对其进行发掘,其中田脚脚遗址发掘面积2200余平方米,小河口遗址发掘800余平方米,两遗址发掘总面积共计3000余平方米。

这次发掘出东汉时期的房址4座、柱洞1000余个、灰坑近100个、窑址1座、灶20余个;遗物主要有陶、石、铜、铁器和钱币等,其中陶器有罐、碗、网坠、弹丸和一枚陶印章等,石器有锛和斧,铜器有箭镞、弩机、泡钉、器盖、铜镜等,铁器有箭镞、刀、钉等,钱币主要有五铢以及宋至清代钱币。总的看来,本发掘出土的器物中,兵器出土的数量相对较多。

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清理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居址,这类资料之前在贵州境内发掘的较少,同时也是北盘江流域的首次大面积揭露,对贵州夜郎文化的探讨与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张合荣)

七. 湖 南 省

(一) 洪江市高庙遗址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镇(原黔阳县县城)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一贝丘遗址。按遗址现存地貌和地表高程,可将其分为二区,北区为遗址顶部,其南缘以一条东西向的乡间小路(坎)为界与南区相连。南区较北区低约1.5米,实为现今沅水北岸顶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2004年先后二次对其进行了主动发掘,共揭露面积530平方米。

2005年3-9月,在怀化市铜湾水电站的基建工程中,再一次对高庙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实际揭露面积

1142.5平方米,主要发掘区域位于南区北缘和北区中部,为了了解遗址布局的整体情况,另在北区北部做了探掘。

通过大面积发掘,获知遗址顶部主要为史前居民的住宅和茆地之所在,地层堆积厚度在1~1.5米,有3~10个文化层。其周围则为斜坡,是贝丘堆积的主要场所,堆积厚度3.5~7米,最长达27个堆积层。遗址的主体堆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保存甚好。它分为二部分,且各部分均包含了若干个地层,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现暂称其上部地层堆积为“高庙上层文化遗存”,年代范围约为距今6300~5300年;下部地层堆积则已正式命名为“高庙文化”,年代范围约为距今7800~6800年。

此次高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获得以下重大发现和突破:

1. 揭示了一处高庙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场所。该大型祭祀场所分布在遗址北区顶部的第8层面上,并延伸至北区南缘,面积达700多平方米,据祭祀坑布局的情况,估算其整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

整个祭祀遗迹由三部分组成:

A. 司仪(主祭)场所。其正面由4个主柱洞组成两两对称(中间二柱间距略宽,达2米),略呈八字状的“双阙”式建筑。柱洞均近方形,边长为0.85~1、深1.1米。东、西两侧分别有1和2个直径约80厘米的柱洞以立侧柱。主柱洞中部正前方1.2米处为一牲祭坑,坑内出上有经火烧过的牛、羊、鹿、龟和鱼等动物骨骼和大量螺壳。主祭场所面朝正南方的沅水。

B. 祭祀坑。已发现39个(其中之一为人祭坑),均位于司仪场所的南方,排列有一定的规律。祭祀坑大都为圆角方形、长方形或圆形,直径或长、宽约1、深0.8~1.2米,坑壁近直。坑内堆积状况基本一致,即上部均用较纯净的浅黄土夯筑,下部堆放的螺壳多经火烧,且大都另夹有一层火烧骨渣。

C. 与祭祀场所相系的附属建筑——议事或休息的房子及其附设的窖穴。房子位于司仪场所西侧,面积约40平方米,门朝东,为两室一厨的结构。窖穴分别位于厨房门外左(东)侧以及祭祀场所(西侧)右前方,内贮大量(或满坑)淡水螺。

该祭祀场所各遗迹中出土物的特征大致相近,其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

高庙文化晚期的规模如此之大的祭祀场所,其附设的司仪、牲祭、人祭、窖藏与议事会客场所俱全,这在我国南方同时期遗址中是极为罕见的。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居民宗教礼仪的真实状况,同时也表明其在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

2. 发现了距今约7800年的饰凤鸟、兽面和八角星象图案的陶器。在此次出土的“高庙文化”遗存的部分陶器上,发现有比前二次发掘所见更为丰富的以凤鸟、獠牙兽和太阳纹、八角星纹为题材的图像,这些图像均用简单的戳印篦点连缀而成,且其中的部分图像被涂上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这些图像中的獠牙兽长有双羽,凤鸟载着太阳或八角星象,它们显系超自然的物像。参照该遗址中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属于祭器的性质,它们在高庙文化的鼎盛期(大体在距今7400~7100年)最为发达,且其构图和制作技术皆显得相当娴熟。可喜的是,此次在该遗址的南区(第22~27层)发现了年代比之更早的高庙文化早期遗存,出土陶器上的凤鸟多为刻划的并列鸟头,兽面则为兽头的正面图像,八角星象则悬在天空,它们的构图和制作技术都非常简单原始,其所处年代据此期遗存中陶器的基本特点,可初步判

断为约距今7800年。这些祭器出于年代如此古老的时期,为追溯我国史前宗教艺术的起源翻开了新的篇章。

3. 出土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白陶是中国史前制陶工艺中的杰出代表。过去在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陕西汉中盆地的龙岗寺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史前遗址中都出土过白陶,但年代大都在距今6000年上下。洞庭湖区所出白陶的年代较各地要早,1990年在岳阳坟山堡遗址第3B层出土的白陶残片,其年代上限可能已接近距今7700年。此次在高庙文化最早一期遗存中(出于遗址南区第24层)新发现了精美的白陶罐片,其所处年代估计不晚于距今7800年。白陶在整个高庙文化中较之于年代与之相当的洞庭湖区皂市下层文化要更为发达,现在看来,高庙文化所处的沅水中上游地区很可能是我国白陶的最初发源地。

4. 揭示了高庙上层遗存中的部落首领夫妻并穴墓等一大批重要遗迹。这次在遗址中部除发现上文所述高庙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场所及其附属设施外,还在遗址中部偏北部位发现高庙文化时期和高庙上层遗存的房址20余座,均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木构地面建筑,面积在18~40余平方米,二或三开间结构,门道多朝南。发现属上层遗存的墓葬30余座。出土的墓葬分二类:一类为瓮棺葬,死者多为儿童,保存在瓮内的人骨皆作屈肢状。另一类为土坑竖穴墓,头多朝东,依其葬式又可分为仰身直肢与侧身屈肢二种:前者的年代相对较晚,骨架皆已朽蚀,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后者的年代相对较早,大都保存有人骨架,没有或甚少随葬品。在这些墓葬中,有二个重要的墓例:

其一为由M26、M27构成的一组并穴墓,两墓均开口于北区T0909第5层下,人骨皆朽,头均朝东。其中M26位于南侧,在死者胸部出透明白玉璜2件、玉块1件,在其腰下近裆部位放有象牙(长)牙1件;M27位于北侧,在死者胸部偏南侧出土玉钺和石削形斧各一件。从两墓所出随葬品的类别和二者墓穴所处的位置关系,可判断M26为女性, M27为男性。而从其随葬品的质地和品位知其在该墓地中处于显赫的地位,推测他们应是当时(高庙上层遗存)某一代部落首领的夫妻并穴合葬墓。

另一墓例为M65,开口于北区T1107第6层下,处于上层遗存中较早的阶段,墓穴近方形,坑内有人骨架4具,均为屈肢。其中北侧2具头朝东,为壮年夫妇,最北侧的男性呈微侧身,右腿搭于其妻之股上,身高约1.8米,女性为仰身屈肢,身高在1.7米以上。南侧的2具则头朝西,骨骼均不如居于北侧者粗壮高大,部分骨骼有位移的迹象。此墓无任何随葬品,且死者4人系同穴合葬,推测其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情形。

5. 发现了为建立本区域史前文化谱系的关键性材料。在前二次发掘的基础上,此次发掘找到了二批关键性的材料:其一是发现了高庙文化的早期遗存,进而揭示了该文化始初阶段的情况。并从其主要生产工具的特征(原料多

来自附近河床,采用锤击法单面打击方式,以大型砍斫器和各种打击石片为主要器类)了解到该文化继承了本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溇水文化类群”遗存的技术传统,故对其文化的渊源关系已经明晰。其二是出土了高庙上层遗存中最晚的一批墓葬。其随葬器物的主要组合为黑陶簋、曲腹杯和壶形罐等,已明显属于大溪文化遗存,这样就可将其与1984年在此区域发掘的怀化高坎垅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涵接起来。那么,再将高庙遗址大部分遗存与年代介于二者之间的辰溪县松溪口上层,以及晚于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的龙山时代诸遗存进行排列,本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及其相应的年代序列就基本清楚了。

此外,高庙遗址大部分地层中均出土了堆积如山的淡水螺、贝壳和鹿、猪、麂、牛、熊、象、獐(下层)以及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骼数十种,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当时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和来源,是以渔猎与采集为主的攫取式经济方式。其中的部分猪牙床经鉴定已属被驯养的家猪,表明当地在距今将近8000年的时期已出现了动物的驯养业。

该遗址考古发掘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贺刚)

(二)岳阳市宋——明清时代古墓

2005年12月,湖南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江县文物管理所联合考古队,在平江县伍市工业园建设工程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了一批宋—明清时代的古墓葬,并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宋代墓葬六座,明清时期墓四座,其中二座宋墓出土器物较为丰富。

M3和M4为长方形双室券拱砖室墓,正南北向,墓室南北长2.82、东西宽2.52米,分东(M4)、西(M3)室,从出土器物来分析,东室应为男主人墓,西室应为女主人墓,两室共用一道封门和隔墙,隔墙厚26厘米。隔墙上有2个壁龛过洞,贯穿两室,因此两室应是同时修筑而成。另外,壁砖和券拱砖均采用石灰浆和黄泥砌缝,墓室内发现残留的木炭渣,应是用于防潮。南、北室在结构、形制上都基本一致,由封门墙、墓室、铺底砖、壁龛等几部分组成,应为典型的夫妻合葬墓。此墓砌墓砖均采用素面青砖,规格 $26\times13\times6$ 厘米。在西墓室封门外还发现了一块规格为 $36\times36\times4$ 厘米的正方形几何纹踏脚砖。

M7为长方形券拱砖室墓,正南北向,墓室南北长3.72、东西宽1.52米,两侧壁砖从下至上平铺顺砌至90厘米高时开始起券,起券处开始平铺横砌,券顶由于年代久远,已损毁,墓底无铺底砖,打开封门墙有一长方形青石板,棺木已腐朽无存,但发现有锈蚀的铁钉,其结构和长、宽不详,墓后壁有一头龛,宽28、高24、深14厘米,顶为叠涩顶,下沿距墓室底60厘米,龛内无出土器物。此墓砌墓砖均采用素面青砖,规格 $28\times14\times4$ 厘米。

两室规格不大,但出土器物比较丰富,有金器、银器、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共计出土器物32件,其中M7出土陶、瓷、铜、铁器达26件之多,保存都较完整,为岳

阳地区近年来考古发掘所少见。M3和M4共出土器物8件。M3出土有铜镜1面、金栉背1件、金饰片1件、金耳环1件、银簪1件、银发饰1件、铁剪刀1件,M4出土塔砚1件。M7出土器物26件,部分瓷器来自不同县。包括耀州窑印花瓷碗1件、龙泉釉瓷碗1件、长沙窑小碟1件、影青高足杯2件、陶盂2件、陶罐1件、影青瓷盏2件、鹿角窑陶执壶1件、陶执壶1件、钵形器1件、陶魂坛1件等,此外还有铜器和铁器,器形不辨。

从M3、M4和M7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来分析,年代应该为宋代,从出土的大量精美银器和瓷器来分析,墓主人应为一般的下级官员或庶人中的富豪。M7墓葬规格不大,却齐聚了耀州窑、龙泉窑、长沙窑、鹿角窑的瓷器,反映了当时整个洞庭湖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墓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黄军认 符昶 廖阳)

(三)株洲市唐代纪年墓

2005年6~7月,湖南株洲市文物管理处会同攸县文管所,配合攸县工业园基本建设,在县城关镇乌坳尹家组套鸡坡发掘了三座唐代砖室墓和五座明清时期土坑墓。

本次发掘面积近300平方米。共出土文物41件,其中唐墓出土17件。三座唐墓随葬青瓷器为黄釉或青绿釉四系盘口壶各1件,青黄釉杯2件;陶器有青黄釉硬陶杯2件;铁器有剪刀1件,刀2件,锥1件;铜钱7枚。五座明清时期土坑墓中出土青花瓷碗23件,碟1件。

三座唐代砖室墓均为券顶带甬道,狭长型。券顶大部分均早年被毁,但墓室及甬道较完整,墓室四壁及墓底均用精致的花纹砖铺砌,墓墙为错缝平砌,墓底均“人”字形平铺三层。墓室内早年均有不同程度扰乱,随葬品位置较零乱。

M2为本次发掘规模最大的墓葬,出土随葬品12件。其中铁剪刀保存较好,并有一定的弹性;铜钱7枚,其中一枚五铢钱为宽廓方穿孔,应为隋五铢,品相较好,余6枚残缺难辨;四系盘口壶青绿釉施至上腹部,釉面小开片、制作精美。

M3规模略小于M2,仅出土2件青黄釉硬陶杯,杯敞口,直腹,饼形圈足。墙体中有“元和元年”纪年砖。“元和”为唐宪宗年号。

五座明清时期竖穴土坑墓,方向均为东南向。棺木腐烂,骨架完整,出土的青花瓷碗部分完整,瓷质粗糙,图案为单一的花草纹,部分瓷碗锥刺有墓主的名字。唯一的一件青花瓷碟少部残缺,但瓷质精致,釉面光洁,图案精美。

套鸡坡唐墓虽然遭到一定程度的扰乱,但从发掘的情况来看,三座墓葬的方向基本一致,形制无明显区别,墓砖形制及花纹一致,所出土的青瓷器、陶杯与瓷杯形制无明显区别。因此,它们的时代应为同一时期,即唐代后期。

这批唐代墓葬的出土对研究地方历史,尤其对南方唐代墓葬的断代具有较重要的价值。(黄杨秋)

八. 湖北省

(一) 郧西黄龙洞考古发掘再次出土人化石和文化遗物

2004年6~8月,湖北郧西黄龙洞考古发掘中出土3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1~12月,在同一地点(YHNI区)后续发掘中,又出土2枚人类牙齿化石,新发现20多件石制品,还有骨制品和大量动物化石。

新发现的2枚人类牙齿化石,一枚为左上颌第三臼齿(左M3),另一枚为左上颌外侧门齿(左I2)。2枚牙齿化石保存完整,石化程度与同层其他动物化石一致。臼齿磨损较轻,门齿磨损较重,2枚牙齿化石分属于2个个体。左上颌第三臼齿比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略显退化,形态特征属于晚期智人。上门齿测量尺寸在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之间(偏向于晚期智人),具有典型的铲形结构。

发现的20多件石制品,是前期发掘中所没有出现的。石制品主要为使用器具类,包括石锤、手镐、尖刃器、砍砸器、刮削器、使用石片等。原料有碧玉岩、石英岩、流纹岩、燧石、砂岩等。器形有大有小。石器加工一般比较细致,刃形比较规整。加工方式以向背面单向加工为主,也有用硬锤复向加工的。石器修理疤痕多在二层以上。骨制品也主要为使用性器物,均用硬锤打制而成,器形较大,刃形比较规则,包括尖刃类和宽刃类二种。

和人类牙齿化石同层出土的其他动物化石种类较多,经初步鉴定,计有安氏猕猴、螃蟹、印度假吸血蝠、普氏蹄蝠、马铁菊头蝠、变异仓鼠、绒鼠、鼯鼠、岩松鼠、刺猬、豪猪、竹鼠、最后鬃狗、豺、狼、猪獾、果子狸、大熊猫、洞熊、黑熊、华南虎、野猫、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基氏贝尔格犀、华南巨犀、野猪、林麝、赤鹿、獐、水鹿、梅花鹿、青羊、羚羊、苏门羚等等,数量逾600余件。动物群的基本特征,表现出我国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特点。发掘中进行了较细致的筛选,发现了许多小动物种类。其中有些小型动物化石种类,可能是在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首次发现。印度假吸血蝠可能是我国古文化遗址中首见的,该动物只生存于阔叶林带的洞穴里。普氏蹄蝠是生活于南方宽大、多层、有地下河道的洞穴翼手目。新认识的某些动物化石种类,为研究黄龙洞遗址的原始环境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增添了人们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新认识。

发掘中没有发现石器制作过程中的备料、废弃物或碎屑片等。并且人类化石、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均集中地分布于洞穴深处(距洞口约140米)。而在宽大的洞口附近,则没有发现古人类活动遗迹。黄龙洞洞口朝向东北,宽大的洞口附近在冬季时,洞内外的温度相近。洞外冬季结冰,洞口内也结冰。只有在集中分布化石和文化遗物的洞深处(YHNI区),冬季时较温暖(一般为18.3左右),与洞口附近气温差别很大,因此,集中发现化石和文化遗物的

YHNI区,可能是当时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中心区域。综合考虑古人类活动中心区域所在位置、遗址文化遗物组成特征,以及洞口朝向、洞穴形态、洞口附近冬季气候特点等,黄龙洞古人类遗址可能是古人类在此地活动的一个季节性遗址。

黄龙洞遗址出土5枚人类牙齿化石,牙齿化石特征与中国现代人关系比较紧密,属晚期智人。从人类化石石化程度、伴生动物群特征、出土地层结构、洞穴相对高度等迹象综合观察,黄龙洞古人类遗址应属于晚更新世。铀系法测年校正结果为距今94000年。目前可以认为,黄龙洞古人类遗址是中国和东亚最早的晚期智人遗址。(武仙竹)

(二) 巴东县红庙岭遗址第五次发掘

巴东红庙岭遗址是位于长江巫峡和西陵峡之间的香溪宽谷之中的一处古代遗址,自1998年至2004年以来,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建设做好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已先后组织四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一万平方米,出土了一批自大溪文化以来的文化遗存,为研究三峡地区古代历史发展,提供了一批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

2005年4月~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红庙岭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在海拔高程144米的台地上和水位暂时退至138米后的遗址北部,新发现31座土坑竖穴墓,编号为M109至M139,多属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这批墓葬,先后其随葬10把青铜剑,除3把为楚式剑外,余7把皆式“巴式剑”。更重要的是,在除锈的过程中,还发现其中一把青铜剑上有巴人的符号,即与以往发现的两件巴式矛一样,以巴掌纹为主体纹饰。

第五次发掘的这批考古资料,为研究古代巴人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林邦存)

(三) 大冶市李德贵明代冶炼遗址

李德贵冶炼遗址位于大冶市陈贵镇陈贵村李德贵自然村的化炉山。发掘点位于化炉山西南的边缘地带,其相对位置为东北200米为李德贵湾,南200米为大(冶)-金(牛)公路。化炉山为一座孤立的圆形小山岗,海拔高度41.34米。

2005年5月下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配合(征)一长(岭)输油管道工程建设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揭露出冶炼炉二十二个,获取了大量的考古资料。

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可分六层,地层的主体堆积物多为废弃的炼渣、报废的炉缸壁以及少量的冶炼原材料铁矿石、木炭沫等。出土遗物极少,多为明代的青花瓷碗残片、陶罐等。炼炉的型制结构大多相同,仅大小有别。绝大部分保存比较完整,少数破坏较甚,型制不清。整个炉子呈长方形,作业面比较平整。炉体结构由炉缸、金门口及鼓风口等

三部分组成。炉缸平面呈马蹄形或称“D”形,口沿微敞,斜直壁,圜底,缸壁较粗糙,厚约2~3厘米,缸壁外围有一圈红烧土。炉缸口径一般长约40~60厘米、深50厘米。金门口位于炉缸的前端,正视呈扁圆形,底略低于炉缸,并与炉缸相通,底面多有一层炼渣。宽约64、高约30厘米。鼓风口位于炉缸后端,其上部有一椭圆形浅坑,坑底向下有一小斜孔与炉缸后壁相通。

这次在李德贵遗址揭露出一批冶铁炉群,炉体小,结构简单,分布非常密集,炉子与炉子的叠压打破关系也非常多,有的炉子曾进行个多次改筑,这些现象说明炼炉的使用时间很短,为研究我国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和冶金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韩楚文)

(四)丹江口市北泰山庙-王家垭墓地

北泰山庙墓群位于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村六组,丹江口水库南岸,是鄂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东周至汉代大型墓地之一,若干年来曾经进行过多次发掘,已清理各时期墓葬近百座。王家垭墓地为北泰山庙墓群的一部分,这次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发掘是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具体实施项目,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清理墓葬三十三座。除一座为明清时期的砖室墓外,其余三十二座均为东周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其中较大的有七座(六座带墓道),二十六座为小型墓葬。

三十三座墓出土的文物可分为铜器、陶器、玉器、铅器、料器等;数量达400余件,其中铜器近100件,陶器300多件;从器类上看有兵器的剑、矛、戈、戟、箭镞;车马器的车軑、马镳、马衔、盖弓帽、青铜伞饰件等;杂器有青铜勺、铜削刀等;陶器有鼎、簋、敦、壶、豆、盘、匜、缶、甗、孟、鬲、罐、壶、甗、小口鼎等。

湖北是楚文化的中心区域,通过数十年的工作,湖北境内的许多地方都有楚文化遗存的发现。但鄂西北的汉江沿岸这一区域楚文化遗存的发现相对比较少,人们对这一地区的认识有限,所以对这一地区的楚文化考古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大型楚文化遗存的发掘对学术研究会有更高的价值。(康豫虎)

(五)丹江口市牛场墓群

牛场墓群位于丹江口市均县镇(原肖川镇)土桥管理区齐家垭子村(现合并为罗汉沟村)。2005年4月~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丹江口市博物馆联合对该墓群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341平方米,发现墓葬五十一座,清理四十八座。其中王莽至东汉时期砖室墓四座,东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四十四座。

汉代砖室墓均为东西向,带长方形墓道,朝东。分布在外边沟梁脊上。随葬品有陶仓、灶、井、釜、锅、瓮、钵等,还有铜钱、铜盆等。

四十四座东周墓葬均为土坑墓。方向有南北和东西向,其中山岗北端的都为东西向。葬具均已腐烂,仅有棺痕,可分辨出有一棺一槨和单棺,其中有十一座带有壁龛,

所有壁龛均位于人骨左侧。人骨保存极差,能看出的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仅有一件铜匕首和料珠。陶器组合有鬲孟罐、鼎、盖豆、三足缶、豆、鼎、敦、壶、豆、盘、匜、鼎、敦、壶等。鬲孟罐居多。(周国平)

(六)麻城市吊尖遗址

吊尖遗址位于湖北省麻城市南湖办事处凡固垸村一组,遗址为一个独立的椭圆形台地,台地高出周围地面5米,东西长80米,南北宽55米左右,总面积4500平方米。

2005年11月-2006年元月,为配合武(汉)合(肥)高速铁路的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

发掘表明该遗址有新石器时代和西周两个时期的地层堆积。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以墓葬为主,另有少量灰坑、红烧土遗迹。墓葬包括4座长方形土坑墓,10座瓮棺,土坑墓为近南北向,随葬器物多为黑陶,器形有鼎、簋、豆、罐、杯等,瓮棺葬形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葬具比较简单,除W8外,多数仅有一罐,有的罐打破后分两半对扣放置,W8为一鼎带盖。从器形和器物组合看,墓葬中的双腹盆形鼎、浅盘豆、深腹簋、曲腹杯具有明显的屈家岭文化早期的特征,部分瓮棺葬具显示出大汶口文化的因素。

西周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比较丰富,主要遗迹有房基、居住面、灰坑、灰沟、黄土堆积等,其中发现一段由纯净黄土和细碎的红烧土颗粒砌筑的墙体比较重要,从出土器物看,主要陶器有鬲、豆、罐、碗等,另外,还发现铜箭镞、石斧、石刀、石范、玉环、玉璧等遗物,其中一件石范一面有一个箭镞的凹印,应为制作铜箭镞无疑。从鬲和豆的特征看,可能为西周中晚期遗物。(刘辉)

(七)恩施市须须沟遗址

恩施须须沟遗址隶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沙地乡柳池村邓家村纺织组,位于清江北岸,南为恩施市新塘镇,东南为恩施市红土乡,东为建始县境。清江从遗址西南经南部向东流去,遗址东部有清江的支流须须沟。遗址现为台地,呈西高东低状,起伏不平,部分为水田,部分为旱地。

2005年9-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的面积为1000平方米,地层堆积较简单,为东周时期文化堆积。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从陶系看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从器类看以圜底器居多,少见三足器,不见平底器。可辨器形有釜、罐、豆、钵、碗、鼎、器盖等,另外还出土有陶网坠和铁矛。纹饰多为绳纹,另有少量的弦纹。这些说明了其文化的单纯性。这为我们研究清江流域古代文化的族属、文化特征、文化的缘起及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宋有志)

(八)谷城县水星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位于谷城县西约11公里的石花镇水星台村一组

的彭家堰,原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台地。因农田改造,将台

地改造成稻田,现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为配合武(汉)安(康)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谷城县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此次发掘时间为2005年6~8月,发掘面积798平方米。清理灰坑28个,灰沟4条,房址3座,墓葬2座及瓮棺1座。

遗址堆积可分3层:第1层为耕土层,第2、3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文化层距地表一般深0.65~0.90米。文化层内主要包含物有石器和陶器。石器均为磨制,且制作精致,有锛、凿、斧等。陶器均为轮制,有鼎、缸、盆、罐、碗、钵、镂孔豆、盘、壶形器、杯、鬲、盂、刻槽器、器盖、纺轮等。陶质主要有夹砂和泥质两种。以夹砂陶居多。陶色主要以灰、红陶为主,黑灰陶和磨光陶次之。纹饰以素面为主,也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和附加堆纹等。陶器中最常见最有特色的器物是上宽下窄、扁平形足、扁窄尖锥足和刻槽扁形足的盆形鼎、罐形鼎、厚胎喇叭形刻槽器、高领留肩圆底罐、厚胎直腹平底缸、敞口斜壁红陶杯和镂孔豆等表现浓厚的石家河文化特征。

通过对该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仅为研究石家河文化在鄂西北地区的地域特点、分布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对研究汉水流域与江汉平原原始文化的交流、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付守平)

(九)汉川市晒网台遗址

为配合杭(州)兰(州)高速公路武汉-荆门段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5年10月~2006年1月对汉川市晒网台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汉川市垌家镇兴隆村七组,高家四屋湾西北约400米的刘家岭上,古称“晒网台”,故名。遗址中部稍高,周围略低;西南地势略高,东北方向低洼,目前仍有一大水塘。遗址分布范围与岭地大致重合,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椭圆形,遗址周围有壕沟包围,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30米,面积约25000平方米。

在遗址南部解剖的壕沟的沟壁斜直,沟底的北部略缓、南部较深,沟的开口宽7.35米,最深约2.25米。沟口的北侧(内侧)较直,呈“一”字形,南侧(外侧)向北有一凸出部,呈“几”字形,据此判断此处为南部出口,其宽约3.6米,此处沟的开口宽约3.3米,深约1.6米。

此次发掘共发现环壕1条,房址2座,窑址1座,墓葬5座。出土陶器约20余件,器型主要有鼎、簋、罐、豆、盘、盆、缸等。石器40余件,有石斧、石凿、石铲等。遗址年代为油子岭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通过本次发掘,基本了解了本遗址的面貌,确定它为一处至晚为屈家岭早期的小型环壕聚落,且发现了它的南部出口(类似“城门”的作用),对研究汉水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特征及其源流提供了新的资料。(张成明)

(十)安陆市余家岗遗址

余家岗遗址位于安陆市洑水镇洑水港村余家岗湾,北距316国道约150米,东北约100米为洑水港。洑水港由东

北向西流入洑水,遗址位于洑水与洑水港两河交汇的二级台地上,台地呈长方形,高出四周农田3~4米。总面积约3.9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3米,海拔40~42米。

2005年3月~5月,为配合武(汉)安(康)铁路复线工程建设,由湖北省考古研究所领队,孝感市博物馆、安陆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2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座、墓葬14座,灰坑1个,出土较完整的陶器、石器30余件。该遗址文化堆积厚2.8~3米,可分为8个地层。遗址的第3至第5层属石家河文化时期,发现房屋建筑1处、柱洞4个、瓮棺葬3座,出土陶器以夹砂黑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纹饰以素面为主,少量篮纹和附加堆纹。可辨器形有盆、夹砂粗鼎足、纺轮、豆柄等。遗址的第6至第8层属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墓葬11座、灰坑1个,均为土坑竖穴墓,M1、M2仅随葬一残陶环,M3出土有陶器盖、釜、鼎、钵,其余8座无随葬品。H1内包含物较多,大部分已残,有壶形器、陶鼎、罐等,大部为黑陶,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多为薄胎,造型规整,轻巧美观,陶器以泥质黑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纹饰多素面,少量篮纹和附加堆纹,还发现一块白色镂孔陶片。可辨器形有鼎、豆、盆、黑陶球等。

本次发掘遗迹遗物十分丰富,建筑、墓葬分布密集,出土遗物包括生产工具(石斧、陶球、纺轮)和生活用品(鼎、镂孔豆、盆、杯、瓮、壶形器)等较数量多。第7层出土的壶形器与京山屈家岭、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壶形器一致,曲腹杯、镂孔豆与武昌放鹰台的杯和豆相似。H1出土的曲腹杯、双弧腹器是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第3层出土的鼎足与随州西花园、武昌放鹰台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高柄杯与西花园出土的高柄杯一致。表明余家岗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遗存。(蒋俊春)

(十一)随州市黄土岗遗址新石器时代环境

黄土岗遗址位于随州市均川镇贺氏祠村和胡家台村,为配合随(州)岳(阳)高速公路中段的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5年2月~4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初步确定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环境聚落,壕沟形状近似椭圆形,南北长约316米,东西宽约235米,整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包含壕沟)大约有74260平方米,壕沟内面积大约57120平方米。除了西南角壕沟的深度与宽度均不明朗外,其余部分可以看作一个近似封闭的结构,从钻探的情况看,壕沟平均宽度15~20米左右,平均深度为2.5~3米,最深处超过3.8米。从壕沟各段保存情况来看,东段壕沟保存较好,边界清楚,走向明显,但埋藏较深,晚期地层堆积特别厚,文化内涵也最为丰富,壕沟内的文化层堆积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北段壕沟地表现仍保留迹象,这里残留的近东西向的堰塘可能就是壕沟的一部分,钻探也证实了北段壕沟的存在;西段壕沟走向基本清楚,但壕沟外边界不明显,宽度较大,且壕沟内文化层堆积不如东段丰富,壕沟外部边缘被汉代及以后各时期人类活动破坏,但仍然保留有西南至东北走向

的低洼地,壕沟的底部仍然有较厚的向沟内中心倾斜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堆积;南段壕沟除西南角不明显,可能留有土埂,其余走向清楚,宽度明显,中间局部被现代沟渠破坏,沟内最底层堆积地层与淤泥中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

同时,通过对遗址周边地区的调查,发现7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该地曾经存在一个以黄土岗遗址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聚落群,黄土岗遗址具有区域性中心聚落的性质,这对于了解史前人类及以后各个时期聚落结构及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辉)

(十二)麻城市女王城遗址

女王城遗址位于湖北省麻城市西南25公里的宋埠镇红梅山村,198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

从实测资料看,女王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300、东西宽1100米,面积1430000平方米。北宽南窄,西北-东南向,方向北偏西16度。

女王城破坏比较严重,特别是东西城墙基本全毁,北部城墙、西城墙北段、东南城墙、东城墙北段保存较好,保存最高处为西南角,现存高度为1.5~6.5米,墙基底宽约10~20米,城墙宽度不一,北城墙宽约10米,东、西城墙宽约14米,南城墙宽20米。

2005年11月~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麻城市博物馆在西南角城墙进行解剖,全面了解了城墙的建造方法和夯土内遗物,进一步确定城墙的建筑、使用年代为六朝时期。西南城墙的最底部用卵石奠基,然后是分层夯筑掺杂有砂石的沙土。整个城墙的建筑风格一致,时代应该相近。

第④层在东部发掘了12个探方,堆积情况是:第一层耕土第二层明清堆积第三层六朝堆积第四层东周堆积层,其下就是黄色生土。发现的遗迹有灰坑、房基、瓮棺。六朝堆积中多见筒瓦、板瓦,也很少器物片,可辨器形有盆、甑等。也有极少青瓷片。东周文化层遗物极少,在H1中出土大量陶片,器形有豆、盆、鬲、甗、罐等,应为楚文化系统,时代可到春秋。中部系马岗南端地层堆积为:表土,明清,六朝,六朝堆积,下面为生土。此处发现2座窑和一个灰坑。窑的年代为东汉和六朝,灰坑为六朝,不见东周堆积。

(周国平)

(十三)麻城市桃园岗遗址

遗址位于麻城市中馆驿镇喻家岗村一组西约200米的一处南北向的岗地上,呈不规则长条状。遗址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为配合湖北大别山电厂进厂铁路的建设,2005年4~5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冈市博物馆、麻城市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由于受工程征地所限,此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325平方米,清理西周时期灰坑5个,灰沟3条,房址1处。

从发掘的情况看,遗址堆积可分为6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近现代堆积层。第三~五层为出土日常生活

陶器残片,较多的器底、口沿、器足、豆柄等。陶质主要有夹砂和泥质两种。陶色以红陶居多,灰陶次之,灰白陶较少,可辨别器形主要有鼎、鬲、甗、罐、钵、瓮、盆、豆、方形盆、陶饼等。器表一般都饰有纹饰,主要有绳纹、网纹、方格纹、弦纹和附加纹等,也有少量素面。这些器形及纹饰都是典型鄂东西周时期遗物的风格。同层伴出的还有磨制石斧、石镑及陶纺轮等器物。

第三层仅分布于遗址的东部,文化层较薄,出土的陶片以夹砂陶和黑衣陶并重,可辨别器形有鼎、刻槽盆、三足钵、筒形杯等,鼎足为侧装三角形宽扁凿足、鸭嘴形足等,器表多为素面,有少量绳纹、篮纹、方格纹和弦纹等。这批陶器在麻城栗山岗、罗山庙山岗、黄梅陆墩等遗址中常见,应属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系统。

该遗址的发掘不仅为研究石家河文化在鄂东地区的地域特征、分布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对研究长江中、下游原始文化的交流、传播与融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付守平)

(十四)应城市神子台新石器时代至东周遗址

遗址位于湖北省应城市城南九公里处的黄滩镇桂桥村小学旧址,为一面积约7000平方米、高出地面2米左右的台地。2005年7月~8月,孝感市博物馆、应城市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面积16平方米。遗址堆积较厚,一般在1.9米左右,所获遗物可分三期:第一期遗存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少量黑陶和褐陶。陶器有鼎、瓮、钵、豆、盆、钵、罐、红陶杯等,与石家河文化较接近。第二期遗存以夹砂灰陶为主次为夹砂红陶、少量泥质灰陶。陶器有鬲、罐、盆、钵、瓮等,系西周时期。第三期遗存的陶器有鬲、罐等,系东周时期。因上世纪90年代农田改造破坏,只有东周时期的陶器标本而无地层堆积。神子台遗址位于临江东周遗址群的北部边缘地带,临江东周遗址群的许多遗址上层有东周时期文化层堆积,神子台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临江东周遗址群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汪艳明)

(十五)麻城市梅家墩遗址

麻城梅家墩遗址隶属湖北省麻城市中馆驿镇熊寨村一组。位于一近圆形台地上,高出四周地面1~2米,三面环水。直径110米。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

2005年9月~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大广高速公路工程,为全面了解梅家墩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当年10月~12月对梅家墩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450平方米。

本次发掘共清理房址1座,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42个,其中5个为周代,37个为新石器时代。清理残墓葬3座,仅存底部,时代为屈家岭文化晚期,随葬器物有陶鼎、簋、豆、高柄杯、小杯、器盖等。

梅家墩遗址出土遗物较多,但较零碎。出土遗物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二、三、四层为商周时期,以陶鼎、鬲、罐、

瓮、豆、缸为主。第五、六、七、八、九层为屈家岭文化晚期。有陶鼎、罐、鬲、簋、豆、甗、擂钵、杯、器盖、纺轮、环等。

此次发掘基本弄清了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与周边同时期的遗址有着一定的共性,为研究这一区域的遗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胡文春)

(十六) 天门市龙嘴遗址

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吴刘村三组与张巷村,地处低山区向平原过度的丘陵地带。

该遗址于1983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7年荆州博物馆在此进行过小面积发掘,清理出8座墓葬,出土一批具有油子岭文化特征的陶器。遗址周围5公里范围内分布新石器时代遗址4处。著名的石家河古城就在龙嘴遗址西北7.2公里处。2005年2月~9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

龙嘴遗址主要分布在岗地南部,文化层堆积厚度一般在0.5~2米左右。、层为近现代扰层,、、、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地层堆积中包含物丰富,夹有较多的红烧土块和草木灰,遗物主要有红、灰陶片(一层以下多为红陶,层含少量灰陶),陶器器形主要有鼎、罐、碗、盘、豆、器盖等,陶器特点鲜明,如镂孔圈足盘,圈足钵形豆、烟斗型扳等,属油子岭文化,另外还出土磨制石器、纺轮等生产工具。

此次发掘共揭露新石器时代的房址7座,灰坑52个,灰沟11条,墓葬16座(含晚期墓葬4座),瓮棺葬5座,灶2座。另勘探发现遗址周围有土筑的城垣和城壕。我们在遗址东南部利用自然断面布探沟TG3解剖了城垣的东墙南端,堆积情况清楚,在遗址北部布探沟两条,成功的解剖了内外城壕。

通过此次发掘,我们发现了1座相当于大溪中晚期属油子岭文化范畴的城址,揭露了包括房址墓葬在内的一些重要遗迹,出土了石器、陶器数百件以及数件玉器。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了解早期城址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张成明)

(十七) 天门市笑城遗址

笑城遗址隶属天门市皂市镇笑城村二、四组2005年7月~9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湖北武汉至荆门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天门市笑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该遗址于1983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往西25公里有著名的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城址;往西南22公里有天门龙嘴新石器时代城址;往东22公里有应城门板湾新石器时代城址。

笑城遗址分布在岗地的南部,城内文化层厚度一般在1.1米左右,城墙堆积厚度在1.1~3米。从TG1(东城墙)的地层堆积情况看,笑城城墙大致可分为两期,第一期城墙为新石器晚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底宽约23米,残高0.60~1.6米。出土遗物较多,以泥质灰陶为主,磨光黑陶次之,还有少量的彩陶,器形有罐、

缸、碗等残片。第二期城墙为周代,城墙修筑在第一期城墙之上,底宽约14.5米,残高0.20~1.6米。包含物较丰富,出土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有鼎、鬲、罐、豆等。

天门笑城城址座北朝南。城址平面呈“”宽曲尺形,东西长250~360米,南北宽156~305米,城址面积约9.8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6.3万平方米。经勘探得知,笑城城址除城北有壕外,其余三面均为湖泊沉积的黑色淤泥,这充分证明笑城城址当时三面环湖,一面为壕。

此次发掘共揭露新石器、周、汉及六朝等时期遗迹16个。其中城垣1座,房址1座,灶2个,灰坑6个,灰沟1条,墓葬5座。

通过本次发掘,确定了笑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及其年代,笑城遗址年代的确定,为研究长江流域与汉水流域城址的起源、分布规律及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研究早期城址布局与环境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黄文新)

(十八) 襄阳市陈坡东周至汉代遗址

陈坡遗址位于襄樊市襄阳区之东约8公里,隶属东津陈坡村第1、2、3组所辖。该遗址于198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面积较大,保存面积约50万平方米,保存情况较好。1998年襄樊市考古队为配合变电站工程,曾在该遗址的东南部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这次为配合崔家营航电枢纽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勘探、发掘,勘探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

从这次发掘情况来看,遗址文化堆积简单: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汉代文化层。文化层厚约10~80厘米不等。多为块状分布,但各类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出土遗物极为丰富。这次揭露出东周灰坑12个、汉代灰坑1个;东周窑址1座、汉代窑址2座、唐宋窑址1座;东周灰沟2条;汉墓3座、唐墓1座、宋墓2座、明清墓葬10座。在遗址的西北部勘探出东周时期的大、中型墓葬3座,车马坑1座,是这次勘探的重大发现。最大的坑口残长约33米,宽30米,中型墓口长约20米,宽18米。均带有墓道,方向朝东。清理东周灰坑12个,出土遗物丰富,是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出土陶器有鬲、甗、折肩盆、竹节柄豆等器物口沿残片看,初步认识其文化内涵可早到两周时期,为研究早期楚文化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韩楚文)

(十九) 枣阳市段家湾遗址和栗树湾墓地

段家湾遗址和栗树湾墓地均隶属枣阳市兴隆镇亢老湾村一组,位于兴隆镇的东南约2.5公里处。这里属随-枣走廊的平原地带,建设中的武安铁路复线将从它们的南部穿过。为配合这一工程建设,2005年6月~8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两处遗存进行了发掘。

段家湾遗址(代号2005HZD)位于亢老湾村一组西侧,南北长约400,东西宽约200米。本次发掘区定在遗址的北部,面积35×35米,中心点位于北纬32°02'39.3",东经112°55'00.8"。发掘总面积200平方米。发掘表明,

该遗址为东周两汉时期的遗址,其地层可分为6层,第3、4层为东汉、第5、6层为东周至西汉;遗迹有灰坑5个、灰沟1条、水井1眼。灰沟口压在4层下,东西长 $9\times 2.5\sim 0.7$ 米,两端未到头。出土遗物以两汉时期的陶板瓦、筒瓦为主,另有少量的东周两汉时期的残陶鬲、豆、罐、甑、盆、瓮以及铜、石器等。从段家湾遗址的地层堆积及遗迹、遗物来分析,它是一处汉代建筑遗址的局部。遗址各地层都出土不少“圆陶饼”,这种情况与云梦楚王城遗址的相同,说明二者的关联较密切。而铁钺石铤的发现,亦属较罕见。

栗树湾墓地(代号2005HZL)位于亢老湾村一组东侧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岗地上,南北长约300,东西宽约100米,墓地中心点位于北纬 $32^{\circ}02'31.6''$,东经 $112^{\circ}55'06.6''$ 。发掘总面积为52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4座,均为小型残砖室墓(这主要是由于当地村民在此平整土地、挖沟种桃树所致),墓室的平面有长方形、刀形和凸字形三种,残墓口最小 2.7×0.9 ,最大 7.2×3.2 米,残深 $0.43\sim 0.9$ 米。随葬品很少,其中东汉的陶罐、瓮、灶残片等装了11袋,另有铜五铢钱、货泉及唐“开元通宝”等,据此,这4座墓的时代初定为东汉~唐。(梁柱)

(二十)鄂州市东吴古墓

2005年,在湖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湖北鄂州市博物馆对鄂城区新庙镇大鹰山村一座大型砖室墓进行发掘与清理,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

该墓为双层券顶多室墓,规模较大,砌筑牢固,布局设计合理,结构复杂。整个墓葬自东往西由封门、甬道、横前堂、过道、棺室及耳室等部分组成,墓室东西长9.8、南北宽4.08、高2.8米。墓壁为双层,砌法采用在四平一竖及五平一竖上加平砖逐步起券,券顶用斧形砖、条形砖整砌相间砌筑,中间夹少量半砖。墓室内全部用几何钱纹砖砌造,装饰非常美观。棺室位珩墓室西部,平面呈长方形,内空长3.9、宽2.02、高2.3米。棺室铺地砖用2层人字纹错缝平

砌,结构严谨,高出过道地面5厘米,便于排水之用。其内又在西南两侧设有西耳室和南耳室,西耳室与后壁相连,长0.72、宽0.56、券顶内空高0.7米;南耳室与南壁相连,长1.3、宽0.7、券顶内空高0.76米,过道位于棺室与横前堂之前,保存较完整,长1.28、宽0.98、残高1.2米。横前堂西接过道,东与甬道相通,形制为长方形,南北长3.36、东西宽2.04米。甬道位于横前堂正东处,与棺室、横前堂在同一中轴线上,部分结构被破坏,宽0.6米。甬道的北侧设有一北耳室,长0.9、宽0.6、券顶内空高0.78米。封门在墓室的最前部,从残存结构看它与挡土墙构为一体,残高0.44米,呈“人”字形斜砌。

这次发掘出土文物种类较齐全,有完整的随葬品组合,计有青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漆木器等50余件。按用途和类别大致可分成6组:第1组为瓷质日用器皿,包括双耳罐、带盖四系罐、瓷盏等,这些瓷器火候较高,胎质坚硬,釉色青绿,具有玻璃光泽,大多为浙江越窑产品;第2组为陶制仓厨明器、畜圈模型,均为硬陶,保存完好;第3组为实用兵器和铜质生活用品,包括弩机、龙首铜熊斗、龙首铜灯等。其中龙首铜熊斗,造型生动,完整无损,底部仍保留着烟炱;第4组为铁质日用品,包括铁刀、铁镜等;第5组为精细的金银饰品,包括金珠、金手镯、金指环、金钗、银钗、银耳挖。其中银耳挖表面饰一龙首纹,上端为龙首衔一小杓,制作精致,既作装饰,又可实用,为鄂州地区首次出土;第6组为漆木器皿,出土时大多已腐,能辨认的器形有盘、奁等。

此墓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等分析,判定墓主人身份较高,虽然古墓在早期被盗过,但仍出土数量之多,保存之好,工艺之精,外观之美的文物,为鄂州地区近年来考古发掘同时墓葬所少见。这些文物为研究三国时期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何建萍 谢世海 余夏红)

九. 江西省

(一)南昌市青岚村邓家山西周遗址

为配合南昌市西外环高速公路(乐化——生米)的基本建设,2005年4月至5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南昌市博物馆对南昌市效邓家山西周遗址和清代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475平方米。揭露出遗迹有西周时期灰坑一个,清代墓葬5座,获得一批重要的石器与陶瓷标本。

遗址的文化遗存比较单一,表土层下即为西周时期文化堆积。清理出遗迹仅灰坑一个,坑口呈不规则形,斜壁,圈底,口大底小。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可辨器型有尊、罐、圈足器、豆柄、鼎足、陶饼、折肩器、凹底器等,以尊和罐为主。多为轮制。石器有斧、锛、刀、镞、矛、凿、钺、戈、砺石等,磨制精细光滑,钻孔技术规范。从出土器物器形特征看,邓家山遗址时代属西周早期。邓家山西周文化遗存

为赣中地区商周文化遗存的研究和南方地区印纹硬陶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年代标尺。

邓家山其山腰以上自明清以来成为邓家祖坟之地。清代墓葬均为砖室单人墓,无铺地砖,墓向一致,分布均匀,少随葬品。这是族内集族而葬,地位平等的反映。这也是我国“血缘为重”古老葬俗的反映。在墓室头部置放瓷盘,作枕头起固定头部作用。墓砖采用沟槽榫卯结构,使墓室更具密封性。邓家山清代墓葬的葬俗与吉水、吉安等地明清墓葬用瓦片来枕头,墓内置放子孙罐,用石灰密封墓室有显著区别。清代墓葬的发掘为我们研究赣中地区的葬制与葬俗增添了新的珍贵资料。(李育远、王上海)

(二)泰和县碧溪木梓山古墓群

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泰和县博物馆为配合井冈山铁路的修建,对位于泰和

县西部碧溪镇曲尺村委老居村西南的木梓山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2000 平方米。共计清理古墓 18 座,均为砖室墓,其中除 1 座汉墓外,其余均属清代。墓葬的出土遗物不甚丰富,除汉墓出土少量精致的绿釉瓷外,清代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只在填土中偶尔发现一些陶瓷残片。

汉墓的年代应在东汉晚期。东汉的花纹砖墓在江西地区发现较多,砖上的花纹多为简单的车马纹、半同心圆纹、对角几何纹、钱纹、箭镞纹等。以人物活动为题材的画像砖墓很少发现,见诸报道的仅在赣州发现一例,在泰和县境内,乃至吉安地区都是首次。根据《续汉书·舆服志》:“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竿戟为前列”,表明墓主人生前是享受食禄千石以下的一个封建地主官吏,参考墓葬的规模,最有可能是东汉晚期食禄三百石的县官。

该墓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泰和县以及江西地区的汉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民风葬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清理的清代墓葬计有 17 座。全部采用青灰色砖砌筑,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其建造方法为先选好位置,平整土地,用砖漫地,然后起墙,最后封顶。墓葬结构的合葬、单葬之不同。所有墓葬的棺木、尸骨均易腐蚀无存。从墓葬形制、墓砖规格及建筑特征看,与近年我们在吉安地区清理的清代墓葬相同;墓后壁带小壁龛的墓在赣粤高速公路吉安市曲瀨段发掘清理的清代墓葬中较为常见。这批墓葬的发掘,为该地区清代葬俗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张文江)

(三) 吉安县城厚镇招仙观遗址

为配合井冈山铁路的工程建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在吉安县城厚镇的大力协助下,对位于吉安县城厚镇的招仙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时间为 2005 年 8~10 月,揭露面积 3000 平方米,清理墓葬十一座,出土一批陶瓷标本。

本次发掘的十一座墓葬绝大部分早年被破坏,墓顶不存,只有梯形土坑竖穴墓保存较好。依据墓葬的平面形制及砌筑方法,分为 3 型。A 型,梯形砖室墓。B 型,梯形土坑竖穴墓。C 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出土遗物不多,除棺钉外,每墓多以 1 至 2 件为主。有的更不见遗物的存在。出土遗物有陶执壶、陶罐、酱釉罐、陶墓碑、石墓碑、铜烟斗及铁棺钉。从墓葬形制、建造方式及出土遗物综合分析,A、C 型墓葬大致为明代晚期,B 型墓葬时代为清代。

地层堆积简单,扰乱严重,但出土遗物丰富,包括自唐至清不同时期的各类器物,有釉陶器和瓷器,以瓷器为大宗,有青黄釉、青釉、乳白釉、黑釉、绿釉、青白釉、白地黑彩瓷、卵白釉、龙泉青瓷、青花瓷等不同釉色不同时期的器物。考古发掘虽受发掘区域的限制没有清理建筑遗迹,但出土遗物表明该遗址早在唐代已有先民居住,历经宋、元、明、清,延续一千多年,其间或有兴废、间断。清乾隆《吉安

府志》卷五十九《庐陵寺观·招仙观》有记载:“招仙观,属永福十八都,宋绍定间洞真观道士郭心逸建,元大德间道士朱无暇葺,明洪武十二年,道士李西庚重修”,这从考古发掘中也得到证实。(张文江)

(四) 湖口县周玺清代墓葬群发掘

周玺清代墓葬群位于湖口县东北部流泗镇屈垅村委周玺村南的一处山坡地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5 年 8 月~9 月对该墓群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4000 平方米,共清理墓葬十七座。

周玺清代墓葬群墓葬形制大部分为土坑单室墓,但是在葬俗上却可分为有石灰槨和无石灰槨两类,并且有石灰槨墓基本有骨骸,无石灰槨墓则无骨骸。有骨骸的墓葬是祖先灵魂(魂与魄)的有力凭依者,反映了土著化的汉人“灵骨一致”的观念,成为世系继嗣的强有力的具象代表物。无骨骸的墓葬则是神祖墓,同样是祖先与子孙保持联系的重要中介,对于子孙的祭祀活动乃至家族的血缘认同都有着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可以被典型地视为祠堂的延续和补充,是各房派的宗亲灵魂(祖祠)共居的一个场所,是家族结成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象征载体。

通过发掘,周玺清代墓葬群中的神祖墓两座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位于墓地中上部;一座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位于墓地中下部。在神祖墓北面以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墓葬居多;南面以咸丰年间墓葬居多。说明周玺村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发展非常迅速,人丁兴旺,名人辈出,同治以后则走向没落,归于平庸。该情况与《周氏族谱》所载事实相一致。

周玺清代墓葬群的墓碑上有“奉政大夫”、“诰封宜人”、“太学生”等官衔或称谓,对研究清代职官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杨军)

(五) 抚州市南城县碑山遗址

碑山遗址位于南城县西北岳口乡大徐村西南,遗址现存总面积约 1000 平方米。

为配合廖房水利枢纽工程,2005 年 11 月~2006 年 1 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375 平方米。

遗迹有灰坑 3 个,按形状可分为圆形和不规则形两种。地面建筑的大型放行房基 3 座,房基建在生土面上,由垫土(第 9~10 层)和柱洞构成,柱洞打破生土和垫土,门道朝东南。墓葬 2 座,均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位于房基附近,未见葬具和人骨,墓坑窄小,壁、底偏黑,似经火烤,无随葬品,墓主应为婴孩或异常死亡者。

遗物有石器和陶器,完整和可修复原器物达 60 多件。石器有镞、镖、球等武器;有段和无段镞,半月形和马鞍形穿孔石刀、砺石等工具;穿孔的石佩饰;石钺等礼器;均磨制。并有制造石器的石料和半成品,有的能相互拼合。陶器有鼎、钵、豆、簋、甗、盂、釜型罐、圆腹罐、壶、尊、甗形器、器盖、器座和纺轮、陶拍等。总体上看,器型以圆凹底三足器、

圈足器为主,平底器较少,器壁凹凸不平。

碑山遗址主要文化堆积均为商周时期。从已揭露的探方情况看,可将该遗址划分为二期。第一期,以房基F1~F3、墓葬M1、M2和第5~10层为代表,属万年类型文化(肖家山、斋山-角山遗存)晚期阶段,时代约为商末周初;第二期,以灰坑H1~H3和第2~4层为代表,时代约为西周早期。其中第4层为较纯净的红褐色淤泥层,可能与自然灾害有关。

碑山商末周初遗存的发现,为研究江西商代万年类型文化,特别是为其晚期阶段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新的资料。西周早期遗存的发现,使人们更容易窥视到赣江、鄱阳湖流域商周文化逐渐溶入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遗址所包含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中有很多因素于武夷山光泽地区、闽江流域的黄土仑遗址等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存在广泛联系,为探讨赣江、鄱阳湖流域文明起源和历史进程,特别是江西与华南沿海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杨军)

(六)新建县王古山春秋遗址与宋元墓葬

遗址位于新建县望城镇青西村委燕窝村的王古山之,山岗台地上,为配合南昌市西外环高速公路建设,2005年4月~5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建县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清理遗迹主要为灰坑、灰沟,出土遗物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镞;陶器有罐、豆、杯、器把、纺轮等,从出土标本分析,属典型“越式”文化遗物,时代当为春秋时期,对研究春秋时期新建地区乃至赣江——鄱阳湖流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另在该遗址上清理宋元墓葬各一座。宋墓出土陶质堆塑瓶一对、青白釉碗3件、铜镜一面、铁剪一把、铜钱两枚。元墓出土有黑釉盏1件、青白釉芒口饼足碗2件、铜钱37枚。根据两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的类型学排比及共存的“元丰通宝”、“至元通宝”综合分析,其时代分别为北宋晚期和元代中期。宋墓和元墓出土瓷器涉及江西吉州窑和景德镇湖田窑产品,宋墓和元墓分别出土的“元丰通宝”、“至元通宝”为研究上述两窑的分期、断代、编年提供了确切的年代座标。宋墓出土的堆塑瓶肩部贴塑12个动物头部造型,对应部位环刻正月十二月文字一周,为研究北宋晚期江西丧葬文化、生肖文化及月令观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弥足珍贵。

(余江安)

(七)大余县池西竺山民居遗址

遗址位于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委弓里村小组之西竺山,2005年12月~2006年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清代民居两处。编号为F1、F2。

F1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残长5.3、宽4.1米。由于被F2打破,结构不详。墙体用半块青砖斜砌或单块鹅卵石平砌,宽40厘米,局部残高5~15厘米;局部墙体采用碎瓦片叠砌。墙体采用黄泥勾缝。从出土的青花瓷器分析,F1为清代中期建筑。

F2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是一组前后两进面阔三间的六开间建筑。面向西南。长19.3、宽13.1米,总面积250平方米。第一进由中间大殿,两侧厢房组成,厢房前各有一长方形天井。第二进结构与第一进相同。在前后两进间另有一处天井。此天井应具有采光和散水功能。整座建筑建于裸露的山石之上,墙基经初步平整而成;不平处使用砖石垫平。墙体宽40厘米,使用整砖平铺砌成,中间垫以瓦块及鹅卵石,采用黄泥勾缝。从出土的青花瓷器分析,F2为清代中期建筑。

两座建筑外尚有用卵石、卵石及少量碎砖构成的围墙。面积约1000平方米。墙底宽约1米,顶宽约30~40厘米。曲折蜿蜒,在南端有一处出入豁口。

依据房屋结构及民间传说分析,此处建筑可能为民居建筑,或寺院建筑,其毁于上世纪的60年代。(徐长青)

(八)大余县狮形山汉墓

发掘单位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时间为2005年12~2006年1月,发掘地点为大余县池江镇长江村委杨口村狮形山。共清理汉代墓葬两座。编号为M1、M2。

M1为土坑竖穴墓葬。墓长4.06米,残宽2.7米,墓口距地表10厘米,墓深4.16米。墓内填土分为七层。墓底有木炭、朱砂、红色漆皮等。墓内出土器物41件,有铜器、铁器、原始瓷器和硬陶器等。铜器有盆、釜、双系罐、盃等,铁器有三角架、刀、矛、带钩等,原始瓷器有器盖、罐、盘口壶等。

M2亦为土坑竖穴墓葬。墓长3.4米,残宽2.6米,墓口距地表40厘米,墓深3.4米。墓内填土分两层,上层为灰黄色土,下层为黄褐色泛白的细膩黄土,墓底见木炭灰、漆皮和朱砂等。墓内出土文物21件。计有铜器、铁器、原始瓷器、釉陶器和硬陶器、玉器等。铜器有五铢钱,铁器有釜、带钩等,陶瓷器有罐和盘口壶等,玉器有玛瑙串珠。

狮形山汉墓位于大余盆地的边沿山麓之上,相对外围农田高度约30米,开山为藏,土坑深埋,坑壁加工十分规整,长方形拐角近乎直角。这种墓葬制度在江西以往发现的汉代墓葬中较为少见。其时代应为东汉早期。(徐长青)

(九)景德镇市丽阳乡元、明瓷窑址

景德镇丽阳乡元、明瓷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西南21公里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于2005年7~11月对景德镇市丽阳乡元、明瓷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分三个区,面积823平方米,发现元、明时期窑炉各一座,出土了同时期的重要瓷器标本一批。

1. 元代窑址区(C区)

位于丽阳乡丽阳村碓臼山的南坡,发掘面积189平方米。发掘区主要是窑炉所在地,甚少涉及窑业堆积。地层共分四层,其中第层为明代以后的堆积,第层为窑址废弃后堆积,第层为宋元时期文化层。

遗迹有龙窑一座(Y2)。位于C区的T1和T2,开口于

层下,打破第一层直至山体岩石。该窑斜长24.2米,坡度150°,方向146°。窑门宽0.8米。火膛进深1米,高1米,宽3.5米。窑室外弧,最宽处位于窑床中部,宽约4米,近火膛处微内收,宽约3.4米。窑尾圆收,没有龙窑常见的排烟孔设施。

该窑保存较好,尤其是处于初烧状态下、匣钵擦叠成柱状排列的遗迹现象实属罕见。通过对窑炉遗迹、原状匣钵柱的排列方式以及装烧细节的考证,可成为我们研究和复原元代晚期窑炉的形制、每窑的装烧量、窑内匣钵平面排列和空间组合等瓷业生产的原始根据;同时,我们还观察到该窑炉形制比较特殊,长度较短,火膛较深、大,窑炉左右两壁外弧、炉壁近火膛处微内缩,尾部砌成圆弧形且没有龙窑常见的排烟孔等设施,这几点都是明代典型葫芦形窑的主要特征,加之和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炉遗迹同见于一个窑场,这对揭示南方景德镇地区龙窑向葫芦形窑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陶瓷窑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遗物主要有Y2废弃堆积中未烧熟的成型青釉瓷坯胎和稍早地层出土青白、卵白釉、龙泉釉、黑釉、青釉瓷等,器类以碗、盘、杯、瓶等为主。

元代晚期的青釉瓷基本为碗类,品种单一,胎质疏松,釉色稳定性差,而且仅用细砂垫烧,装烧工艺简单,这种求量不求质的烧瓷方式和当时动乱的社会背景有着极大的关联,也为我们探索各地出土的同时期同类瓷器的产地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线索。

2. 城墙解剖区(B区)

位于丽阳乡彭家村瓷器山的北侧,发掘面积24平方米。

城墙共分八层,分别由细腻的黄色或褐色土和瓦砾、碎砖的混杂土交错堆砌而成的,不见夯筑迹象。各层遗物基本一致,主要为宋元时期的青白、黑釉、青釉瓷。值得注意的是在包含物中时代最晚的为元代晚期的青釉瓷,亦有未烧熟的青釉瓷坯胎。

经查,文献中有元末明初于光(朱元璋的大将)在此地筑城的记载,从发掘出土的遗物我们也可以得出该城修建的年代应该在元末明初之间,相关遗迹的调查也证实元代窑址所在的碓臼山位于这座城堡之内。因此,该城为元末义军修筑的军事城堡当属无疑,同时元代晚期未开启的

窑炉非自然停烧,也成了反映和研究该地区元朝末年历史事件的重要材料。

3. 明代窑址区(A区)

位于丽阳乡彭家村瓷器山的西坡,发掘面积610平方米。地层共分五层,第一层为废弃后堆积,第二、三层为窑业堆积,第四层为宋元时期文化层。

遗迹有葫芦形窑一座(Y1)。位于A区的T4和T7,开口第一层下,打破第二层直至生土。窑斜长11米(其中窑床斜长9.6米)。平均坡度为90°(后室前部坡度较陡,为130°)。方向258°。窑门宽0.62米。火膛进深0.69米,高0.57米,宽3.6米。窑室分前后两室,前室最宽处约3.6米,后室最宽处约3.4米,两室束腰处宽1.98米。窑尾圆收。

葫芦形窑炉是明代景德镇地区流行的瓷器窑炉,其图像既见于《天工开物》,在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和湖田明代窑址也发现有实例,但是这些窑炉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关于其烟囱的形制历来也存在争议。该窑炉的发现不仅可以填补景德镇御窑遗址发现的明初(洪武、永乐时期)葫芦形窑和湖田窑遗址发现的明代中期(弘治时期)葫芦形窑之间的空白,完善葫芦形窑炉的演变序列,也可以印证《天工开物》对葫芦形窑窑炉形制的记载。

遗物主要有明初窑业堆积和窑炉废弃堆积中的青花、仿龙泉釉、仿哥釉、紫金釉、白釉瓷器和稍早地层出土的宋元青白、黑釉、卵白釉瓷等。出土的明代瓷器,虽然釉色品种较多,但器类以碗、盘、靶杯等日常生活用瓷为主,青花纹样以云气兰草、缠枝宝相、月梅为主,吉祥款识“福”“寿”有行、楷之分,多书写器物内底,“梵”字纹样多为写意,一般环饰器物口沿处。仿龙泉和仿哥釉瓷器从胎釉效果观察,显为工匠刻意为之,质量效果俱佳。器物均采用单件匣钵仰烧工艺,圈足较大的器底采用垫砂,圈足较小的器物采用垫饼垫烧。

明代早期民窑场仿哥窑和仿龙泉釉瓷器是以往不为人所知的,这次发现丰富了学界对明代早期景德镇地区瓷器釉色品种的认识,而青花、白釉、仿哥釉、仿龙泉釉瓷器器类与造型的统一,又说明在同一座窑场内器物的形制并不因釉色品种的不同而有差异,这对陶瓷考古进行类型学研究尤其具有提示作用;同时上述器物的出土,对研究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同时期青瓷、青花、仿龙泉釉和仿哥釉瓷器的产地均具有标尺意义。(王光尧 王上海 江建新)

十. 江苏省

(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南朝画像砖墓

2005年9月,江宁区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公安部门和建设单位的协调配合下,对南京南郊江宁开发区山水华门工地内一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这座古墓位于将军山(观音山)东麓的一个小山坡上,墓葬东向,平面为长“凸”字形,全长10米,由封门墙、

排水沟、甬道、石门、墓室等部分构成。甬道长方形,长4.3、宽1.4、残高0.6米,墓壁用三顺一丁组砖砌成。甬道中部有一道石门,石门由门额、门柱、门扇、门槛等组成,墓室长方形,券顶,长5.7、宽3、残高2米,两侧壁略外弧,后壁向外弧突。墓室两侧壁、后壁砌法与甬道相同,均用三顺一丁组砖砌建。北侧壁中部在距棺床84厘米高处设一个直棂假

窗,窗上有一火焰形灯龕。后壁中部相同高度亦有一个直棂假窗,窗上亦见火焰形灯龕。墓室中部有砖砌棺床,棺床距后壁尚有一段距离。棺床二层砖砌,上层前后各以一排砖竖向平铺锁口,其余则为斜“人”字形平铺,下层砖侧立砌。墓室及甬道铺地砖2层,错缝平铺。在墓室后部距后壁0.7米处有一边长为7厘米的方形排水沟阴井口。墓内积水可以从阴井口穿过墓室、甬道及封门墙底部泄向墓外。

墓砖均为青灰砖,有长方形、楔形和特型砖。长方形砖大部分模印有花纹,纹样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在砖的端面饰二朵四出莲花,一种是在砖的侧面饰四出莲花及斜网格组合纹,有的莲花纹旁还模印有一个楷书的“郑”字,主要用于砌筑墓壁;还有一种是在砖的正面饰有二朵大莲花,仅发现于少数墓底铺地砖。楔形砖主要用于砌筑墓顶,模印的花纹与长方形砖基本相同。特型砖用于砌筑直棂假窗上面的火焰形灯龕,每个灯龕由上下相对特型砖拼砌而成,砖面边缘饰忍冬纹,中央则模印有侍女图样。侍女面左,双环髻,身长婀娜,着长裙及地,长袖飘逸,左手执一带刺杆状物,顶端两侧各饰一棵柳树,柳条下垂。这些花纹、画像砖有图纹的一面皆朝向墓内,使得整个墓室显得华丽壮观,气势非凡。

此墓尽管早年被盗扰,清理前又遭施工严重破坏,墓内除几块青瓷残片外别无他物,但其规模大,形制结构有着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其砖室全长达20米,与已经发掘的多座梁代宗室王侯墓葬规模相当,属于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可以推定墓主是当时高等级贵族。(许长生)

(二) 淮安市六朝家族墓

2005年3月,淮安市博物馆对淮安市市中心的财富广场工地六朝家族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十四座,出土各类文物20多件。

十四座墓呈雁阵式排列,墓向在 $160^{\circ}\sim 180^{\circ}$ 之间,墓与墓之间相距50~80厘米,由东向西依次排开,墓葬均为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由短斜坡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建筑设计合理,布局规范对称,墓道长200~300、墓室长280~340、宽140~240、高120~160、墓顶距地表700厘米左右,墓壁均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二或三组后以三层平砖及楔形砖上砌起券。墓门构筑同样采用双砖“三顺一丁”或“二顺一丁”2~3组叠砌,丁砖采用楔形砖宽窄结合竖砌而成,其上平砖顺砌至顶,顶上再铺楔形砖压券。墓葬一般都有1~3个近方形壁龛,位于墓室左右后壁丁砖上,左右壁龛对称,后壁壁龛位于正中。墓室底部铺斜“人”字形地砖。

M1为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墓,位于墓群最东面,墓室四壁均采用双砖叠砌而成,墓室长340、宽240、高160厘米,墓壁四组三顺一丁后起券,丁砖两头均模印有圆形莲花纹饰,墓室左右两壁砌置有四个对称的壁龛,后壁中部砌有一个壁龛,墓底铺斜“人”字形地砖。

M4M5、M6M7为二对夫妻合葬墓,四座墓葬两两连为一体,墓壁之间有小型券顶甬道相通,在甬道中部有木质痕迹,可能为一扇小门。在M6底部清理出一段腐朽木头,应为棺具。墓葬砌法和其他墓葬无异,只是墓室内的砖为灰黑色,可能是墓室经过烟熏处理过。

此次发掘共出土青瓷器20多件,器形有四系盘口壶、四系罐、平底小碗以及灰陶四系罐。这些随葬品摆放比较有规律,一般是在墓室前面摆放一壶或一罐加一小碗,墓室后部紧贴墓壁放置一平底碗,一座墓基本出土3件器物,器物釉色较好,保存状况不错。出土几枚钱币,但锈蚀严重,目前无法辨认释读。

在六朝墓群东北50米处,还清理了一座西汉墓,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 95° ,长260、宽150、深230、墓底距地表800厘米,木质棺具已经炭化,根据痕迹判断棺具长240、宽120厘米,出土灰陶壶2件、灰陶立耳鼎3件、黑陶罐1件、灰陶盒1件、灰陶钁1件。

此次墓群的发现在淮安城区尚属首次,这为研究淮安地区六朝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胡兵 孙玉军 王剑 尹增淮)

(三) 邳州市梁王城遗址

梁王城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的北部,距市区37公里,隶属戴庄镇李圩村。遗址东南约1公里处为胜阳山和禹王山,西南约2公里处为望母山,东北处有运女河并流经遗址东面。遗址在李圩村的西边,京杭大运河(中运河)的东岸行洪道内。遗址上现保存有高出周围农田1~2米的城墙,平面近长方形。南、北城墙保存较好,西城墙的南部大多已在挖运河时被破坏,南城墙现残长900多、北城墙残长800多米,南北城墙相距约1100米,遗址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从断面观察文化层厚度达5米多。

2004年4月~2005年4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共同组成的梁王城考古队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首次主动科学发掘,发掘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收获。发掘结果表明,文化层堆积深厚(普遍在4米左右,最深处达5米),内涵丰富,地层堆积从早到晚依次为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周文化层、春秋战国文化层、北朝—隋文化层以及宋元文化层等。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房址6座、儿童陶棺葬6座,龙山文化时期的浅地穴房址1座、墓葬1座、周代墓葬14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1处、北朝—隋的大型石础建筑基址1处,发现各个时期的遗迹计灰坑122座、灰沟6条、井5口、道路3条等,出土陶器、瓷器、石器、青铜器、玉器、骨器及琉璃器、铁盔甲、兵器、铁工具农具等共1000多件。另外,通过对南城墙的解剖和东、西、北城墙的调查钻探确定了梁王城城址的始建年代为战国时期,梁王城是一处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的战国古城。

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如下:

史前时期:主要遗存包括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有房址、道路、灰坑、墓葬等。

在大汶口文化地层中共发现陶棺葬6座,分别编号为M2、M3、M4、M5、M6、M7。其中以M6和M7保存较好。M6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1、宽0.5、深0.35、距地表3.7米。埋葬一儿童,以陶鼎作为葬具。陶鼎系打成大块的陶片,在墓底以鼎口沿、腹片相叠并排铺垫一层,然后把儿童放置其上,再以打碎的陶片盖满全身。人骨侧身,头朝东,面向北,下肢稍弯曲,骨架保存较完好,经鉴定其年龄在5岁左右。随葬有一件小器盖。葬具经拼对、复原,为2件器物,一件为折沿敞口深腹扁圆形足鼎,另一件为折沿敞口球形腹扁圆形足鼎。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中还发现了5座房址,分别编号为F2、F3、F4、F8、F9、F10。以F8和F9保存较好,均为浅地穴房址。F9仅揭露房址的西南部分,F8清理得较为完整。F8,浅地穴房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红烧土倒塌堆积不仅覆盖地穴,还向外延伸。地穴东西长5.4、南北宽3.24、深约0.4米,面积达17.5平方米,正方向。房内发现中心柱洞1个、边柱7个。在房址的里面及北边各发现一件折沿垂腹扁圆形足陶鼎。房址之间有红烧土道路相连。

龙山文化时期的主要遗迹有墓葬和房址等。

M20,土坑竖穴墓,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墓口长1.7、宽0.2~0.3、深0.25、距地表3.3米。

F7为一座浅地穴房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4.55、南北宽2.6、深0.25、距地表3.3米,面积11.8平方米。门道朝南。共发现柱洞9个,由2个中心柱及7个边柱组成。房址的东南大部被G6所破坏。在房内发现了6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及1个头骨,且多有挣扎和叠压现象,多俯身。分别编号为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人骨。7具人骨经初步鉴定,1号、2号、5号人骨均为壮年女性,3号、4号人骨为青年女性,7号人骨为少年女性个体,6号人骨为少年个性,性别不明。除去性别不清的6号人骨外,房址内的死者均为女性和未成年人,推测很可能是部落间的冲突导致了这场灾难。出土陶器组合较完整,时代特征明显,为龙山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

为解开梁王城之谜,对残存地表的城墙进行了解剖。出土陶片单纯,时代特征明显,表明城墙的建筑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此外,在T7和T9的南部发现有东西长13米多、厚约0.7米的夯土台基,从层位关系及台基的包含物分析,该夯土台基属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北朝—隋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有一座大型石础建筑基址,编号为F5。

梁王城遗址史前时期堆积非常丰富,其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与其附近的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花厅遗址共同构成黄淮地区史前文化圈,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对研究史前聚落和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F7的房址内,发现了七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不似居室葬,也没有发现洪水、火灾或是房屋倒塌等现象,屋内生活用的陶器完整放置于门道旁,所有骨骼都作挣扎状,呈不规则的相互枕藉,多俯身,除一具性别不明外,几乎全部是妇女和未成年人,据此推测他们罹难于部落间的冲突,此类遗迹在龙山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资料。

梁王城遗址历史时期遗存也极其丰富,本次发掘确定梁王城为面积逾100万平方米,为战国时期苏北最大的城址,梁王城连同周围同时期的鹅鸭城遗址、九女墩墓地共同构成了黄淮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框架。

(林留根 周润垦 张浩林 原丰)

(四)句容、金坛周代土墩墓群

2005年4~9月,江苏省文物局组织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镇江市博物馆、常州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溧水、溧阳、句容和金坛文管会、博物馆等单位共80余名专业人员分别组成8支考古队同时对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的土墩墓进行规模空前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工作由南京博物院主持。

发掘从4月11日开始,9月中旬结束,先后调查发现土墩墓46座,其中被高速公路建设彻底破坏6座,实际发掘土墩墓40座。共清理墓葬233座、祭祀器物群(坑)229个、丧葬建筑14座,出土文物3800多件。这次土墩墓的发掘,不仅丰富了江南土墩墓的内涵,而且在土墩墓的形制结构、埋葬方式、祭祀习俗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1. 确认一墩一墓与一墩多墓并存。一墩一墓就是一座土墩仅埋葬一座墓葬,在其四周的堆积中放置祭祀器物群或祭祀器物坑。一墩多墓就是一座土墩除在中心埋葬一座相对最早的中心墓葬外,在其四周不同层位的堆积中还埋有更多墓葬。土墩墓自1974年第一次发掘以来,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着“一墩一墓”还是“一墩多墓”的争议。

在本次发掘的46座土墩中除被破坏而埋葬情况不详外,可确定的一墩一墓有3座,一墩多墓有28座。一墩一墓的土墩除中部的一座墓葬外,一般在其四周不同层面上放置数量不等的祭祀器物群(坑),如天王东边山D2、薛埠上水D2、薛埠磨盘林场D1等。一墩多墓的土墩除中部的一座墓葬外,一般在其四周不同层面上再埋有至少一座墓葬。而句容浮山果园D29,除中心墓葬外,在周边还先后埋有44座墓葬。这是目前发现的在一座土墩中埋葬墓葬最多的土墩。这次发掘充分说明,江南土墩墓不仅存在一墩一墓,而且存在一墩多墓,同时显示一墩多墓的现象明显较一墩一墓普遍。

2. 明晰堆土掩埋与竖穴土坑共存。本次发掘的40座土墩共清理墓葬233座,绝大多数均有墓坑,同时在很

多墓葬中还发现了人牙和人骨腐痕,这在中小土墩墓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不仅从另一个方面佐证这些竖穴土坑就是墓葬,而且为江南地区青铜时代土著居民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堆土掩埋现象仅属个别,如浮山果园 D29M41、许家沟 D2M4。浮山果园 D29M29、M42 和浮山果园 D27M2 则是带浅坑和小封土的墓葬,为土墩墓中另一新发现,它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带封土的墓葬,不仅丰富了土墩墓丧葬习俗的内涵,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墓葬封土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3. 首次发现一墩多墓的向心布局。这次土墩墓发掘表明,一墩多墓土墩墓葬布局方式多样,其中向心结构的布局方式较为特别,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墓地布局有着显著的差别,具有浓郁的江南土著特色,在土墩墓考古中也是首次发现。向心式布局即在土墩中心墓葬周围的不同层面安葬的多座墓葬头均朝向中心墓葬。在 40 座土墩中有 14 座明确存在这一布局方式,为深入研究青铜时代江南土墩墓的葬俗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考古学资料。东边山 D1 共清理墓葬 15 座,开口于 2、3 层面上的 14 座墓葬均朝向墩子中心的 M13,天王寨花头 D2 共清理墓葬 27 座,中心墓葬为 M22,开口于周围的不同层面上的 26 座墓葬均朝向中心墓葬。浮山果园 D29 共清理墓葬 45 座,开口于不同层位的 44 座墓葬均朝向中心的 M45,其中 2 层面上分布有墓葬 14 座,4 层面上分布有墓葬 17 座,5 层面上分布有 9 座墓葬。6b 层面上的墓葬共 5 座,每层所有墓葬都朝向土墩中心的主墓,每层墓葬与上层墓葬和同层墓葬都有较多的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

4. 发现形式多样的丧葬建筑遗存。这次发掘的 46 座土墩中有 9 座墩子发现了 14 座墓上或墓下丧葬建筑。

墓上建筑主要指在墩子中心墓葬上的建筑,由基槽、两面坡的棚子、石床等部分组成,有的还有通往墓葬的道路,在棚子上再堆土成丘。如浮山果园 D29M45 为墩子的中心墓葬,由墓门、基槽、柱子、石床及小路组成,墓葬总长 7.2 米,其中石床长 4.3、宽 2.1 米,路长 2.8、宽约 1 米。从发掘情况推断,M45 在墩子基础层面的中心部位挖弧壁、圆底基槽,在基槽内埋剖开的树木片,搭成人字形两面坡的棚子,在东端立柱留门,门两侧用石块垒砌;门外用黑土堆成通往棚内的斜坡道路;棚内垫 20 厘米厚的土,其上铺设石床。这类棚子建筑与浙江印山越王墓较为类似,这类建筑遗存实际上就是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坡榫室。而时代明显早于后者,级别低于后者,说明印山越王墓的丧葬建筑是有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背景的。

墓下建筑——墓地的标识。是建在中心墓葬的下一层、墩子基础层面上的建筑物,同样包括基槽和柱洞,有的仅有基槽,形式多样,有的全封闭,有的半封闭,有的在基槽内垫有石块。这类建筑一般位于墩子中心,建在中心墓葬的正下方的基础层面上,建筑内不见遗物,它与中心墓

葬不属同一层次,没有直接关系,但上下基本对应,在建造中心墓葬时已经撤除或毁坏,仅存基槽、柱洞等。如寨花头 D5F1、寨花头 D2M22F1、寨花头 D1G1 和 G2、上水 D3F1、上水 D4F1 等等。寨花头 D5F1 建在土墩中部的 6 层面上,由基槽和柱洞组成,基槽南、北、西面环绕形成长条状,东部缺口,基槽内密集分布柱洞 32 个,柱洞基本向内倾斜。基槽的东西中轴线上还有 4 个圆形柱洞,推测原为两面坡人字形建筑,中心墓葬的石床与基槽范围基本一致。这类建筑应属营造墓地时的标识性祭祀建筑。

5. 首次发现明确的墓地界域。本次发掘中有一座土墩有明显的界墙和护坡,一座土墩有土垄,这在土墩墓发掘中首次发现。句容东边山 D1,界墙平面近方形,建造于墓地营造于土墩的基础层面上,外侧有一周护坡,在西、南面有 2 个缺口,土墩的堆积基本在界墙范围内,仅最上一层堆积局部溢出墙外。金坛薛埠上水 D4 的土垄平面呈弧形,建造于生土面上,中部有一缺口,墩子的基础和各层堆积均在土垄范围内。从发掘情况看,界墙和土垄起到确定墓地四至的作用。在另二座土墩中发现护坡堆积,其功用可能与界墙、土垄相似。

没有明显界墙、土垄的土墩,其墓地的界域与墩子的基础范围大体一致,墩子堆积包括墓葬和祭祀器物群等活动基本在基础范围内,除最后覆土外,溢出现象未见。同时在墩子基础铺垫完后,墓地的范围也就确定了,尚未见改变墓地基础的现象。这些说明土墩作为墓地在建造之初就有了明确的规划。

6. 确认土墩墓存在着以瘞埋器物群为主要特征的祭祀习俗。以瘞埋器物群祭祀的土墩墓主要是一墩一墓或一墩几墓的土墩,一墩多墓的土墩鲜见或可见 1、2 组零星的祭祀器物群,大量祭祀器物群(坑)在茅山东侧土墩墓中较为常见。祭祀器物群(坑)放置于中心墓葬周围的封土层面上,有的将斜向层面进行平整,形成簸箕形小龛或浅坑。一个墩子里祭祀器物群(坑)的数量在 1~25 组,放置器物数量 1~24 件,器形包括罐、甬、坛、鼎、豆、碗、盅、盖等。如金坛薛埠茅东 D5 呈漫坡馒头状,平面大体呈圆形,南北约 33、东西约 35.5、高约 2.1 米,保存较好。堆积分 10 层,共发现墓葬 2 座,祭祀器物群 25 组。其中有 2 组器物群用小土包覆盖。金坛晒土场 D1 墓葬 3 座,发现起自于生土面上的平台,在四周发现 10 组器物群,其中部分器物群有簸箕形坑。

7. 科学发掘,还原土墩营造过程。此次土墩墓的发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发掘,因发掘对象的情况特殊,采用四分法和探方法相结合。采用四分法开方,即土墩留十字形交叉的 1 米宽隔梁。探方一般取正方向(磁针指向)。4 个探方分别以西南、西北、东北和东南角为探方的坐标基点。4 个探方要保持同样的进度,逐层下挖,切忌“切蛋糕式”的解剖,要求“剥洋葱”式逐层剥离

揭露封土。根据土质、土色和其他现象划分地层和遗迹单位,由晚及早,逐一揭露,注意其中器物群的层位。必须搞清楚墓葬的层位关系,确认墓口界限或确认有无墓坑,严格把握每一层每一堆土的平面范围、立体走向,和堆积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要求用逆向操作过程还原土墩的营造过程。

从发掘的情况看,土墩的营造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平整土地;再在其上铺垫1~3层土,形成土墩的基础,现有资料显示基础完成,也就确定了墩子的范围,即确定了墓地的范围;在基础的中心部位建造中心墓葬及相关建筑,封土形成最早的坟丘。也有在土墩中部生土面或基础面上建造祭祀性建筑,后在建筑基础上堆土再建造中心墓葬;以后不同的时期在坟丘上堆土埋墓,或进行祭祀活动;在一定时期后再进行一次封土,停止埋墓和祭祀活动,完成该土墩即墓地的营造过程。

本次发掘最主要的学术意义在于它廓清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土墩墓的模糊认识,同时也为土墩墓的源流、分期、分区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土墩墓向心结构的首次发现为深入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极其丰富且具有明确层位关系和打破关系的出土器物无疑将成为江南土墩墓的分期标尺。

此次发掘使江南土墩墓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以来,首次以其明确、翔实、可靠的田野考古学资料确立了土墩墓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中的地位,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江南土著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推动江南土墩墓的保护提供了最新的价值判断和学术支撑。

该考古发掘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林留根 王奇志 李虎仁 田名利 王书敏 杭涛)

(五) 无锡市丘承墩遗址良渚文化高台墓地的双祭台

丘承墩遗址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鸿山镇东北约1公里,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5年1~6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无锡市锡山区文管会继续对鸿山开发区内的丘承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15平方米。遗址主要为良渚、崧泽和马家浜的文化堆积,共清理了良渚文化高台墓地和并列的良渚文化祭台2座,墓葬10座,其中3座为随葬大量玉器的贵族墓;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房址6座,墓葬13座。良渚文化高台墓地双祭台的发现,是本次考古最重要的收获;而出土的新的玉器器形,为研究良渚文化玉器增添了新的内容。

丘承墩遗址的地层堆积共分为6层,第4层为良渚文化高台墓地的堆土,高台的边缘部分为斜坡状堆积;第5层为崧泽文化的地层堆积,第6层为马家浜文化的地层堆积,均发现有房基、墓葬等遗迹。

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位于整个遗址的中东部,东西长

45、南北宽25米。中心部分被战国墓(M1)打破。高台上共发现良渚时期墓葬10座,编号M2-M11,其中部分墓葬被M1打破。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墓向与高台基本一致,按等级高低由西向东排列,西部临近高台西缘的3座墓等级最高,出土玉器以琮、璧、钺为基本组合。东部的墓葬身份较低,基本不见玉器。

祭台堆积可分6层。最底层为祭台的垫高的基础;第5层为房基,房基坐北朝南,东西宽9.8、南北进深9米,有内外2圈基槽,内部并有柱洞,基槽内有用于奠基的陶器;第4层红烧土为祭台的外围;第2层的灰白土框围绕第3层黑灰土形成一东西长5.2、南北宽6.2米的方形台面;最上层是祭台的覆土,顶面中心部分是2件用特殊方法从腹部切割开的陶器,底部平置,口部倒置。陶器边缘经烧烤呈红褐色。第1~3层内出土有玉镯、玉珠、玉管、陶壶、杯、碗、罐等。

祭台位于高台墓地以西,独立于墓地又与墓地有重要的关系。祭祀方法比较特殊。底部的基槽应与祭祀建筑有一定关系。

二座祭台的时代为良渚文化晚期或晚期的偏早阶段。

遗址共出土陶器、玉器、石器 etc 遗物250余件(组)。

陶器100余件。器形有鼎、豆、壶、罐、贯耳壶、鬲把杯、碗、盘、杯等。

玉器共106件。有琮、璧、钺、瑗、冠状器、镯、锥形器、坠以及珠、管、扣饰等等。其中,玉锥形饰长9.9、径1.7厘米。器下部呈锥形,底端钝尖。上部首状,顶鼓,下凸。面饰4只大眼睛。从四面看都为人首形。束颈较长,满饰水波纹。顶端有一个深约2厘米的钻孔。器形前所未见。器表钙化严重。

丘承墩遗址是继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江阴高城墩等良渚文化墓地后,江苏省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遗址中,又一次发现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叠压关系,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中并列的双祭台,而人面纹坠形玉饰为新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器形。

无锡丘承墩遗址的发掘,无疑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原始宗教、研究良渚文化晚期向北的扩张和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张敏 李则斌 朱国平 田名利 邹忆军)

(六) 镇江市宗泽墓区发现宋代享堂遗迹

2005年,江苏镇江古城考古所为配合宗泽路拓宽工程,对宗泽墓区进行抢救性勘探试掘,考古取得重要收获,在墓区北侧发现宋代享堂建筑遗迹。

享堂遗迹(F1)为一建筑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位于墓地北区,被掩埋在地表下深约1米的南宋地层之中。在其建筑夯土外侧砌有台基砖墙残迹,在建

基面上还发现多处石柱础、土筑礅墩和连接礅墩的砖砌拦土墙等遗迹。从探沟内揭示的礅墩布局推知,该建筑面阔7间,通面阔约21.2米;进深3间,通进深约11.3米。其建筑规模较大,依其墓前位置,当是志载宋代宗泽墓道上的建享堂遗迹。

在宗堂遗迹东侧稍偏南处,还发现一建筑夯土台基(F2),并出有石柱础、礅墩、夯土墙、砖石水沟等建筑遗迹。F2的建筑规模略小,面向朝西。从其礅墩分布可推知,F2面阔3间,加副阶走廊,通面阔约13.6米;进深1间,加迎面廊间,通进深约7.9米。它应是从属于享堂的配殿遗迹。

墓区内,发现东西向石路(即“丹徒古道”)及南北向的砖石道路各一条,时代从宋代沿用至明清。

在享堂和配殿遗迹的地层中出土丰富的南宋遗物,器类包括建筑用瓦当、滴水、脊饰、砖雕、砖及生活陶瓷等。其中,瓦当有兽面纹和狮子纹2类。滴水数量较多,主要有水波纹、篦格纹、穗带纹和素面纹等。出有缠枝花纹及云纹砖雕以及屋顶脊饰的垂兽和蹲兽残件等。瓷器主要有青白釉银包口瓷盏、直腹刻花瓷炉,龙泉瓷莲瓣纹碗、斜腹炉,酱釉瓷剪纸梅纹茶盏,黑釉瓷画梅纹茶盏等。遗物标本中还有见有墨书碗底,在碗底外墨书“宗”及“云”等文字,表明祭祀者与墓主的密切关系。

宗泽墓前的享堂建筑,见载于镇江南宋志书《嘉定镇江宗》卷11:“观文殿学士谥忠简宗泽墓,在京岷山。显谥阁学士曾懋铭,近守臣吏部侍郎俞烈重建享堂”。

宋以后,享堂废圯,明代曾又改建。而此次考古在明初地层中所出土的一批陶瓷器,正是这一修缮活动的具体反映。

宋代兴建有不少功臣墓,遗迹迄今尚存的仍以数十

计,但地面享堂遗迹多已不存,其形制格局也不甚明了。此次宗泽墓前享堂遗迹的发现,填补了这一建筑类型的空白。(刘建国)

(七)泰州市汉代井形遗迹

2004年年底,江苏泰州东城河底全面清淤,在河底发现了多处井和井形遗迹,基本上在东城河中偏北的一条直线上,间隔相距约30~40米,时间跨度从汉代到宋代。2005年3月24日,施工人员在东城河(鼓楼大桥向东100多米处的河床中央)发现一处井形的汉代古遗存,并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汉代到隋唐的文物。

井形遗迹深近5、直径0.94米,汉代陶罐堆积4米,共挖出20多只较为完整的陶罐及大量的缺损陶片,若算上可拼对的陶片,出土的汉代陶罐总量达70多只,一次出土这么多的汉代陶器在泰州还属首次。

考古人员在井形遗迹内发现了众多的汉代泥质灰陶罐,多为圆底,下腹及底部饰有绳纹,腹部饰有密集弦纹,罐体两侧有桥形耳,对应部分器身内凹。另有多件青瓷罐(壶),金属器有钱币、鼎足、钩状物、泡钉、刀、铅环等,其中钱币有半两钱、五铢钱以及王莽新朝的钱币大泉五十、隋五铢。此外,还有部分釉质较好,胎质为陶土的陶器,汉代时用瓷上釉已比较多见,但陶土着釉却比较少见,这种陶器的做工跟唐三彩相似。其中一釉陶鸟食器高约3、口径1.5厘米左右,小巧玲珑,釉质光亮。另外还出土了众多的桃核,动物的骨骼、牙齿。

这次在东城河底发现的众多遗迹为研究汉代泰州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同时也验证了文献对泰州的记载,根据以上这些出土文物可以判断,南唐之前,泰州城河北岸曾是人口聚居地,直埡南宋时拓宽城河,居民搬迁,才逐步形成现在的布局。(徐志明 王为刚)

十一. 上海市

(一)闵行区马桥遗址

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俞塘村,1959年发现,之后进行过多次发掘,20世纪60年代考古发掘初步揭示出上海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发现了分布区域中心在杭州湾以北环太湖流域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90年代的大规模发掘成果在于极大地丰富了马桥文化遗存的内涵,基本摸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对马桥文化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发现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村落遗址,和与居住遗存相关的柱洞、陶片堆、水井、灰坑等遗迹。还第一次发现了马桥文化墓葬。马桥文化发明的原始瓷器烧成温度接近摄氏1200度,开中国瓷器烧造的先河。

2005年5月~6月,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主要在遗址区内原富畅制衣有限公司以南、北松公路两侧进行,实际发掘面积为316.75

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一般厚1.3~1.6米,从早到晚依次是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以及宋元时期等。

这次发掘所布的探沟靠近遗址的东缘,因此早期文化如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层的堆积已趋稀薄,遗迹现象亦显贫乏。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墓葬2座,皆平地掩埋,无墓坑葬具。一座骨架保存状况差,仅见部分头骨和肢骨,头向南偏西。另一座墓主人年龄30岁左右,仰身直肢,头向南偏东,左侧上肢骨缺失。随葬品有陶双鼻壶、陶豆等,头骨右方还有一件石钺。

同时,我们在遗址西面的沙冈桥一带进行考古调查,调查范围限在排放雨污水管道工程的近400平方米内,结果发现沙冈桥一段贝壳砂堤的分布范围和走向,并在砂堤以西富岩路以东近生土面上捡取到宋元时期的韩瓶碎片。

沙冈的这段贝壳砂堤是距今 6000 年前的古海岸线, 比形成于 5000 年前的竹冈要早(马桥遗址就坐落在走向为 330 度的竹冈上), 但人类开始在这里活动的时间却很晚。

(周丽娟)

(二) 松江区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

广富林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是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2000 年我们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布了这一重要的新发现(2000 年 9 月 13 日第三版), 并暂称之为广富林遗存。广富林遗存的发现填补了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空白, 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2000 年以来上海博物馆连续在广富林遗址发掘, 对这类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和相对年代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2005 年 4 月~2005 年 5 月,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在 2003 年没有完成的探方继续发掘, 发掘面积 120 平方米, 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广富林遗存的分布及其文化内涵。

通过这次发掘, 丰富了对广富林遗存内涵的认识。广富林遗存的陶器可以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 夹砂陶数量较多。夹砂陶又分灰陶、黑陶与红褐陶三种, 灰陶比较多, 黑陶次之。泥质陶分灰陶、黑陶和红陶, 灰陶和黑陶占大多数。陶器一般为素面, 由于普遍使用轮制的方法, 弦纹是主要的装饰纹饰。其他主要装饰方法还有刻划、压印和附加堆纹等。刻划纹饰种类比较多, 有单线方格纹、复线菱形纹、错向斜线纹、相交斜线纹和竖条纹等。压印纹饰有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附加堆纹围绕器物表面堆贴, 其上多有指捺纹。陶器主要器形有鼎、瓮、豆、罐、鬲、杯等。鼎多为罐形, 口沿面凹弧, 鼎足多为三角形侧扁足, 足尖有按捺成

勾状的特点, 鼎足部位的内壁常见近椭圆形按窝。瓮, 直颈或短颈, 有的颈部内壁内凹, 肩部或饰有数周附加堆纹。豆多为浅盘细高柄形, 浅盘敛口或敞口, 细柄上常饰多道凸棱, 最上端的那道凸棱比较粗壮, 也有粗柄喇叭形圈足的陶豆。罐多为矮颈, 沿面多内凹, 鼓腹, 腹部常装饰方格纹。鬲, 薄胎, 流不太高。杯, 筒形, 平底, 近底部有一周凸棱, 杯身饰竖条纹。

广富林遗存的陶器具有鲜明的特征, 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 它们不同于以往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而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王油坊文化类型关系密切。同时, 它的部分器形又延续了良渚文化晚期器物的特征, 如大鱼鳍形鼎足与罐形鼎等。这些本地文化传统因素的子遗, 在广富林遗存中, 随着时间的发展, 影响逐渐减弱。

与这些遗物共存, 还有一些拍印云雷纹、叶脉纹、方格纹和席纹等的泥质陶, 由于烧造火候较高, 颜色以红或黄色为主, 硬度较高的颜色呈紫褐色, 主要器类是圈足或凹底的罐。这类文化因素, 与南方以印纹陶为特色的文化有着明显的联系。

根据发掘出土遗物分析, 广富林遗存是来自黄河流域的外来文化与本地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型文化类型, 南方文化对其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广富林遗存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因素多源的特色, 与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动荡相关, 它的发现为研究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与文化谱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是长江下游考古的重要发现和新的突破。

(陈杰)

十二. 四川省

(一) 江油市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2004 年 11 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博物馆、江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油市大康镇丰村 9 组的吴家后山大水洞进行了调查。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 2005 年 10 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绵阳市博物馆和江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配合下, 对大水洞进行了发掘。

大水洞坐北朝南, 洞内堆积外高内低呈斜坡状。发掘区选在距洞口 26~36 米之间相对平缓的范围内, 在紧靠洞东壁以东西向开 10×10 米探方 2 个, 发掘面积 200 平方米。根据发掘, 地层可分为 3 层, 时代应为新石器时代。

属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遗物有: 陶片、石凿、石矛、石斧、石镑、石坯、砺石、骨锥、骨切割器、骨刻划器、蚌饰等。出土陶片 611 片, 以灰陶为主, 其次为黄褐陶、磨光黑皮陶、红褐陶。陶片火候较高, 陶质以夹细砂为主, 泥质陶次之, 粗砂陶最少。纹饰有拍打的绳纹, 抹上去的凹纹、压印纹及戳印纹, 以绳纹组合的各种图案为主。可识别的器形有陶罐, 多为侈口圆唇, 也有方唇, 近半数口沿饰花边。领较高, 平

底, 其中有一半陶罐平底做成假圈足。陶器为轮制, 采用泥条盘筑法。出土石器 19 件, 均通体磨光。其中石斧 13 件、石镑 3 件、石凿 2 件、石矛 1 件。石料多选用质地较坚硬石灰岩, 极少使用砾石。石器多双面刃, 刃部多舌形, 也有铲形刃。石凿为圭形。出土石坯 29 件。出土砺石大小残块共 118 块, 上面均留有磨制石器后留下的痕迹。骨器均为动物肢骨经敲打后磨制而成。其中有骨锥 5 件、切割器 1 件、刻划器 4 件。出土蚌饰 1 件, 上有穿 3 个, 双面钻孔。

据发掘情况分析, 依托顺东壁而下的水源, 当时人类活动大致可分为二个区域。生活区在距洞口 26~36 米之间靠近东侧洞壁东西宽 10 米范围内。人们利用洞顶坍塌大石之间的间隙生火取暖熟食, 所以在该范围内有灰烬堆积, 灰烬堆积最厚处达 0.6 米。工具制作区紧靠在生活区的东北侧, 面积约 50 平方米。该区域内出的石坯和砺石较多。

大水洞遗址第 3 层出土文化遗物与距今约 4800 年的绵阳边堆山遗址早期文化遗物比较, 在年代上应早于后者; 与茂县营盘山遗址隔江相望的沙乌都遗址所出遗物相

类似,所以估计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该遗址所处时间及地理位置而言,对研究古羌人进入成都平原的路线及古蜀文明的形成,这批资料无疑是很重要的。(胡昌钰)

(二)渠县城坝遗址西汉木椁墓群及汉代城址

城坝遗址位于川东北渠县土溪镇之渠江东岸,北、西、南3面环水,东接佛尔岩,呈依山傍水之势。遗址距县城约26公里,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队于2005年3-6月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首次的正式发掘。

本次发掘工作分二个区域进行布方,一区主要为遗址的西汉木椁墓墓地,二区为遗址。发现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木椁墓3座、西汉土坑竖穴墓、汉代灰沟2条、汉井1座、灰坑24个;出土大量铜器、漆器、铁器、陶器、竹木器以及陶器残件、瓦片等。

三座西汉木椁墓,编号分别为M1、M2、M3。三座墓葬皆保存完整。共出土器物200多件,以漆器为主,陶器、铜器次之,另有铁器、漆皮陶器和竹木器。漆器器形有耳杯、圆盒、方盒、椭圆盒、奩盒、剑鞘、扁壶、盘、卮、木柄勺;纹饰主要有鸟头纹、变形鸟纹、凤形纹、花草植物纹、几何纹;部分器物沿部或底部有烙印、漆书的“造”、“杨”、“山”、“成亭”等文字。铜器器形有釜、甑、釜、带钩、刁斗、勺、铜镜等;在M2中出土有不同形制的“半两”钱,M3中则出土有“五铢”钱。铁器有剑、三足架、铁釜等。陶器有罐、瓮、盆、盘、灶、釜、钵、仓、钟、甑、锅盖、纺轮等。漆皮陶器的器形主要有蒜头壶、盒、瓮等。

本次调查在郭家台地区发现保存较好的城墙约几百米,现存高度约为1.2-1.8、厚为1米左右,城墙外围有较深壕沟,夯土中包含大量的汉瓦、砖和陶残片等。在现存城墙的附近发现多处夯土现象,深度距地表约1.2-2.7、宽度为1米左右。在勘探中还发现集中分布的木椁墓群、砖室墓群、城址区和部分堆积清晰、文化层较厚的遗址区。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遗址在此次已调查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功能分区,可以初步确认遗址的西汉木椁墓地区域、砖室墓地区域和城址区域。

城坝遗址现存有较好的城墙、房址、水井、窑址、墓葬等汉代遗迹,并出土了较多的汉代遗物和商周时期典型巴蜀青铜乐器、兵器。出土的青铜甬钟、铎于及汉代釉砖、方形灶、朱雀纹瓦当等器物在四川地区都为极为少见,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出土的漆器器形多为单一的生活用具,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巴蜀漆器较为典型的器物特点,而部分漆器的器形和纹饰又有着明显的秦、楚、漆器的特点,这为研究巴蜀漆器及其与秦、楚漆器的关系等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此次发现的棺椁制木椁墓群和出土的大量漆器在川东北地区都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川东北地区的考古空白。而3座木椁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在年代上分别属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这对研究四川地区木椁墓的发展、分期提供了重要的

资料。(刘化石 黄文峰 马莘辛)

(三)嘉陵江流域考古

嘉陵江古称阆水、渝水,是长江的一个支流,是先秦时期巴人主要居住区域,也是中原文化、楚文化与蜀文化交流的通道。为弄清巴文化的来源、内涵、发展及其演变,同时也为了对巴蜀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从1999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嘉陵江流域及其支流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先秦时期的遗址30余处,并重点发掘了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和阆中彭城坝。对进一步认识巴文化的内涵及其巴蜀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建立在嘉陵江流域及其支流的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将这三处主要的遗址介绍如下:

1. 宣汉罗家坝遗址 遗址位于宣汉县普光镇进面环水,一面靠山。墓葬39座、灰坑50座、房屋基址2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该遗址可分为3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周时期和汉代。以东周时期文化堆积为主,包括了大量的东周时期的墓葬和灰坑,解和把握了这一时期的巴文化的分布、巴文化的分区、分期等。

2. 渠县城坝遗址 遗址位于四川渠县土溪镇城坝村。面积约330万平方米。去年发掘清理墓葬3座、灰坑19个、灰沟1个,出土各类器物230余件。城坝遗址以战国晚期和汉代堆积为主。特别是发掘3座战国晚期和汉代的木椁墓,进一步完善了川东地区木椁墓的内涵,同时该遗址与宣汉罗家坝遗址相距较近,但在埋葬方式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了解东周时期民族构成、文化的差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 阆中彭城坝遗址 遗址位于阆中市彭城镇彭城坝村,嘉陵江西岸一级台地。台地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保存较好;2005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阆中市文管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勘探,并选择遗址的不同地点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商周时期的陶器,特别是尖底和高柄陶器,对于早期蜀文化分布与扩张有了进一步认识。

以上遗址的发掘对嘉陵江流域的巴蜀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并对巴蜀文化的分期、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主要的收获包括:

1. 基本建立了嘉陵江流域的文化体系。从目前发掘的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流域的支流渠江流域附近,以巴中月亮崖、通江雷鼓寨、宣汉罗家坝早期遗存为代表,出土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灰陶、黑陶、红陶次之,纹饰有绳纹、网格纹、附加堆纹、戳印纹、蓖点纹、弦纹、篮纹等。器形有花边口沿罐、折沿罐、喇叭口罐等。这对进一步研究该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嘉陵江流域商周时期的遗址主要有阆中彭城坝遗址、阆中坪上遗址、阆中兰家坝遗址、南充涪佛寺遗址、渠县城坝遗址等等。从出土和采集的陶器来看,以黑陶和灰陶为主,器形主要包括小平底器、尖底器和高柄器,包括小平底

罐、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等,进一步认识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以及巴、蜀、商周文化的关系。

东周时期的遗址以宣汉罗家坝遗址为代表,发掘共清理东周时期的墓葬39座,出土1000余件器物,特别是2003年发掘的M33,是目前发现的巴蜀文化的大型墓葬之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对于进一步认识巴文化的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对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的礼制有了全新的认识。

汉代遗址以渠县城坝遗址为代表,2004年发掘出汉代木椁墓2座,是目前川东北地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木椁墓,对于进一步认识该区域的汉代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完善了对商周时期川东北地区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川东地区的商周文化的内涵不是很清楚,而嘉陵江流域采集和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器物,使对长江上游地区和西汉水流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商周时期川东北地区文化主要内涵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这也使对于川东地区的商周文化与三峡地区(以湖北路家河遗址、万州中坝子遗址为代表)和陕南的城洋地区(以城固宝山遗址为代表)同时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

而罗家坝遗址的发掘则使对于东周时期巴人墓葬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同时对巴文化的内涵、发展、演变及其礼制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3. 城址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四川地区的城址发现较少,对于四川地区城址的研究历来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而渠县汉代城址的发现,对于进一步认识汉代城市布局、城市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调查表明该城址存在的功能上的分区,即遗址可分为土坑墓区、木椁墓区、砖室墓区和城市区,这对进一步认识战国至西汉的城市的功能、城市的分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卫东 周科华)

(四)成都平原考古勘探与发掘

1. 先秦时期遗址与墓葬的发掘

(1)金沙遗址及其周边地点商周遗址

本年度金沙遗址中心区开始进行大面积发掘,已有一些重要发现,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另在遗址范围内的其他地点还发现了一批早期船棺墓、干栏式房屋建筑遗迹和大面积单间屋址等重要现象。

遗址东北部的西延雅舍地点与1999年曾发掘出商代晚期大型建筑群基址的三和花园地点相邻,此次发掘面积共计2497平方米,发掘区内的商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开口于第3文化层下的墓葬、第4层及此层下的墓葬和第5层属西周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存是129座墓葬及随葬器物,而其中的一批船棺墓尤为重要。船棺墓都为土坑竖穴,长多为3至4米,以单墓独葬为主,也有两墓异穴合葬、三墓异穴合葬。部分墓葬的船棺还保存有木质痕迹。船棺底部断面均为弧形,葬式为仰身直肢,都是二次葬,人体骨骼放置略显零乱。有部分墓的棺外还放置有非墓主人的肢骨,也有放动物骨骼者。有部分船棺墓有随葬器物,包括

放于墓端棺外的一至二件陶高领罐、直口罐,放于墓主腹至股骨范围内的磨制的卵形石、玉器及玉凿等,有6座在墓主头侧或上方放置成堆的矛、戈及有柄的小型铜质明器。这些船棺墓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批的船棺墓,对了解早期船棺葬的特征及船棺葬的起源非常重要。开口于第5层下的遗迹、第6层及此层下的遗存为商代遗存。遗迹有灰坑、灰沟、陶窑,其中灰坑数量超过600个,显示出该发掘区应是一处有一定规模的生活遗址的一部分。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基本上是生活用陶器,器类有陶瓮、缸、盆、高领罐、圈足罐、簋形器、尖底杯、卷沿尖底盏、器盖等。此次发掘的主要遗存的年代上起殷墟三期,下至西周中、晚期,延续时间较长,对于了解这一阶段的文化面貌,以及弄清金沙遗址中、晚期的分布和文化内涵有十分重要意义。

此外,在青羊区龙嘴村六组地点发现了商周时期灰坑3个。金牛区郎家村“精品房”地点发现的F63为干栏式建筑,仅残存部分卵石柱础,平面呈方形,方向315°,东西长约3.4米、南北宽约3米,面积约10平方米,卵石柱础东西排列,残存6排,卵石间距0.24~0.3米,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尚属首次。金牛区城乡一体化工程2#拆迁安置房地发现了一条长约24米的卵石带,宽约0.5米,西南-东北走向。3#拆迁安置房地发掘的F69为面积较大的单间建筑房址,系沟槽式建筑,沟槽宽约0.3米,深约0.15米,内有直径约0.1米的小柱洞,单排分布,深浅不一,比较密集,房址呈西北——东南向,长14.5米,宽9米,房址中央有一直径0.75米的柱洞,东南角有一个1.5米宽的缺口,当为房门所在。这些地点的发掘为研究金沙遗址的聚落规模与结构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2)成都高新西区新石器及商周时期遗址群

方源中科金属锥形塔生产线地点发掘面积为162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丰富陶片,发现3个灰坑。第5层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绳纹花边口沿罐、盘口尊、喇叭口高领罐、壶、豆、圈足等,从文化面貌及风格看,属于宝墩文化的范畴,时代可能在宝墩文化三期晚段和第四期之间。第4层出土的遗物主要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少见,以夹砂灰褐最为多见,次为红褐和黑褐,泥质陶仅见灰陶,主要是尖底杯。素面陶居多,纹饰少见,以绳纹多见,次为弦纹、网格划纹、附加堆纹等。陶器制法以轮制为主,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仍占有相当比例。陶器烧制火候较高,陶片出土较少,多残碎,器形可辨的有小平底罐、罐、瓮、盆、器盖、瓶等。该地点尖底杯较少发现以及不见尖底盏、瓮形器、矮圈足豆、釜形器等西周晚期常见的器物,其时代推测为西周前期。

摩甫生物科技地点遗址的现存面积大约为1380平方米,北侧和西侧均为道路,东距格威药业一期厂房(该地点于2003年发现宝墩文化遗址)50米,南边有一条河流自西向东而流。发掘面积为279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陶片,

遗迹现象包括3个灰坑。第5层及其开口于其下的灰坑出土陶器分为两组,甲组包括绳纹花边口沿罐、尊、矮领圆肩罐等,为宝墩文化四期晚段遗物。乙组包括小平底罐、瓮形器、簋形器、尖底杯、尖底盏、盆、高领罐等,时代推测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中海国际社区地点的A、B区地点发掘面积477米,出土陶器主要有高柄豆、小平底罐、尖地杯、敛口罐、器盖、纺轮、圈足罐等。石器常见的有的斧、锛、凿、砺石等。磨制精细,器形较小。还发现了一条宽3~3.5米、长25米、深1~1.5米的灰沟(壕沟?),该灰沟里出土了丰富的高柄豆、圈足罐、敛口罐、瓮、高领罐、小平底罐等。年代为商周时期。D区遗址现存面积大约为4000平方米,发掘面积3700平方米,堆积较薄,厚5~20厘米。从探沟剖面情况反映有房址、灰坑等遗迹现象。清理灰坑18个,房址1座。遗物中陶器主要有绳纹花边口沿罐、喇叭口高领罐、壶、敞口尊、盘口圈足尊、豆、侈口折沿罐、纺轮等,石器有斧、锛、凿、镞等。F区发掘面积1329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较薄,厚15~25厘米。遗迹现象主要是灰坑。该地点出土的陶器主要有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盘口尊、纺轮、绳纹花边口沿罐等。石器磨制精致,器形普遍较小,常见的器物有锛、凿、斧、镞等。D、F区均属于宝墩文化范畴。

西华大学新校区六号教学楼地点处于一个早年经过改土的台地之上,发现遗址面积约3440平方米,其中堆积保存较好的有1500平方米左右,文化层堆积厚度为20~40厘米。发掘面积为122平方米。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片,发现3个灰坑。第6层及其下灰坑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夹砂陶以灰褐陶为主,次为红褐、黄褐,泥质陶主要有黑皮、灰白陶。纹饰单一,绳纹多见,另有弦纹、划纹、戳印纹。陶片大多残碎,均不能复原,常见的陶器有小平底罐、盆、罐、瓮、器盖、高领罐、豆柄等。陶器制法以泥条盘筑为主,多数器物经过慢轮修整。其时代推测为西周前期。第5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次为灰褐、黄褐。火候较高。纹饰单一,绳纹多见。陶片大多残碎,均不能复原,常见的陶器有小平底罐、敛口罐、器盖、瓮豆、盆、豆柄等。陶器制法以轮制为主。该时期出土的陶器最大的特点是大量火候较高的瓮形器的出现,时代推测为西周中晚期。

另外,在顺江小区地点发掘了162平方米商周遗址,高新西区政务中心发掘地点81平方米商周遗址,中信吴园地点发掘50平方米宝墩文化遗址。

高新西区上述地点的发掘为成都市西郊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情况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丰富了川西平原新石器和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

(3) 青白江区三星村商周遗址

遗址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三星村六组,发掘面积325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较简单,至上而下可分为五层,第1层为现代农耕土层,第2层为明清时期堆积,第

3层为三星堆文化堆积,第4层为宝墩文化堆积。此次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丰富,共发现灰坑10个、墓葬5座、房址2座。灰坑根据平面形状,可分为不规则形和圆角长方形两类,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随葬品,东北西南向,房址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类,长方形房址为木骨泥墙建筑。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石器、玉器和木器。陶器多为慢轮制作,陶质以夹砂陶偏多,泥质陶也有一定数量;夹砂陶陶色以褐陶居多,另有灰陶、黑皮陶、红陶、灰黄陶等,泥质陶以灰陶居多,另有褐陶、灰白陶、红陶、黑皮陶等。陶器表面以素面为主,纹饰可见粗细绳纹、圆圈纹、指甲纹、弦纹、刻划平行线纹、戳印纹、水波纹等;器形有小平底罐、绳纹花边口沿罐、高柄豆、瓮、盆、尊、壶及纺轮等。木器发现1件鸟头,长喙,以阴线刻出鼻、眼等部位,造型简单。石器均为小型磨光石器,类型有斧、锛、凿等。玉器仅发现一件玉凿。遗址出土器物可分为两组,一组以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具有宝墩文化风格的器物为典型代表,另一组以小平底罐、高柄豆、盘、瓮等具有三星堆文化风格的器物为典型代表。根据层位关系和器物组合的变化,遗址可分早晚两期,早期年代与宝墩文化四期相当,晚期年代宝墩文化四期至三星堆文化二期之间。在三星村遗址中,一些遗迹单位宝墩文化时期的遗物和三星堆文化的遗物共出,为研究宝墩文化的发展演变和三星堆文化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2. 汉至明代墓葬、遗址的发掘

(1) 青白江区跃进村汉代墓葬

位于青白江区大同镇跃进村六组,共计清理发掘汉代墓葬19座,有砖室墓和木椁墓两种类型,其中,砖室墓10座、木椁墓9座。从清理发掘情况看,第2、6~10、16号砖室墓,均用素面砖建成,墓顶用扇形砖砌成并列券拱,此类墓规模较小,但出土器物丰富,有平底罐、折腹钵、仓、灶、鸡、狗等陶器以及五铢、货泉等钱币,其时代当在王莽时期或东汉早期;第4、17、18号砖室墓,规模较大,墓葬以花纹砖建成,墓顶以楔形砖建成纵列联拱,花纹砖种类丰富,有菱形纹、联壁纹、钱币纹等,此类墓葬出土陶器有平底罐、折腹钵、瓮及鸡、鸭、狗、车等陶模型,4号墓以石棺为葬具,18号墓以陶棺为葬具,出土钱币有五铢和剪轮五铢,墓葬时代在东汉末期;特别是在第4号砖室墓内,发现一具画像石棺,石棺以12块石板拼合而成,石棺门已不见,棺盖为双层庑式房顶形,由三段构成,石棺的右侧雕刻有精美的画像,画像由三部份构成:中间为侍女倚门图,右侧门半开,左侧门未开,一侍女站立在半开的门缝中,探出半身,人物形像栩栩如生,左侧门的下部刻有一蟾蜍捧着灵芝;石刻的右侧图案分两部份,上部为窗棂,下部为二只仙鹤嬉戏图;石刻的左侧图案也由上下两部份构成,上部刻有兵器架,架上挂有长矛、盾牌和甲冑,下部有狗在守卫;石棺门两侧的立柱上雕刻有双阙图;石刻画像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宗教和丧葬习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

究价值,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第1、3、5、11~15、19号墓为木椁墓,该类墓均用木板建成木椁,以木棺为葬具,木棺放在木椁内,由于这些墓葬早年被盗,木椁和木棺保存较差,多已腐朽,有的仅存木板痕迹,木椁墓出土的陶器有折腹钵、平底罐、瓮、圈底釜等,铜器有洗、盆、弩机等,出土钱币为汉半两、五铢和货泉,其时代应在西汉末年至王莽时期。此次发掘的汉代墓葬,排列有序,墓葬型制发展演变规律明显,出土器物丰富,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为研究四川地区汉墓的分期及四川地区汉代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资料。

(2) 中海国际社区晋墓

中海国际社区发现的墓地位于禾家村4组,墓地现地表为农舍,高出周围地面2~3米。该墓地的墓葬由于早年农民建房平整地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仅存3座,墓葬封土和顶部均严重残损。3座墓都仅存墓葬底部和直墙一段,墓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随葬品所剩无几。墓葬均为砖室墓,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墓室结构简单,墓道和封土均不存,现代房屋废弃地基下即为墓葬,墓葬上部严重扰乱,都仅存墓底部分。墓葬基本排列在一线上,相互之间距离相隔甚近。从残留的遗迹现象观察,M3和M2估计原有墓道,二墓都有长方形甬道,墓室内未有分室,不见壁龛和后龛结构;M1均无墓道和甬道。这三座墓葬有一共同的建筑特征是其墙体下都铺有砾石和泥土相隔而筑的基础。三座墓葬内均未发现人骨遗留,其葬式和葬具均不明,由于墓葬被严重扰动,除M3还残留少量随葬品外,其余二墓不见任何随葬器物。M1和M3均出土了“元康八年八月廿日”的纪年砖,这两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元康”为西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的年号(公元291年三月~299年)，“元康八年”即公元298年,M3出土的陶灯和瓷碗为三国至西晋时期的典型器物,因此M1和M3的埋藏年代为公元298年。M2虽然没有出土任何随葬器物 and 纪年砖,但从其墓葬形制和墓葬建筑风格与M1和M3相近,其时代可能相近,可能为西晋元康时期的墓葬。成都平原地区西晋时期的墓葬较少发现,有明确纪年的西晋时期的墓葬更是少见,这三座墓葬的发掘清理,提供了西晋时期墓葬的重要的考古资料。

(3) 成都西郊金沙村唐墓

位于成都市西郊金沙村“天韵金沙”商住小区,东邻青羊大道,南距成温公路约500米,北与金沙遗址博物馆相接。发现的2座唐代墓葬编号为2005CQJM1和2005CQJM1。M1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向185°,由墓室、甬道、棺台、壁龛组成,墓顶和墓室前面部分早年被破坏。M1南北长4.36米,东西宽1.98米,残高0.96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94米,宽1.38米,残高0.96米,壁厚0.18米,两侧壁砖从下至上先二横一丁,再三横一丁依序而砌,墓底顺铺一层砖;甬道长1.06米,宽与墓室一致,甬道底部比墓底低0.42米,斜铺一层底砖。墓室内设置一棺

台,残长1.7米、宽1.2米、高0.3米,棺台底砖横向错缝平铺,棺台与墓室后壁相连,东西边沿与墓室两侧壁之间形成0.2米宽的沟槽,可能起排水作用;棺台上有两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但放置较为凌乱。在墓室中部两侧各有一个壁龛,只东壁龛保存较好;壁龛平面呈长方形,龛宽0.84米,进深0.64米,残高0.2米,下沿距墓室底部深0.24米,龛底横铺底砖。随葬器物有两件瓷碗、两件四耳罐、8枚开元通宝、1枚乾元重宝、石墓志1件,其中,墓志为正方形,青石质地,石志盖为复盖顶,边长50厘米,厚7厘米,盖中间为方形,边长32厘米,刻楷书“唐故鲜府君墓志”,四周刻双栏边线,中间刻牡丹花。墓志厚6厘米,边长50厘米,每壁用单栏线分成四等份,刻四个壶门,共计16个壶门,中间志文为楷书,志文内容为“……大中四年二月廿一日寝疾不廖歿……”。M2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向220°,南北长4.18米,东西宽2米,残高1.2米,由封门墙、甬道、墓室、棺床、壁龛组成,墓室前段两侧各有一个壁龛,墓室后部有一后龛。随葬器物较少,有瓷碗3只、瓷四耳罐1件、瓷双耳罐1件、开元通宝11枚。目前,成都发现了不少唐代的墓葬,但有纪年材料的极少,M1出土了有纪年的墓志,为成都地区唐代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M1和M2发掘,为研究成都地区唐代的历史沿革、丧葬习俗等提供了新的信息。

(4) 琉璃乡明蜀太監墓群

位于锦江区琉璃乡皇经楼村三组“东方阳光城住宅小区公建配套项目——皇经楼小学”的基建工地,共发掘清理了19座墓葬。墓主人是明万历年间蜀王府的太監。墓葬均于早期被盗,部分墓葬的墓门、后室门上有阴刻或浮雕后彩绘的人物图。部分墓葬的前室天花板上有云、鹤纹彩绘。墓葬内出土有部分石质品和陶、瓷器等。琉璃乡明蜀太監墓群规模较大,有些墓结构还很完整,纪年也比较清楚,墓内的雕刻和壁画精美、富丽,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为成都乃至四川明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

(5) 都江堰鱼嘴外江河床考古发现

都江堰风景名胜管理局负责的“加固外江索桥桥墩”工程的施工中共出土文物78件,含2尊石像和1通汉碑。其中一尊石像高约2米,下宽1.1米,厚0.55米。汉碑被挖残,目前见到的部分残高约1.5米、宽0.9米、厚0.2米,上为阴刻隶书文字,其中有“建安四年正月”等纪年文字,建安四年(己卯年)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年号,为公元199年。此次汉代石刻文物的出土地点与1974年、1975年出土汉代李冰石像和持锺人像的地点相距不远,石质相同。李冰石像年代是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比此次发现的汉碑年代早31年。碑文中的“北江场大守”未见于文献典章的记载。其他出土文物多为石构件,大多与修造河堤有关。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汉代石雕像群,也是都江堰建堰历史的最重要的佐证,表明纪念治水的仪式、制

度自西汉以来即已形成。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水利史、水文化以及都江堰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6) 邛崃市龙兴寺宋代遗址

遗址位于邛崃市城西,发掘出土大量遗物并发现大量与寺院有关的建筑遗迹。遗址划分为四个区,主要的发掘集中在I、II区内。塔址、出土佛像的H5在I区范围,这次发掘在I区南河(即张公堰)东岸自然台地上发现一处三开间两进式的建筑遗迹,即I-F1,由于破坏严重,仅保留有方形礅墩,建筑经过多次维修。此外在I区南河东岸出土水井四口,为砖券。此次对塔址进行了正式发掘,拆除原建在塔基上的现代庙,截至目前,塔址的清理基本结束,塔外墙边长约11米,近方形。由于在塔基北部清理出石阶梯可以推断塔门北向,外墙包砖残存有1.3米左右高,红砂石散水保存较完好。塔心填土经过简单夯筑,底层填土中出土少量描金经板及石刻佛像。II区的工作主要围绕发现的大型建筑——罗汉殿开展,即II-F1。F1长约25米,宽约23米,礅墩及台基东部包边石保存较好,推测建筑废弃后,即遭到破坏,台阶及包边石均被取走另做他用。从遗留下来的痕迹看南部曾经有阶梯,并且台基南部、东部有卵石瓦砾做成的散水和暗沟便于排水。判断II-F1的性质主要是依据台基四周垮塌堆积中出土的大量灰瓦上的铭文:“众屠行食店户捨度生钱造瓦盖罗汉殿”以及众多的“×××施”铭文瓦,在台基西北部还发现较多“官”字琉璃瓦。出土遗物中主要是宋代的瓷器残片,以生活用器碗、罐、盏等为主,多为邛窑烧制;出土的钱币有“祥符”、“咸平”等北宋和南宋的年号以及较多的“开元通宝”;佛像及经幢多以红砂石为雕刻原料,以唐代造像为多,雕刻技艺精湛,部分造像和经板有贴金箔,但多位残缺;比较特殊的是邛崃龙兴寺出土的佛像有个别表面涂釉,经过烧制,釉色以青釉为主,这类造像在全国尚属首见。(陈剑)

(五) 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与试掘

1. 西昌市营盘山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

遗址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西北的樟木箐乡麻柳村2组,距离樟木箐乡政府7公里,距西昌市38公里。地处安宁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为2000平方米,地处安宁河谷台地之上,早期文化堆积分布呈斜坡状堆积,西高东低,文化层厚10~80厘米。试掘面积为82.5平方米。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片和少量磨制石器,同时发现了竖穴土坑墓、瓮棺葬、灰坑等遗迹现象。遗址可分为三个时期的堆积:早期以T3第6层为代表,出土的陶片较少,主要为夹砂褐和灰褐陶,泥质陶不见。代表性器物为附加堆纹罐、卷沿罐、钵等,另有2件大网坠,出土陶器的风格与经久马鞍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早期遗物相同,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二者时代也可能接近。中期以开口于4层下的土坑墓和瓮棺葬为代表,这也是该遗址发现最多和遗物最为丰富的遗存,共发现13具瓮棺,依据内置瓮棺数量的差异,可分为三类,有三棺、二棺、一棺的,以一棺最

多。这些瓮棺葬的葬具大多数相同,个别有些许差异,瓮棺绝大多数遭到破坏,放置方向不一。一般在平地上随罐挖坑,多不规则,无封土或标识物。多数瓮棺底部有圆形穿孔,保存较好的瓮棺上放置有器盖,填土为当地的红褐色砂土,结构紧密,无包含物,不见人骨遗骸,这困难与当地酸性土壤的原因。另外在道路西侧发现了2座竖穴土坑墓,坑口平面为长方形,方向为东西向,填土为红褐色无花土,结构紧密,填土中发现有石镑、石凿及少量夹砂陶片,墓室不见葬具和人骨遗留,仅一墓随葬1件陶豆。另外还出土了大网坠和石刀。由于这些墓葬之间存在着早晚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整理和明晰。从瓮棺的形制特点和陶罐风格看,中期的时代推测为西汉晚期~东汉初中期。晚期堆积以第4层为代表,出土的陶片主要为中期和早期的陶片,以中期陶片居多,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东汉花纹砖和泥质黑陶钵或豆的陶片,从出土东汉花纹砖的特点看,其时代为东汉晚期。营盘山遗址的调查与试掘为认识安宁河流域汉代遗存文化特点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同时对于认识横栏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安宁河流域的区域聚落及大石墓的考古研究提供新的考古材料。

2. 西昌市经久马鞍山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

遗址原称马道横南山遗址,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西南20公里的经久乡马鞍村北面的马鞍山上,307省道从遗址上自东向西穿过,严重破坏该遗址的西部,加上历年的垦殖,对古遗址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汉代墓葬严重扰乱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堆积。遗址呈东西向分布于半山坡上,西面约1公里处为安宁河从北向南而流,属于山间坡地遗址,地形为东南高、西北低,当地人俗称“蛮山”。遗址现存面积约为20000平方米。遗址早期文化堆积厚度为30~70厘米,由北而南呈斜坡状堆积。试掘面积75平方米。本次调查与试掘取得丰硕的收获,出土了相当丰富数量的陶器和石器,并发现有灰坑、建筑、墓葬等遗迹。

遗址的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的堆积:早期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陶器有夹砂褐、灰、灰褐陶,其中以褐陶最多见;泥质陶罕见,仅见钵。火候较低,胎土较为粗糙,磨和大量石英或粗砂粒。陶器纹饰较多,常见制法有印纹、划纹、附加堆纹等;陶器器类有壶、钵、器盖、花边口沿罐、小口罐、带流罐、侈口罐等。其中颈部和沿部装饰有泥条附加堆纹的侈口罐、腹部饰有一圈泥条附加堆纹的钵等是该遗址最具特色的器物。石器出土数量相当丰富,不见打制石器,仅见磨制石器。石器磨制精致,器形丰富,常见的有斧、镑、凿、镞、砺石刀等。其出土的附加堆纹罐和钵形器卷沿小口罐等与大兴横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有相近之处,但陶质差异较大,与大石墓出土陶器质地相近,缺少高领盘口罐、壶等,纹饰相对较少,但不出土大石墓系统的陶器,因此推测其时代

可能介于二者之间,与横栏山文化为同一文化不同的阶段。中期为开口于3层下的墓葬,为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为褐色五花土,结构紧密,件内含少量的夹砂陶片。接近墓底发现有棺槨的痕迹,人骨不存,墓底东北角随葬由件陶器,分别为2件陶釜,1件高领罐(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点与当地西汉晚期墓葬特点相近,时代可能为西汉晚期。晚期地层中出土的遗物中经常伴出东汉花纹砖和陶片,从其器物时代特点看,其时代推测为东汉中期。本次调查与试掘所获得的考古实物资料初步揭示马鞍山遗址的文化面貌、时代特征,并提供了该遗址保存现状、分布面积、生态环境等诸方面的信息。通过发掘我们认识到马鞍山遗址是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为典型的山间坡地遗址,它的发现与研究将为安宁河流域的区域性系统聚落考古提供新的考古材料。(陈剑)

(六) 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考古调查与试掘

1. 茂县安乡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位于岷江上游茂县南新镇安乡村小学校内,文化层堆积厚度约1.5米。调查采集遗物包括陶器和玉石器。陶器以夹砂褐陶、泥质灰陶、泥质红褐陶为主;纹饰包括斜向细绳纹、线纹、凹弦纹、附加堆纹、平行线纹及弧线纹彩陶等,夹砂褐陶侈口罐唇面多饰绳纹;器形包括平唇口及喇叭口高领罐、双唇口瓶、尖唇敛口钵、大口彩陶罐、细颈小口彩陶瓶、彩陶盆、侈口罐、钵、杯、器盖等;均为手制,一些器物经过慢轮修整。玉器有通体磨光的长条形双端刃玉凿。细石器有黑色燧石片刻划器等。根据出土陶器特征分析,遗址主要包括两个时期的堆积,早期遗存与大地湾遗址第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文化相当,晚期遗存与马家窑类型文化相当。遗址的内涵与茂县营盘山遗址相近,但个别遗物表明其年代上限略早。

2. 马尔康县哈休新石器时代遗址

哈休遗址位于马尔康县沙尔宗乡政府驻地东北一公里处的哈休村,茶堡河二级台地之上。地表呈缓坡状,北高南低,距河床高约25米,相对高差30米。东西长220米,南北宽160米,总面积约35200平方米。遗址北部断面发现原生文化堆积,距地表深1~2米,长约30米,厚0.5米,

内含大量早期陶片、炭屑、烧土块、兽骨等。在断层中部有一处灰坑遗迹,长1.8米,厚0.6~0.2米,内含大量早期陶片、兽骨、彩陶等。遗址中部有一长期雨水冲刷形成的冲沟,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台地面积占遗址面积的三分之二。整个台地黄土发育较发达,厚达十余米。从采集遗物的分布来看,遗址应以西部为中心。采集陶器包括泥质黄褐陶线条纹彩陶瓶、粗细弧线条纹折沿敛口彩陶盆(灰褐底色,腹表及沿面施彩)、弧线纹内彩钵、泥质灰陶折沿平唇口瓶、带盖盆、夹砂褐陶敛口鼓腹罐、沿面、唇面及腹表施绳纹,上腹装饰横向鸡冠状压、上腹带穿孔的泥质磨光黑皮陶钵、施绳纹及箍带状附加堆纹的夹砂褐陶片和泥质灰陶片等。石器包括打制石刀、穿孔石环等。遗址出土的彩陶器、泥质褐陶碗等与马家窑类型文化的同类器面貌相同,夹砂陶侈口罐、泥质陶平唇口瓶、折沿钵等与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等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其时代也相距不远,约为距今5000年前后。

马尔康境内新发现的孔龙村遗址、白賧遗址等与哈休遗址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应是大渡河上游地区的一种包含较多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新石器时代地方土著文化类型。

3. 马尔康县木尔溪汉代遗址

遗址位于四川马尔康县梭磨乡木尔溪村,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梭磨河的北岸二级阶地之上,南临刷(经寺)马(尔康)公路。遗址地表略呈缓坡状。发掘共布5米×5米的探方4个,其中临近公路的2个探方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发现的遗迹主要为较宽的石砌墙基,局部已坍塌,墙基附近还有较多的红烧土和灰炆堆积。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石器、骨角器及兽骨等。陶器均为夹细砂陶,陶色包括褐陶、灰陶、黑陶等;纹饰有较浅的划纹等;陶器均为平底器,一些器底外折成假圈足器,器形包括方唇长颈罐、双耳罐等。石器有打制石片等。骨器包括磨制精美的长条形歧端八齿梳等。兽骨主要为鹿角。遗址出土陶器特征与大渡河上游地区小金县日隆镇石棺葬的随葬陶器相似,时代为汉代。这是大渡河上游地区首次发掘的石棺葬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丰富了石棺葬文化的研究内涵。(陈剑)

十三. 西藏自治区

(一) 西藏林芝地区考古调查

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两处。一处位于林芝县米瑞乡多普村,为竖穴土坑墓,在其附近采集有夹砂绳纹陶片;一处位于波密县林芝村,也为竖穴土坑墓,曾出土陶器和网坠。陶器器型以罐为主,有单耳敞口罐、束颈鼓腹罐和敛口鼓腹罐,另有钵和带盖的高领球腹壶。出土的大量陶片中,除了少量的绳纹陶片,其余均为夹砂灰陶。此次调查清理了一座暴露的墓葬,清理出人骨和一件完整的夹砂单耳陶罐。其中,网坠的发现表明该遗存的经济文化类型中

存在渔猎经济的成分。陶壶的造型与西藏西部的同类陶器相似,表明史前时期西藏东西部之间存在较早的文化交流。

新发现一处史前遗址——卡达遗址,位于波密县卡达村。遗址已被318国道破坏部分。从路边断崖的剖面观察,该遗址文化层较厚,呈斜坡状堆积,采集有磨制石器、泥质夹砂陶片和骨头等遗物;残留有一处石棺葬。据当地村民告知,早年曾在此墓葬中挖出几件陶罐,调查时我们见到了其中一件,器型为单耳敞口罐,陶质为夹砂灰陶,制法为手捏。根据出土遗物的特征分析,初步判断其为一处新石

器时代晚期遗址。

还发现吐蕃中晚期至明清时期的建筑遗址四处,它们分别是波密县当嘎果园石砌建筑遗址、波密县嘎朗古香村嘎朗王宫和妃子殿夯土建筑遗址、波密县雪瓦卡村石砌建筑遗址、米林县热嘎村大型石砌建筑遗址。

此次调查发现林芝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单从陶器的特征就可以看出它是与卡若文化、曲贡文化有一定区别的文化遗存。这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藏东林芝地区的史前文化内涵,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陈剑)

十四. 云南省

(一) 临沧市硝洞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临沧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毗邻中缅边境。2004年11~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临沧进行公路基建考古调查与勘探和对相邻地区史前遗址进行调查时,在沧源农克硝洞采集到一批旧石器标本。

硝洞位于云南临沧市沧源县勐省镇农克办事处南约1公里的贺猛河东岸,海拔1195米。当地百姓称之为硝洞,该洞是二叠系灰岩形成的巨型岩厦,洞口朝东北,洞口至岩壁呈斜坡状。大部分地层已被当地百姓在挖肥料和龙骨时破坏,部分地段尚保留着原生地层,含石制品、烧骨、碳骨及化石,文化层厚约2米。该洞于1981年被首次发现,采集到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手斧以及中国犀、黑熊、猕猴、水鹿、鹿、牛、獾等动物化石。曾被认为(1982年)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相当。

此次考察在该洞扰乱的文化层中采集到砍砸器、刮削器、手镐、薄刃斧、石核等石制品。石制品的原料为花岗岩、玄武岩砾石,加工简单粗糙,单面加工为主,少数两面加工。石制品的平均大小为10厘米。其文化性质应与蓝田人遗址、郧县人遗址和百色盆地的石器相当。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农克硝洞是云南省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建址,它的发展与研究为寻找直立人(猿人)化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研究我国华南与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吉学平 马娟)

(二) 昭通市水富张滩战国、西汉土坑墓群

2005年3月,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文体局告知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水富张滩战国、西汉巴蜀文化土坑墓群所在地拟建电石厂。通过与基建部门的多次磋商,昭通市文物管理所于4~6月,对水富张滩战国、西汉土坑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

张滩墓地位于水富县城南30公里,横江左岸第二台地上,沿江呈长条形的一个坝子。发掘面积21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5座,出土各类文物425件。其中陶器有陶盒、陶罐、陶豆、陶釜、陶纺轮、陶珠;铜器有铜釜、铜甗、铜印章、铜釜、铜带钩、铜剑(基本上都有木剑鞘,已腐烂)、铜矛、铜钺、铜斤、铜匝、铜镜、鍍金铜器、铜半两钱、各种料饰、大量漆痕、少量纺织品痕迹。其中巴蜀图语铜印章多达36枚。

15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长360~500、宽130~190厘米,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骨骼腐蚀

十分严重,仅存骨骼痕迹,头向均为西北向,未见明显的葬具痕迹。15座墓都随葬有大量漆器和少量纺织品,由于保存条件极差,无法揭取。

这次发掘的每座墓葬的上层填土中均首先发现2个陶罐,分别置于墓葬头端一侧或两侧,旁有卵石一块,有的墓葬在墓底足端也出现卵石(如M10、M14、M20),这种在上层填土内的陶器及卵石,基本上都高于墓口,成为张滩墓群的一种标志,推测其或为当时封土的标志,与当时的葬俗有关。陶器、铜器等生活用品都放置于墓主人的头部以上,腰部及以下主要放置印章、料珠、铜饰品、铜带钩、铜剑、铜矛、环首铁刀等,随葬品处均放有大量细沙。绝大多数墓葬内随葬有其他骨骼,这可能与某种葬仪有关。

水富县张滩墓地分布面积大,墓葬随葬品丰富,从已发掘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陶器、铜器、兵器以及各种料饰均与四川涪陵小田溪、成都昭化宝轮院船棺葬出土物十分相似,具有十分浓厚的巴蜀文化因素,证实了巴蜀文化已深入到今云南水富境内。36枚巴蜀图语印章的出土,是研究并解读巴蜀图语的实物资料;根据出土的随葬器物分析,水富张滩墓地的年代约在西汉早期。(丁长芬)

(三) 昆明市天子庙贝丘遗址

天子庙贝丘遗址位于昆明市西山区碧鸡镇龙门村委会苏家村南面的天子庙西、南侧。现存面积约2000平方米左右。2002年,在进行高(晓)一海(口)高速公路建设的文物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中被发现。今年4~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地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遗址主要包含3个时期的堆积。从探方的地层堆积来看,主要有近现代、明清时期和早期堆积3部分。堆积最厚处距地表4米左右。在近现代地层堆积的下面,发现有“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以及明代吴三桂在云南时制作和使用的“利用通宝”等钱币,结合文献来看,这些堆积极有可能是清代在这里修建天子庙庙址时及其以后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堆积。早期堆积则是在遗址的下面地层中所形成的堆积,是该遗址的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本次发掘遗迹现象很少,除了晚期的火葬遗迹外,不发现有一些用火痕迹。因此,对该遗址的复原主要依靠地层及其中的包含物来进行。以2005XLT11为例:第①~⑤层为当代—近代堆积;⑥层应为清时期的堆积。在该层以下的地层中,含有大量的螺壳堆积。螺壳堆积比较厚。第⑦~⑩层为早期的堆积,根据各层的含土量以及包含其中的遗物,将其分为4

层。早期地层中发现的遗物主要为陶片、石器和铜器等。

天子庙遗址是目前发掘的位于滇池西岸、西山脚下的第一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清理发掘的唯一一个位于滇池盆地的石寨山文化(人们一般称为“滇文化”)的遗址,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将天子庙遗址的遗存的年代确定为青铜时代(大约为春秋战国至汉代),主要有以下依据:

1. 在遗址的地层中发现陶片共存的除了石斧、石镑和石质网坠以外,还有青铜鱼钩、铜锥和铜片等遗物,因此,将这些遗存确定为青铜时代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2. 在遗址的地层中,发现有几块玉器的残件,这些残件与石寨山和李家山等墓地的墓葬中发现的玉镯没有什么区别,主要为凸唇镯,同时,还在另外的探方中发现有珥珥,这些器物也与上述墓地的墓葬中发现的同类器物无论是质地还是加工工艺以及色彩方面均相似。

由于目前尚未对遗址进行整理,暂将该遗址的时代定为与石寨山文化同时的遗存,从地层中出土陶器的变化使人们感觉到这些遗存的一个渐变过程,结合分析其他探方中发现的遗物,为石寨山文化的编年提供了遗址方面的重要材料,同时也为该文化的分期以及文化现象的阐释提供了重要材料。但该遗址中陶器种类和纹饰以及陶色方面的显著区别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变化反映的是什么历史现象?对石寨山文化本身的研究以及该文化的起源与演变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蒋志龙 徐文德)

(四)巍山县发现一批古代青铜器

2005年8月底,云南省巍山县马鞍山乡三鹤村委会母古鲁村2位村民在被雨水冲塌的自家地块中发现铜器8件。巍山县文物管理所获悉后,及时赶赴文物出土地进行实地调查和清理,并依法将出土文物收归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母古鲁村位于巍山县马鞍山乡三鹤村委会北端,西面和北面紧靠紫金山,在村子的东面有一条自西北向东南流淌的深菁河,长年流水不断。文物出土地位于母古鲁村南约300米处的山坡上,这里山势陡峭,其地貌属岩溶地形区,海拔约2200米。

据发现者介绍,这批铜器是因近几天连降大雨,山地坍塌,在距地表2.3米处的土石层中发现,这批铜器出土时较为集中,而且保存较为完好。从周围的环境和被雨水冲刷的沟道断面上看,未发现其他遗物和遗迹,因此,我们推断应是窖藏文物。

窖藏出土铜器共8件,其中编钟2件,矛1件,剑1件,杯1件,牛1件,人物形杖头首1件。

1. 剑1件。剑长36厘米。为椭圆实心茎棱脊腊长形剑,茎面有螺旋纹,窄长身厚腊“山”字格剑。由下端往上两丛渐窄以致突锋锐尖。

2. 矛1件。为曲刃式铜矛,通长32.5厘米。身若琵琶状,釜口呈圆形(似鸭嘴形),贯通中脊,侧刃内凹位置在

矛身中部偏下,双耳位于骨骹上部两侧,骨骹端分叉,矛身中脊饰孔雀羽状纹和阴刻圆圈纹。

3. 编钟2件。通高28、宽12厘米。形状相同,大小一样。扁圆筒状,上圆封闭,半圆环钮,下端平口,共鸣箱为扁突体,舞面弧凸,腔上阔下微收,两铣由上至下稍向内倾,钟的正面、两侧及顶端有散音孔,正面饰双虎食人纹,下端1/5处饰弦纹二道,弦纹下为卷云纹。背面饰双鹤燕鸟纹,下端饰回纹。

4. 牛1件。高10、长13.5厘米。为站立状,神态自如,两角尖突,其中一只角微残,牛背脊和腹下有2条对称线(应是合范线)。

5. 杯2件。通高10、口径8、底径6.3厘米。杯为圆底圈足,形状相同,大小略有差异。杯的口部为直通状,口沿和腰部饰纹两道,在弦纹之间饰卷云纹。

6. 人物形杖头首1件。通高8厘米。为镀锡青铜人物形杖头首,呈站立状,中空。上身着方格纹薄衬,下着菱形回纹饰裙,颈挂饰物,两臂饰钏,手腕饰弦纹串饰,左手略抬紧贴胸,右手略抬至腹部,左腰际有2根编结形带饰,头部额前有流海。从像的背面看,头部均为编发。从整个人物的造型和衣着装饰上看应是一女性。

巍山马鞍山乡母古鲁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不仅有兵器、乐器和生活器皿,而且还有六畜中的牛和精美的人物形杖头首。这批青铜器中,不论是从形制上还是从纹饰上来看,均与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弥渡宜力、昌宁坎岭岗出土物相同和相类似,以上这些地方出土的器物都定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而巍山出土的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同样不会晚于战国中期。

巍山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中,螺旋纹柄山字形格剑、曲刃式矛、双虎(双鹤燕鸟)纹编钟和牛的文化面貌与滇西(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相同和相似,而镀锡青铜人物形杖头首则与滇池青铜文化更趋于接近,在同一地点出土二种类型的文化,说明巍山是滇池青铜文化与滇西青铜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地区。而这批青铜器物民族特色十分明显,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变化,应与氏羌系统的昆明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喜树 范斌)

(五)梁王山(包括上、下梁王山)-小平山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梁王山勘探面积60000多平方米,勘探结果表明梁王山不存在古代遗址或墓地,原来传说该地出土古代文物的说法不准确,这些文物可能来自梁王山附近的石寨山或左卫山。小平山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掘中首次发现“滇文化”房屋建筑遗迹并获得陶片、石器和青铜器等遗物100多件。调勘和发掘收获有助于我们对“滇文化”遗址的了解和研究。(肖明华)

(六)潞西尖山遗址发掘

该发掘是继龙陵大花石遗址后,对中国境内怒江流域进行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68平方米。清理半地

穴式房址5座,发现大量石料和石器半成品,出土石斧、石箭簇、石质网坠、石钺、石环等石器1300余件,陶片上万片,石器中,圆孔方形石盘、五瓣花形石饰品属云南首次发现。本次发掘为“云南边境考古”课题项目,为怒江流域以及面向东南亚的考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肖明华)

(七) 兰坪玉水坪遗址发掘

通过发掘,发现遗址表层为新石器文化层,其下为旧石器时代堆积,在旧石器时代堆积层中发掘出土打制石器、动物骨骼和牙齿化石标本500余件,标本年代至少可以溯到一万年,甚至更早。此次发掘是迄今为止怒江境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发掘,改变了我们对该遗址的传统认识,将当地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推前了6000年,并为研究澜沧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和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肖明华)

(八) 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考察研究

该工作与昆明动物研究所和美国加州科学院合作,内容包括野外考察和室内分析研究。在2005年的探险考察中,发现现生大熊猫骨架一具(时代为唐)。该发现为云南首次,为研究云南气候和环境演变提供重要的实物材料。

(肖明华)

(九) 会泽水城汉墓发掘

发掘面积3300平方米,通过发掘获得两个重要发现,其一是发现两种类型的汉代建筑遗迹,其二是发现了一具用木制小箱装盛骨灰的火葬遗存。建筑遗迹之一为生活居址,这一发现在云南属首次,对了解云南汉代建筑和研究水城古墓群具有重要意义。火葬遗存中出土一木制骨灰盒,这与以往火葬遗存出土陶制或瓷制骨灰罐的情形不同,属首次,而且骨灰盒位于火葬坑旁,说明其墓主人是在火化后就地挖坑埋葬的,对研究云南火葬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肖明华)

(十) 会泽东川土府城遗址第一阶段发掘

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清理出护城河遗迹两段和木桥桩遗迹一处,出土铜锭、钱币、网坠、建筑构件等遗物,为研究明代城池建造形式及滇东北社会历史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肖明华)

(十一) 大理羊苴咩城遗址发掘

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和本地窑釉陶、瓷片及外来青花瓷瓷片等,瓦片中近10000片带有字(此前统计的有字瓦数量还不到1000片)。此次发掘出土的大量遗物、遗迹,特别是较多的有字瓦,对研究羊苴咩城和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肖明华)

(十二) 大理太和城遗址发掘

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证实了太和城南北城墙尚存,摸清了其东段的基本走向。

(肖明华)

(十三) 昭通水富楼坝崖墓发掘

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崖墓4座,获得汉砖、陶俑等汉晋时期文化30多件。

(肖明华)

(十四) 鹤庆象眠山火葬墓地发掘

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清理墓葬2800多座,出土文物上万件。其中,火葬墓陶、瓷、铜类葬具约5000余件,土坑墓随葬品500余件,火葬墓随葬品铜镯、银镯等4000多件。是迄今为止大理州乃至云南境内发掘面积最大的火葬墓,为了解云南火葬习俗和当地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肖明华)

(十五) 景洪橄榄坝水电站调查

在水电站淹没区进行的调查勘探中发现一大型旧石器晚期露天遗址,该类型遗址在云南属首次发现。出土的打制石器系用锐棱砸击法打制而成。与贵州猫猫洞遗址出土者极为相似。

(肖明华)

十五. 浙江省

(一) 嵊州市小黄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2005年5-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发掘了小黄山遗址。小黄山遗址位于浙江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小黄山。此次发掘分A、B区。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揭示大量储藏坑等遗迹,出土石磨盘、磨石、夹砂红衣陶盆、罐等器物数百件和大量石料、陶片标本。

小黄山遗址A区,史前文化堆积上有厚2-3米的堆土,这些堆土系唐宋时期埋墓筑坟封土和后期竹园增土形成。史前文化堆积厚1-3米不等,文化内涵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三阶段为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第二阶段遗存系沟状堆积,堆积厚近3米,该阶段遗存在B区没有发现。第一阶段遗存主要是储藏坑等遗迹。

小黄山遗址B区,史前文化堆积厚1-2米,文化内涵

也可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三阶段遗存文化面貌、内涵特征同A区第一、三阶段,第二阶段堆积为A区所未见。整合A、B区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堆积的文化内涵,小黄山遗址史前文化堆积文化内涵分成四个阶段,第四阶段堆积为良渚文化晚期遗存。前三段遗存为小黄山遗址堆积的主体,文化内涵丰富,自身特征鲜明突出。

第一阶段以B区5、6层及相关遗迹单元为代表。发现大量可能用于储藏的深土坑,储藏坑多为方形或圆形,坑壁陡直规整,坑底平整,直径(边长)1米左右,B区H12直径1.9、深1米左右,容积近3立方米;部分储藏坑上口为长方形,下部圆形,坑底置放石磨盘;个别土坑口小底大略呈袋状;部分储藏坑存在类似台阶现象,可能为了存放取用上下方便。BH9、BH10、BH17储藏坑紧密相连并落在一

个更大的浅坑内,大坑套小坑。BH12 储藏坑周围发现分布比较有规则的柱坑类遗迹,分析推测储藏坑上当有简陋棚篷建筑覆盖。在 B 区 H12 下方还发现烧火遗迹,清理情况与一般的火塘、灶坑遗迹不同,既不是平面上的烧结面,也不是地灶的圆形火塘。烧火遗迹位于一浅沟(槽)内,保存较好的一处底部烧结面范围 30×25 厘米,靠下方(边缘)烧结面逐渐趋薄,烧结程度较差,靠上方烧结面陡直清晰,高约 12、厚近 2 厘米。结合第一阶段无一釜支架出土,陶釜数量不多,又很少发现烟灶等现象,推测所发现的烧火遗迹可能不是用于陶釜的炊煮,而很可能与烧烤有关。B 区 T1, 还发现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座,头向东,墓坑长 140、宽 60、深 20 厘米,头侧发现夹砂红陶平底罐、夹炭红衣陶圈足盆随葬陶器各一件,夹炭红衣陶圈足盆下发现一片残损腐蚀很严重的颅骨。A 区发现的建筑遗迹也很值得探讨,在东西向大灰沟北侧有宽 5 米阶地,阶地北侧是高近 1 米的陡直的生土台,紧贴生土台挖有深约 15、宽 30 厘米上下的排水沟,阶地、沟内和生土台上都发现圆形柱坑,柱坑沿沟排列有序,揭示的柱坑显示当时临沟有一排长 25 米以上的以生土为后墙的“半地穴”建筑。

由于酸性土壤的埋藏环境条件,出土遗物陶器、石器大宗,有机质遗物发现很少。陶器中夹砂红衣陶占绝大多数,夹砂颗粒比较均匀,磨圆度高,应系直接来自河漫滩的河沙。陶器胎壁粗厚,制作原始。平底器、圈足器为主,圈底器不多,不见三足器。器种单调,盆、盘、钵、罐、釜为基本陶器群,盆、盘、钵数量多,形态丰富。绝大部分陶器素面红衣,少量陶器口沿部刻划网格纹,绳纹少见。陶器口沿、肩部流行把手(鬲)或系。夹砂红陶敞口平底盆形态特征和距今万年左右的浦江上山遗址出土夹炭红衣陶平底敞口盆十分相似。石磨石、石磨盘出土数量最多,石磨石形态丰富,玄武岩质地的饼型(块状)最具特色,磨石质地粗细差别明显,磨石一般 1~2 个磨面,不少磨石有三个磨面;而硅质岩质地的长方形磨石一般为正反二个磨面,两端常有锤击形成的崩疤;还有一类杵状磨石。燧石质石锤数量不少。石磨盘玄武岩质居多,玄武岩质地者完整的很少,多为长期磨损碎裂或因锤击断裂的残件;非玄武岩质地的石磨盘多完整,最为完整的一件石磨盘重 30 公斤。不同形态的磨石、石锤与石磨盘配合使用,脱落、研磨、锤击加工不同的坚果、块茎植物或砸击水生动物取食其肉、敲击动物骨骼吸食骨髓。磨制石器数量不多,岩性以凝灰岩、硅质泥岩居多,截面椭圆形的石斧多见,通体磨制,残损严重。穿孔石器及便于捆绑的石球也很具特色,尚不知其确切的用途。第 6 文化层还出土石雕人首一件,高 7.6 厘米,利用玄武岩质砾石运用钻、刻、掏挖等工艺成形,形象传神。

第二阶段 堆积主要分布在 B 区,以 B 区 4 层堆积为典型考古单元。与第一阶段相比较,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并有所变化,发展演变轨迹明确,脉络清晰。变化主要表现在陶器方面,夹砂灰陶数量明显增加,陶器胎壁趋薄。器类上平底器、圈足器常见,圈底器数量增加,三足器不见。除盆、

盘、钵、罐、釜等第一阶段陶器外,新出现敛口钵、双腹豆、夹砂灰陶折肩卵腹绳纹釜、甑等新因素,新出现陶器的形态特征,交错拍印绳纹、镂孔放射线和红底白彩的装饰风格等与萧山跨湖桥类型文化同类陶器十分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从陶器成型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更为古老的文化特征。两者间应存在某种传承发展关系。

第三阶段 堆积仅在 A 区发现。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石器变化不是很大,地层中出土大量采自河漫滩的砾石料,许多砾石上边缘留有使用类似刀部的痕迹,据分析大部分应该是信手拿来使用随意抛弃的,部分可能是特意加工的具有明确刀部的砾石器。陶器中夹砂灰陶为主,少量夹炭陶。夹炭红衣陶红色艳丽,夹炭黑陶黑色乌黑纯正。圈底器、平底器、圈足器常见,不见三足器。夹砂灰陶圈底釜、双鼻与口部齐平的平底罐、平底盆、平底盘、钵和小杯常见。陶盆形态趋小,陶釜、陶罐器形明显变大,釜上绳纹流行;平底盘手捏成型,工艺原始,外壁残存制作陶器时草刮痕迹。

小黄山遗址三个阶段遗存地层叠压关系清楚明确,文化面貌丰富,文化内涵早晚传承演变轨迹清楚,阶段性特征明确,系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自身特征鲜明突出。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型学的排比研究,第一阶段文化内涵与浦江上山遗址相近。第二阶段遗存文化内涵中存在不少萧山跨湖桥文化因素,文化面貌总体上较跨湖桥更为原始和古老。第三阶段遗存和跨湖桥文化也有相当多的可比性;绳纹圈底釜、双鼻平底罐与河姆渡文化同类陶器也有某些雷同之处。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对第三阶段的 A 区 H1 出土夹炭陶标本的¹⁴C 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 6820~前 6680 年, A 区 5 层木炭树轮校正年代为前 6020~前 5985 年。据此第三阶段年代距今 8000~前 8800 年,第一、二阶段年代尚没有测定数据,比照浦江上山遗址,推断小黄山类型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距今 8000~10000 年上下。

由于酸性土壤的埋藏保存环境,小黄山遗址发掘有机质文物发现很少,对研究小黄山先民生业形态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小黄山遗址大量储藏坑的发现,丰富的石磨盘、磨石的出土,据 B 区坳毛蓬发掘点牛骨等动植物遗存的发现推断:小黄山先民已进入定居生活阶段,采集、狩猎是小黄山先民主要食物来源,生业形态适应依山傍水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A 区地层中稻属植物硅酸体的大量发现表明小黄山先民已经栽培或利用水稻。

跨湖桥遗址、浦江上山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浙江省新石器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小黄山遗址发掘,则揭示和确立了上山类型阶段遗存和跨湖桥文化阶段遗存地层上的叠压关系,将年代差距 2000 年、文化内涵难以比较联系的二个古老文化有机联系起来,“盘活”了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格局,将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浙江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源流及其发展演变提供了可

靠地层学依据、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全新的平台。水稻遗存的发现,对农业起源特别是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小黄山遗址发掘,第一阶段夹砂红衣陶多角沿盆等陶器形态上与河姆渡文化早期多角沿盆很相似,第三阶段最具特征的双鼻罐、平底盘也与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双鼻罐、平底盘具有某种传承发展的内在联系。据此推断小黄山类型文化遗存是河姆渡文化重要的来源之一。

小黄山遗址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存保存之完好,储藏坑发现之多,石磨盘、石磨石出土数量之丰富为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所罕见。6层出土的石雕人首距今年代在9000年上下,应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雕人首,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小黄山遗址是曹娥江流域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曹娥江流域乃至浙江省及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研究的重大突破。小黄山遗址发掘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去向这一困扰考古界多年的重大学术问题的重新讨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崭新的资料。

该遗址考古发掘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张恒 王海明 杨卫)

(二)长兴县江家山遗址

江家山遗址位于浙江省长兴县林城镇西北约2、东距县治雒城镇约15公里。2004年4月~2005年1月,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二期工程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家山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掘面积近2700平方米,主要清理了马家浜文化河沟2条,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墓葬共220座;崧泽文化房址3座,红烧土堆积7处;崧泽、良渚和马桥文化灰坑18个。主要收获如下:

马家浜文化 晚期阶段遗存主要有沟(G3、G4)和墓葬。G3、G4宽约15~20、深约2米(沟内马家浜文化堆积约1、崧泽文化堆积约1米),分别位于发掘区的东、西端。G3呈东北—西南走向,G4呈东南—西北走向,因暂时未能完全揭露,并不排除它们本是一体的可能。G3、G4出土遗物较丰富,陶器以外红里黑喇叭形圈足豆、平底釜和泥质红陶带管流的平底盂为主;兽骨种类有象、牛、猪、狗、鹿和禽类等;完整的木耜、木质漆柄更为同类遗存所罕见。此外还出土了大型的木构件、磨制精良的骨器和较多的植物遗存。多数遗物出于河沟的南岸边。

墓葬46座,多数位于G3的东南岸上,有些墓葬设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目前仅知土台堆筑在生土面上,东西宽约25、厚约45厘米。土台的土色为黄褐色,与生土较相似,也许与沟的形成有关。一些墓葬的排列方向与G3的走向一致,有些墓葬就埋葬在沟岸旁。出土随葬品54件,其中陶器32件,以釜、鼎、豆和纺轮为主;石器19件,以锛、纺轮和砺石为主;玉器3件,为璜、玦。仅出土1件随葬品的多为石锛或纺轮;14座墓葬无随葬品。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以朝南为主。面向朝西或东,数量大致相

等,少数朝上或朝下。葬式主要有略侧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直肢葬、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等多种形式。少数墓葬在开口面上放置石块和砺石为标记。略侧身直肢葬和仰身直肢葬时,手多放置在骨盆上,手中或手旁多放置小陶釜、锛或纺轮。略侧身直肢葬时,躯干的某一侧多倚靠在坑壁上。随葬的陶器常会被打碎后散乱地放置在墓坑中。

崧泽文化 遗存主要有墓葬和居住址。墓葬173座,可分为早、晚期。随葬品377件,其中陶器227件,石器126件,玉器14件。无随葬品的墓葬52座。陶器组合主要为鼎、豆、罐、壶和纺轮,其中纺轮30件;石器中钺12件,锛69件,多孔石刀2件,大型网坠5件,纺轮22件,砺石7件,以锛和纺轮为主;玉器中璜2件,玦6件,余为坠饰。

墓葬多埋设在堆筑的土台上,这样的土台有4处,有的土台叠压在G4上,由此可知在崧泽文化阶段河沟已废弃。早期墓葬延续了本遗址马家浜文化墓葬的各种特点。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以朝南为主。面向或西或东,少数朝上或朝下。葬式主要有略侧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直肢葬、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多种形式。此外还有一座异穴合葬墓和一座多人合葬墓。异穴合葬墓中2人均成年,女性下葬较男性晚,并打破了其墓坑,但未破坏骨架;男性在东、仰身直肢葬,双手叠置骨盆上,随葬石锛一件放置在右手旁;女性人骨架倚靠在男性骨架西侧,侧身直肢葬,无随葬品。多人合葬墓墓坑近长方形,在墓坑底部散乱地放置些许人骨,4个较完整的人头骨距墓底有些空间,随葬一件陶鼎,或为家族的集中二次葬,或为因战争而死的合葬。

晚期阶段的时候人们曾对遗址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平整,在发掘区域内从东到西几乎都有一层红烧土的铺垫层,厚度约20~30厘米。晚期阶段的土台在筑高的同时还向南进行了拓展。墓室结构依旧,头向皆朝南,葬式也由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早期的多样性变得较为简单,主要有仰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和二次葬等,而随葬品数量明显增多,平均每墓约5件。

崧泽文化晚期阶段房址遗迹3处,有的柱坑打破了墓葬。F2平面呈长方形,未见基槽和墙,房址四周柱坑排列分布,中间一排柱坑将房子分隔为南、北间。有的柱坑底部平置砺石或堆放红烧土块为基础。

崧泽文化地层和墓葬中出土了14件形制较大的石网坠,其中墓葬出土5件,地层9件。推测当时、当时有较大的河流或水域的存在,是否和G3、G4有关还需确认。

人骨经鉴定,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石锛的皆为男性;随葬纺轮的绝大多数为女性;墓葬出土石锛83件,纺轮60件;地层出土石锛121件,纺轮23件。

良渚文化早期墓葬1座、灰坑1个和马桥文化灰坑5个。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小,堆积也较薄。而马桥文化层中包含了早期遗存各阶段的许多陶片,这应该是其对遗址扰动的结果。

江家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保存较为完好的人骨架,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和埋葬习俗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楼航 梁奕建 华山 童善平)

(三)遂昌好川墓地史前平民墓区

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遂昌境内的好川文化遗址的专题调查勘探,历时半年结束,取得重要收获。

本次好川文化遗址专题考古调查勘探的最大收获是在岭头岗的东北坡地发现好川墓地的平民墓区。在岭头岗的东北坡3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发现好川文化小型墓葬20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墓坑,墓坑长不足2米、宽1.5米上下,墓坑几成方形,深1米左右。墓向绝大多数为东偏南的120°左右,仅3座墓葬墓向系北偏东的30°上下。随葬品很少,20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品60件,墓均3件。其中陶器50件,器形主要有豆、壶、罐、三足盘、圈足盘、杯、钵等,石器10件,出自5座墓葬,其中石镞7件、石锛3件。无一玉器发现。大部分墓葬仅1、2件陶器,陶豆常见。3座墓向北偏东的墓葬均无随葬品。

这20座小型墓葬与1997年发掘的80座墓葬间隔约20~30米。两者比较,墓葬形制相同,墓坑几成方形,墓坑的长、宽比均为3:2;墓向一致,东南向居多;随葬品豆的数量最多,豆、壶、三足盘、杯、罐等随葬陶器形态雷同,随葬陶器组合、形制变化趋势相同,延续时间在好川墓地五期的区划内,毫无疑问,它们同属好川文化,是好川墓地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完整的好川墓地。

岭头岗中心和边缘的2个墓区不是地理概念上简单的一南一北,墓区间20~30米的间隔也不是预留的尚未埋墓的空间,而是刻意规划营造的不同社会地位阶层无法逾越的鸿沟;墓区高程5米上下的落差,也不是地形意义上的一上一下,而是墓主人生前社会身份地位等级的天壤之别。显然,拥有巨大墓坑和众多随葬品的墓主人是社会上层贵族,而埋于山坡边缘的有极少随葬品的小墓只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阶层。

岭头岗边缘地考古勘探,20座小墓的发现,大大丰富和加深了对好川墓地的了解和对好川文化的认识。好川墓地贵族、平民墓区的发现与揭示,为深入研究好川文化、全面深刻认识和把握好川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又一批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史前社会贫富分化、阶级产生、国家形成的过程、机制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个案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谢文君 王海明 扬卫)

(四)湖州市塔地遗址

2004年3月~2005年1月,为配合农村土地平整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州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湖州市千金镇塔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已发掘面积近35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时期的墓葬58座,马家浜、崧泽、良渚、马桥各时期的灰坑130个,良渚早

期房址1座,出土陶、石、玉、骨、木、象牙器等文物800余件。

马家浜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与墓葬。灰坑平面多呈不规则形,多数为堆置生活废弃物的垃圾坑,出土有腰沿釜、鼎、牛鼻耳罐、甑、豆、侧把盂等遗物。墓葬22座,呈排列有序的四排,集中分布在发掘区的西北部。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狭长,填土分为黑褐色和黄褐色二种,从打破关系看,填黄褐色土的墓葬在入埋时间上早于填黑褐色的。墓内人骨大多保存较好,头向均朝北,但葬式有俯身直肢、侧身直肢、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等多种,面向多数朝西。多数墓葬无随葬品,6座墓葬出土了包括玉块、玉管、象牙椎发器、骨管串、骨匕、纺轮等在内的随葬品。

崧泽文化遗存仅见少量墓葬与灰坑。灰坑3座,平面近圆形,斜壁,除垃圾坑外,还有储藏坑。H100为崧泽早期灰坑,除出土的瓦棱鼎足具有典型崧泽风格外,腰沿釜、牛鼻耳罐、圆锥形双目式鼎足等陶片都具有鲜明的马家浜文化风格。H48为崧泽晚期灰坑,近底部出土摆放在一起的7件完整陶杯和一把石犁,应是专门用于储藏生活与生活用具的储藏坑。墓葬2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灰黄色土。人骨保存一般,仰身直肢葬,头向南。其中M35中部被马桥灰坑H45打破,盆、豆、壶、杯、鼎、骨镞等7件随葬品分置于人骨的头前脚后。从随葬品形制来看,2座墓葬均属崧泽晚期,其中M35内出土的假腹杯是太湖西南湖州地区该时期的特色,也是目前所见此类杯分布的最东限。

良渚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发掘区内一南一北的二条河沟内及其两侧。二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河沟上部宽约10米、最深处约2米,南北对应,但中间有近10米互不贯通的间隔。这二条河沟最迟在崧泽晚期已经出现,最初很可能是为解决聚落内部用水问题特意开挖的引水沟,其间的间隔是供人进出的通道。良渚早期的遗迹有沿河沟两侧布局的迹象,墓葬埋设在河沟南北两侧近河沟的近处,墓葬再外侧为居住址。房屋基址F1位于南段河沟北侧10余米处,柱洞保存相对完好,东、西面墙体为单排柱,在西北角墙体外有由7个小柱洞形成的封闭式近圆形附属建筑,南面墙体因后世破坏情况不明。良渚早期墓葬布局清楚,保存较好,位于房屋基址与河沟间的空隙地带,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南,出土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器类有鼎、豆、壶、圈足盘等,其中的粗泥陶甬形足鼎、卵腹杯等都保留着鲜明的崧泽风格,少数墓葬中也出有石钺与小件玉器,但未发现显贵者墓葬。良渚中晚期墓葬受马桥时期的扰动严重,但从2件残碎玉璧等出土物分析,良渚中晚期的塔地聚落应较早期有更大的发展。

从出土物来看,河沟是经良渚晚期至马桥时期的长期垃圾倾倒而淤平的,其中更以良渚晚期的堆积为主。河沟内的多个良渚堆积层内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石器、陶器及各类有机质物品,有机质物品主要出土在良渚时期的淤泥层中,灵芝、外套竹编的葫芦器等都填补了良渚考古的空白。

马桥文化遗存在发掘区内分布最广,除堆积较厚的地层外,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灰坑,其中尤以井状坑最具特色。井状坑平面对称、方二种,坑壁都较陡直,现保存深度大多在150厘米以上,少数坑内出有完整的印纹硬陶凹圆底罐,个别还出土了多件器物。H92内出土的9件器物分上、中、下3个层面,显示出延续使用和堆积的迹象。

湖州塔地遗址是目前太湖西南地区内所发现的史前文化序列保存较完整的少数遗址之一,对该地区史前文化演进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而与花厅、好川文化形制相近的多种器类的发现,首次将花厅、良渚与好川连结起来,对探讨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及其与大汶口文化、好川文化的关系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

(塔地考古队)

(五) 桐乡市姚家山良渚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

姚家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南星桥组。遗址中心原为一个西北—东南向分布的长方形土台,其南部有河道近东西向流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桐乡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4年11月~2005年1月,对遗址进行扩大发掘。揭露面积前后共130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1处,清理良渚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7座,祭祀坑21个。出土陶、玉、石、牙骨器等珍贵文物260余件(组)。

发掘和钻探表明,遗址的最下层生土为平坦的沼泽相沉积,内含丰富的木头、芦苇等植物和蚌类、田螺等动物遗存。其上有一层堆积土,土质细软,包含较多的动植物和崧泽—良渚文化过渡时期的遗物,应属某种水相沉积的遗存。该层上部有一层黑灰色土,是大量植物在短期内炭化形成。其上为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呈长方形覆斗状,西北—东南向分布,现存高3.5、顶面宽约23米左右。长度因东西部遭破坏不详,据钻探,推测当在60米以上。由剖面观察,土台下部堆筑黄黑色湖沼相沉积土,土质纯净致密,不含陶片,当是取自水面以下的淤土。联系到土台南侧现存的小河道,或与当时的取土活动有关。上部堆土为纯净的黄褐斑土,可能来源于濒水位置的生土。土台营筑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在堆积相上表现为三期堆土层间夹有2层较薄的黑灰土,含有陶片和有机物,说明营建的过程中有短暂间断。

土台面上发现良渚文化贵族墓葬7座、与墓葬相关的祭祀坑21个。墓葬分布于土台中部,分南北2排东西向依次排列。M1、M5为北排,M4、M2、M3、M7、M6构成南排。墓皆开口于表土下,打破土台顶面,墓向190°~205°之间,大体垂直于土台的走向。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坑长317~435、宽130~200厘米。墓内大多发现棺槨痕迹。墓葬中人骨已朽,部分可见残痕,显示墓主头向朝南。墓葬内出土大量玉、石、陶、牙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玉石器占大多数,除有三叉形器、钺、梳背、璧、镯、锥形饰、玉串饰、柱形器等良渚文化大墓中常见的器形外,还发现2件玉刀(“耘田器”),其中一件的顶部有冠状凸起。另外还出土5

把玉镰。这两类玉器是在正式考古发掘中的首次发现。石器器形主要为厚体石钺,也有少量石镰、石镞等。M3一墓中就出土各类大小不一的石钺25件,其中一件厚体石钺上发现刻划图案,颇为罕见。以往良渚文化大墓中极难保存的牙骨器在这批墓葬中保存相对较好,M2中出土了刻有简化兽面纹的象牙器,M3玉梳的象牙梳齿亦清晰可辨。墓葬的陶器数量较少,组合为带甗鼎、豆(或簋)、罐、盆,另有尊、双鼻壶等。其中M2的一件黑皮陶器盖上刻划数组鸟纹与龙蛇纹的精致图案。由陶鼎看,北排2墓随葬大敞口凹足鼎,形制独特,在以往发掘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少见,南排墓则多随葬鱼鳍足鼎。总体而言,这批墓葬大体属于良渚文化的中晚期,各墓的年代有早晚。

墓葬周围和土台的西部发现21个长方形的土坑,皆与墓葬开口于同一层。这些坑皆与土台走向平行而与墓葬保持垂直,长100~180、宽50~80、深35~100厘米。边壁陡直,平底或浅圆底,坑内填土纯净,基本不见包含物,少部分底部有黄白色细淤土面,显示坑内可能有过空间。分析这些坑是与高台墓地或墓葬相关的祭祀坑。祭祀坑的分布似乎有一定规律,有的墓葬周围分布有多个,有的墓周围则没有。未发现墓葬打破祭祀坑的现象,而祭祀坑打破墓葬现象则有数例,甚至有的打断了墓底的棺槨线的痕迹,但没有发现坑打破墓葬中心位置的现象,说明一部分坑应与特定墓葬存在对应关系,开挖该祭坑举行某种祭祀活动的时间与墓葬的埋设时间存在一定的间隔,推测可能是封土等地面标志模糊后无法确认墓葬的精确位置,使祭祀坑打入葬具位置。另外一些坑则可能与整个墓地相关。

姚家山是浙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最高级别的良渚文化墓地。桐乡、海宁一带是除余杭良渚遗址群外良渚文化遗址的另一个密集分布区域,姚家山的发掘可谓该地区众多良渚文化发现中的点睛之笔。本次发掘为研究和探索良渚文化的区域类型、丧葬习俗、高土台的营建目的与过程,祭祀坑与墓葬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资料。

(王宁远 周伟民 朱宏中)

(六) 安吉县大型战国时期越国墓葬

2004年11月~2005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吉县博物馆,对安吉龙山土墩墓群中由于窑厂取土破坏比较严重的141号土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虽已遭现代严重盗掘,遗留的随葬品寥寥无几,但仍出土了龙形玉佩、玉环、玉扳指等重要文物,特别是墓葬封土外发现陪葬器物坑一处,共出土100多件陶瓷器,对认识越国大墓的葬制具有重要意义。

墓葬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龙山东麓,按调查资料编号为龙D141。发掘前地面上保存有高大的封土,封土墩长径50、短径40米左右,高达8米。墓葬为有甬道的长方形土坑木槨墓,从西朝东,墓坑完全开口在生土面上。规模巨大,长17.5、宽7.5、深1~1.5米,坑壁陡直,壁上可见清晰的工具加工痕迹,底部十分平整。墓内木槨早已腐朽,坑底留有2条垫置木槨的纵向枕木构。从腐朽后留下的痕迹和

发现的一些树皮分析,可知当时木椁的形制为横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斜坡状,木椁外包裹有树皮。墓坑底部统一铺垫有一层5厘米左右厚的细木炭,椁外紧贴木椁的四周镇筑白膏泥,其外为五花土。

甬道设在墓坑东头正中,挖入地下很浅,底部略向坑内倾斜,宽3.4~3.6、深0~0.4米。甬道正中挖有一条排水沟,沟底铺叠有好几层直径在10~20厘米左右的块石,用于向外沥水。甬道两边底面上各留有一排密集的柱洞,并一直通向坑内与木椁相连。有的柱洞内还留有木头腐朽痕迹,表明当时在木椁的前面还建有木结构的甬道,而从柱洞均向内倾的迹象可以判定,木结构甬道的形制也是横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斜坡状,与木椁形制一致。

墓内遭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2件龙形玉佩、2件玉环、1件玉扳指等玉质文物。其中1件龙形玉佩不但雕琢十分精细,造型极其优美,而且体形较大,长9、宽8厘米,堪称玉器中的精品。其他出土物还有一些陶璧、陶瓿、陶纺轮和多达76件的陶质羊角与牛角形器,另外还发现2件漆木甲腐朽后留下的漆皮痕迹。

此墓发掘的重要发现是在墓葬的北面封土外10.5米处,经过主动寻找发现陪葬器物坑一处,坑长11、宽3、残深0.3米左右,方向与墓葬完全一致。当时巨大的坑内全部摆满陶瓷器,惜因地表太浅,大部分已被扰乱破坏,残存陶瓷器物达150多件,估计原先数量在500件以上。出土的陶瓷器物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的大型盛储器和小型饮食器皿,器类有印纹硬陶的瓮、坛和麻布纹小罐,原始瓷的兽面纹小鼎、盂、杯、盅、豆和器盖,另外还有一些仿青铜器的原始瓷与硬陶的铃、硬陶鉴等陶瓷礼乐器。

根据出土器物 and 墓葬的规模可以判定是一座战国早期的越国大墓,大体形龙形玉佩和2件漆木甲的存在,不但表明墓主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而且说明墓主人应是一位统领军队的男性首领。

墓葬内木椁和甬道虽已腐朽,但根据留下的迹象观察,可知其形制为横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斜坡状,而且椁外也包裹有树皮,这与前几年发现的绍兴印山越王陵的木椁和甬道形制是一致的。这是继印山越王陵之后能明确判定为长方形两面坡状木椁的第一个重要墓例,它对研究认识越国上层高级贵族大墓的墓室形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资料。或许可认为,横截面呈三角形的长方形两面坡状木椁,是越国王陵、王室墓和其他高级贵族大墓所普遍采用的独有形制。

作为大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墓葬封土外陪葬器物坑的发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与收获。墓外专门设陪葬器物坑,或许可作为越国大墓一项具有规律性葬制葬俗来认识,它的发现不但对认识越国大墓葬制葬俗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开阔了越国大墓的认识视野,对今后的工作也颇具启发性和指导性。

墓内大量陶质角状器的出土,对于认识此类器物的真正用途颇具启发性。本次墓葬中经盗掘破坏后仍留下76

件这类角状器,如此大量的角状器基本堆积在一起,没有其他的共存器物,而且从其质地、大小和形状区分,可分为羊角形和牛角形二种,羊角形为硬陶质地,体形较小,喇叭状的底边多施有戳孔和刻划纹饰,牛角形为泥质陶质地,体形高大。如果作为支座用途,那么多的支座随葬在如此高规格的大墓内,实在很难理解,也解释不通,而且按其形状实际上也很难支撑器物。因此,这座大墓中如此之多角状器的出土,启发了对此类器物真实用途的深层思考,现在可以认为,它们并非是支座,而应该实际代表着羊角与牛角,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这也是这座大墓发掘所带来的重要收获。

大墓所在位置与现存于龙山北麓的一座春秋战国时期古城遗址仅一山之隔、约2公里之遥,墓葬与城址具有内在关系的必然性。

(陈元甫 黄吴德 邱宏亮 程亦胜)

(七)湖州市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

为配合申嘉湖杭高速公路建设,2005年3~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州博物馆联合对钱山漾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钱山漾遗址位于湖州市东南约7公里,钱山漾的东南部,处于西部莫干山余脉的低山丘陵向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遗址西侧有东苕溪自南向北流经。往北约15公里是太湖。

本次发掘地点位于1956年和1958年2次发掘区域以南约350米处。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揭露一处经先民们反复营建居住形成的土台型遗址,土台东北部、北部、西北部被宋代灰沟扰乱。残存土台大致呈东西向的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60、南北宽约50米。

根据野外发掘对地层堆积的判断,土台的营建和使用主要经过了4个阶段。土台上部最晚阶段即该遗址的晚期遗存是一处属于马桥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而土台的前3个阶段即该遗址的早期遗存则可能是太湖地区一支崭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

本次发掘共出土陶、石、玉、骨、木等各类器物700余件,同时也获得较多珍贵的动植物遗存,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收获如下:

1. 发现一处马桥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清理遗迹包括房基2座、排水沟3条、灰坑149座、水井6口、灰沟8条。编号为F1、F2的房基分别由23个和9个柱坑(洞)组成,基本呈正南北向东西相邻。在F1西侧靠北处另发现18个直径15~25厘米的柱洞。根据柱坑(洞)的排列情况,初步推测F1、F2为干栏式建筑。在F1、F2的东侧和东南侧发现3条大致呈东西向的沟状堆积,应是F1、F2的排水设施。灰坑分布较密集,灰坑的大小、形状和堆积情况也区别明显,这些灰坑应有不同的用途或功能。水井一般呈平面圆形或圆角方形,深度在150~245厘米不等,以土坑井为主,在编号为H100的水井中发现残存高度约185厘米的圆筒形木质井壁,系将圆木纵向分开后剝空再合围拼接而成。

出土的马桥文化时期遗物种类有陶、石、玉、绿松石

等。以陶器最丰富,器形有鼎、甗、豆、罐、盆、觚、三足盘、簋、袋足盂、杯、鸭形壶、碗、瓦足盘、甑、平底尊、碟、器盖、陶垫、陶拍等,在一件泥质灰陶大型圈足把残器中部发现压印有一周规整精美的鱼鸟纹图案。石器种类有镑、斧、镞、犁、半月形刀、镰、斜把刀等。此外还在灰坑中出土了绿松石珠和玉镑各一件。

2.钱山漾遗址长方形土台的主体堆积属于该遗址的早期遗存。3次营建的规模由小渐大,每一次营建后的台面都发现有建筑遗迹,表明该土台营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居住。

本次发掘共清理该早期遗存不同阶段房基5座、灰坑17座、墓葬1座、器物组3组、灰沟2条。编号为F4-F7的房基都是由柱洞(坑)构成,柱洞数量不一;但基本上都呈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长方形,从柱洞(坑)的排列和野外的迹象判断,也应是干栏式建筑。M1为规整的东西向长方形土坑,土坑长190、宽35、深12厘米,在土坑的东部、中西部和西部分别出土足跟有椭圆形凹窝的侧扁足鼎、泥质黑皮陶平底罐和泥质黑陶敛口平底钵,疑是墓葬,但没有发现骨架痕迹。器物组是指在营建的红烧土层面上发现的相对集中的一组器物,3组器物各出土10、30和9件器物,以石器最多,骨器和陶器次之。

出土的钱山漾早期遗存种类有陶、石、骨、木、玉器等。根据残片可辨和修复的陶器种类有足外侧呈弧形轮廓的大鱼鳍形足鼎、足跟内侧有凹窝的侧扁足鼎、圆锥足鼎、截面椭圆、足跟上端有捺窝的矮足鼎、高把浅盘豆、圈足盘、大盘、大口小平底瓮、大口尖底夹砂缸、袋足鬲、罐、平底钵、高领尊、斜腹碗、条纹杯、器盖、纺轮等。石器有各式刀、镑、镞、凿、犁、砺石等。此外还出土玉凿、玉锥形器和骨镞、木器等。

钱山漾遗址早期遗存是一种目前在太湖地区还处于探索和认识阶段的崭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文化面貌上,该早期遗存中虽然可见到很多受龙山文化影响的因素,如陶器装饰纹饰中的绳纹、被横向弦纹割断的间断绳纹、篮纹和方格纹,陶器器形中如器形高大、器身遍饰间断绳纹的小平底瓮、条纹杯等,但以足外侧呈夸张的弧形轮廓的大鱼鳍形足鼎、足跟内侧有凹窝的侧扁足鼎、高把浅盘豆、圈足盘等陶器为代表的具有自身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面貌更加突出。这些陶器有些明显由良渚文化同类器演变而来,但形态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化。有些还需进一步分析其渊源。而典型良渚文化因素如鱼鳍形足鼎或T字足鼎、双鼻壶、竹节把豆、贯耳壶、宽把杯等在这里都不见,表明它与良渚文化已有明显区别。从钱山漾遗址早期遗存土台的3个形成阶段,结合出土器物分析,该早期遗存本身也有明确的早晚发展演变过程,应可进一步分期。为行文和研究方便,拟将它称为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近年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发现的“广富林遗存”约相当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晚期阶段。

关于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年代,初步认为其相对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当,在太湖地区文化序列中可

能晚于良渚文化或与良渚文化末期略有重叠,而早于马桥文化。

3.发现一处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时期、占地面积达290平方米、一栋8室的大型套间式地面建筑基址(编号F3)。F3主要由墙槽、隔墙和柱洞构成。墙槽共8条,由4条大致呈东西向和4条大致呈南北向的墙槽将F3平面分隔出6个长方形单元(室),其中又用2条东西向小隔墙将西侧大间分为南北3室,这样形成面阔3间、进深也有2~3间的东西向、三开间8室的建筑形式;建筑面积达260平方米。大室室内面积约19~22平方米(以墙槽内侧计),小室室内面积约10~13平方米。墙槽宽60~160、深约35~45厘米,其中外围一周墙槽较内侧的略宽。墙槽内填红烧土或夹红烧土的黄褐土,土质结实,应经特别加工。小隔墙较窄,宽10~15厘米,其中一条可见比较明显的密集的木骨痕迹。在F3中室一带发现一组由南北3~4个柱洞为列、东西成排分布的柱洞,较有规律,在墙槽内也发现部分柱洞,但数量较少。P3室内土质均为纯净的黄褐土,与室外土台土质区别明显,黄褐土被F3墙槽打破,推测这种黄褐土是F3挖槽营建前特意铺垫而成。F3的大门在东南侧,同时室与室之间也发现有3处通道或门道,西北角小室平面发现呈圆角方形、面积约2.3平方米的红烧土烧结面,应是F3灶址。另外在F3正南部还发现了49个柱洞,其中靠近F3南墙槽附近分布最密集,这些柱洞总体围成一处东西向、面积约30平方米的长方形建筑,应是F3的附属建筑。没有发现F3墙体和室内活动留下的其他遗迹,可能已被晚期平整破坏。F3这样一栋、8室的多开间套间式建筑基址在太湖地区乃至国内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

4.发掘工地与科技考古手段密切配合,发现了较多能反映古地理、古环境和先民们经济生活状态的珍贵的有机质遗物和遗存。对灰坑内填土进行浮选和陶洗中,发现了马桥文化时期大量炭化米和菱、芡实、甜瓜子、桃、梅等植物果实或种子,在H108中第一次发现了马桥文化时期丝带。在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时期青灰泥层中出土了麻葛类编织物和较多竹编物。此外,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动物骨骼。

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清理的大型马桥文化时期聚落和出土的遗物,大大丰富了马桥文化内涵,为推动和深化马桥文化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发现为重新审视太湖地区古文化发展序列、研究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研究方向,也为探索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提出了新课题。(丁品 郑云飞 程厚敏 潘林荣 郭勇)

(八) 东阳周代土墩墓

2005年6月~8月,为配合诸永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东阳市博物馆联合对位于高速公路东阳服务区的古代遗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除清理了汉代窑址和晋代墓葬各一座及若干明清墓葬外,主要是对5座周代土墩墓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发现5座墓大致可分二个类型,第一类是墓葬形制较大,出土器物较多,一般均位于丘陵的最顶部,如D1M2、D2M1。

D1M2土墩长16.2、宽10.2、高0.8米,其营建过程是先将原砂质基岩山体略作平整。局部垫以褐土,使墓坑形状成圆角长方形。墓坑残长10、宽3.2、残深0.45米,坑壁成斜弧状。墓坑底部大部分地方铺有卵石,距墓坑约70厘米各有一道宽约10、深约5厘米的浅槽,似作排水用。D1M2共出土100余件珍贵文物,器类较为丰富,包括瓷器、陶器、玉器和铜饰。器物以原始瓷为大宗,有鼎、罐、碗、盘、盂、盅、豆等,装饰戳印纹和S形堆纹等,许多器物的底部还刻有一些符号。墓中还出土了罐、盆、尊、簋等印纹陶器以及玉串饰、铜饰和陶纺轮。

D2M1土墩长15、宽5.5米,现封土中心高度为0.38米,平面略呈椭圆形。D2M1也是将高低不平的原生基岩表面略作平整,斜壁的土坑作为墓坑;底部较为平整,墓坑长9.4、宽2.3~3.3、残深0.1米。D3M1中出土物达百件,有原始瓷、印纹陶、玉串饰和贝壳等。原始瓷多为碗、盂、盘;硬陶多为罐,纹饰为拍印方格纹、曲折纹,并附加堆有泥条弦纹等。从随葬品的分布来看,一般在墓的东侧是原始瓷,中部是原始瓷和印纹陶,西侧则为印纹陶,似乎摆放有一定的规律。

这次发现的五座周代墓中都出土了相对完整的人体骨架,而且每坑都有迁葬现象,这在浙江省极为罕见。

在D1M2,可以明确看出的至少有3具骨架。骨架1位于墓坑中部稍偏东,为直肢葬;骨架2位于墓坑西、南与骨架3相邻,下肢骨保存较好,颅骨仅有痕迹及牙齿,上肢仅残存一小节,为直肢葬。骨架1、2应是相对而葬。骨架3仅残存头骨。

在D2M1,现存有人体骨架4处,骨架1位于墓坑中部稍偏东,似应为直肢;骨架2位于墓坑中部,可以明显看出其骨骼是成堆摆放,应为迁葬。

从上述2座墓的残留人骨分析,其一墓中有多具骨架,且其骨架摆放方式又不同,这给研究古代的葬俗、葬制和土墩的形成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迁葬现象的确认,也很好解决了—墓中有不同时期遗物组合的现象。从D1M2墓底卵石铺面且又基本处在同一个平面的情况看,其墓是一次性建成的。从多具人骨出于—墓的现象,而且—墓中有直肢、有成堆摆放,可以推断,当—墓中的主人死亡后,把死亡于其前的不同时间死亡的、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不同个体迁于此墓,一并埋葬,并把各墓中的随葬品一同迁来,这就解决了一墓中的随葬品在时间上有可能存在差异的事实。

本次发掘墓葬中的第二类,就是以D1M1、D3M1为代表,其墓室均位于丘陵顶部偏下,且墓坑均由红烧土填埋,只有骨骸,无任何陪葬品。可能是有别于第一类即D1M2、D2M1的葬俗,其为祭祀坑的可能性较大,特别从D4的情况看,在M3的上部有2个圆形的坑,其中在一个不大的坑

中发现6具骨骼,而在另一个坑中则是仅一个头骨。而在D1M1和D3M1则是都有规则的坑,且坑中填埋有红烧土,骨架均有灼烧痕迹。

从墓葬位置布局观察,也有一定的相互主次关系,D1M1和D1M2相距不到50米,一个在岗顶,一个在偏下的坡上,处在同一个山脊;D4M1、M2直接压在M3上;D3M1也处在山坡上,其周围没有发现其他墓葬,但M1一侧、此岗的最高部位已经被取土挖去,并不排除墓葬被破坏的可能,所以把这类墓称为祭祀坑是有一定理由的。

从墓坑的形成来看,此类墓葬的形制要规整的多,墓坑底部的卵石也铺垫得较规整。D1M1是先山脊上用黄土堆成一墩状,再在黄土墩上挖出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坑,底部用卵石铺面,四周稍低,成沟状,估计用于排水,而红烧土是在墓坑中直接烧成的可能性较大。

东阳存在诸多大型古墓葬,也曾出土过车马饰、编钟、青铜剑等青铜器,又有“吴宁古城”为依托,说明西周时期东阳人类活动频繁,可能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东阳古墓群的发掘是浙江省考古重要的发现,无论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墓内遗迹等各方面看,这些墓葬的发现,对研究古越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陈荣军 沈岳明)

(九)宁波市鄞州洞桥蜈蚣山汉、六朝墓地发掘

墓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宣裴村蜈蚣山东坡。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为配合鄞州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队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共发现并清理东汉至明清时期墓葬20座,其中汉—六朝墓葬13座,出土一批同时期文物标本。

13座汉—六朝时期墓葬中,砖室墓12座,土坑墓1座,发现时除M1和M3保存相对完整外,其余墓葬均已遭不同程度毁坏。砖室墓形制结构多为平面凸字形,少数为平面刀形和船形,整体墓葬一般由墓室和甬道两部分组成,券形顶,左、右、后三侧墓壁采用“顺丁”结构,前壁封门错缝平砌,墓室与甬道底部铺人字形地砖,墓室后部砌棺床,部分墓葬前端设排水道或铺砌墓室、甬道地砖时四周略凹陷低斜以利排水,壁砖内侧多饰有各种精美纹饰或其组合图案,随葬器物多出土地于墓室或甬道底部,少数发现于倒塌填土堆积中,但M1有部分随葬品则是摆放在甬道上方朝墓室方向伸出的一排平砖之上,显得比较特别,为以前所未见;土坑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被一唐代土坑墓打破。

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两座有明确纪年的汉—六朝砖室墓葬:一为M1,分别见有“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和“太平三年”(公元258年)两种纪年砖,证明该墓建造年代应为三国东吴末期;—为M16,分别见有“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八月造作用吉土”和“中夏里夏丹杨”等铭文砖,该墓建造年代应为元康六年左右(西晋早期),与M1相距仅30年左右。

出土遗物主要见有金串珠、金耳环、银指环、银发簪、玛瑙饰件、铜镜、铜灯、铜香炉、三足铁鼎形油灯、青瓷双耳罐、青瓷四系罐、青瓷堆塑罐(魂瓶)、青瓷碗、盘、青瓷三足炉、青瓷三足砚、青瓷盘口壶、青瓷带盖四系罐、黑釉瓷盘口壶、青瓷耳杯、陶勺、陶灶、黛板、五铢钱等。青瓷器不仅发现数量最多,且多数保存较好,造型比较工整,釉色自然均匀,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蜈蚣山发现的这批古墓葬,时代相对集中于东吴至西晋时期;墓葬总体规模较大,结构比较严谨,用砖工整规范,纹饰相对考究,应是一处比较重要的汉—六朝时期墓地。尤其是两座纪年墓葬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形制、丧葬方式及其分期断代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十) 宁波洪塘卢家山墓地

墓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山下沈村西北约100米处卢家山,东南距洪塘镇3公里左右。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该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建设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共发现并清理商周至六朝时期墓葬16座,其中商周墓葬11座,六朝墓葬5座,出土一批同时期文物标本。

1. 商周墓葬。商周墓葬大部分分布于卢家山向西南方向延伸部分之山脊上,少数分布在其西南侧山坡地带,座落海拔多在20米以上,最高海拔35米左右。根据其埋葬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无坑无穴平地掩埋式土墩墓(5座)和石室土墩墓(6座)两类。5座平地掩埋式土墩墓中,2座封土墩已毁,随葬器物直接叠压于山体表土层下,3座保存状况较好,均埋藏于同一封土墩内;石室土墩墓多破坏严重,结构难辨,仅1座铺底石及四周石壁、封门石等保存相对完好,但未见墓顶石,墓上封土墩也已荡然无存。

出土遗物100余件,器物种类主要有原始青瓷盅、盅式碗、碗、盘、钵、豆、三足炉、罐、盂,印纹硬陶罐、盂、钵,泥质陶罐、青铜斤、玉块、玉管、石斧、石凿等。

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其出土遗物分析,此次在卢家山发现的11座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时代基本涵括了西周至战国时期,其中M4和M8时代相对较晚,可明确属于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它们的发现,为研究当时浙东地区的生产、生活尤其是丧葬形制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 六朝墓葬。六朝墓葬基本都分布在卢家山南段西侧半山腰以下,海拔高度一般不超过20米。墓葬形制多样,主要见有平面长方形、平面凸字形和平面刀形几种,均为单砖室券顶墓。墓顶及前壁封门多已被毁;墓壁多采用顺丁结构砌筑,少数错缝平砌,壁砖内侧一般饰有钱纹、重三角纹、斜格纹、米字纹、人形纹或其组合纹饰;墓底砌法不一,或横直平铺,或铺人字形砖,或将山石凿平后先垫一层黄砂土再横直平铺地砖一层。

出土遗物数量较少,仅10件,均为青瓷器,种类主要见有青瓷盘口壶、碗、盏、钵、托盘、簋、盖孟、杯等。

卢家山墓地六朝墓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建造时往往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多为先在山体上挖出墓坑后,先砌铺

地砖,再在地砖之上砌筑墓室。由于卢家山山岩浅而土层薄,因此还出现了有的墓葬(M1)在建造时直接利用凿平的石壁为后壁,有的(M5)将山体砂岩凿平后先垫一层黄砂土再砌铺地砖以及因山岩阻挡无法凿平而不得不将后壁转折改道(M3)的情况。这些砌筑方式无疑都体现了一定的自身特色。

发现的五座墓葬均未见有明确的纪年材料,墓葬时代只能根据其形制结构及随葬器物来大致推定。其中M2出土青瓷钵与杭州钢铁厂西晋太康八年(287年)墓所出同类器相同,盖孟与宜兴周墓墩元康七年(297年)墓出土盖孟相近,青瓷簋则与上虞蒿坝乡南穴村狗项颈山西晋天纪元年(277年)墓所出同类器近似,墓葬时代可定为西晋早中期;M3出土青瓷盘口壶束颈细长,青瓷碗腹壁较深,具有比较典型的南朝风格,墓葬时代应为南朝时期;另外3座墓葬破坏严重,形制结构时代特征不明显,且均无随葬器物出土,因此可统归为六朝时期。

(十一) 宁波市洪塘卢家山商周遗址

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山下沈村西北卢家山东侧,西距卢家山墓地约200米,东南距洪塘镇3公里左右。2005年1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该绕城高速公路(西段)建设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40平方米,出土一批商周时期文物标本。

遗址文化堆积单薄,从发掘情况看,大致可分为现代耕土层(第1层)、灰黄色粘土层(第2层)和青灰色淤泥层(第3层)等3层。遗物均出自第2层(灰黄色粘土层)中,主要器类见有原始青瓷碗、豆、盆、钵,印纹硬陶碗、罐,泥质陶罐、豆、钵、器流,小陶球以及夹砂陶甗(鬲)足等。

出土器物表面纹饰丰富多样,主要见有绳纹、叶脉纹、席纹、折线纹、戳点纹、弦纹、方格纹、斜格纹、水波纹、回纹以及方格纹与折线纹、方格纹与叶脉纹、方格纹与圆圈纹、叶脉纹与圆圈纹、回纹与云雷纹、回纹与折线纹、斜格纹与戳点纹、弦纹与云雷纹、回纹与方格纹及圆圈纹等的组合纹饰。纹饰大多拍印于泥质陶和硬陶器表,原始青瓷上仅见弦纹、水波纹和斜格与戳点纹组合等少数几种纹饰,夹砂陶上则仅见绳纹一种。根据对所有出土陶片的统计结果显示,器表有纹饰者占到全部出土陶片的40%以上,余者均为素面陶。

根据出土器物形制、陶质陶色及其器表纹饰等分析,卢家山遗址时代应为商周时期,这与遗址西侧不远处卢家山墓地发现的商周墓葬时代大体一致。但因遗址文化堆积单薄,同时在发掘探方周边进行的密探显示,该遗址分布范围有限,总面积估计不超过200平方米,如此单薄且规模不大的遗址与卢家山墓地发现的较多的同时期墓葬相比无疑悬殊过大,该遗址的性质及其与墓地间相互关系如何尚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十二) 温州市发现唐五代北城门遗址

2005年,浙江省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完成对温州市区朔门古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获得重要发现。发掘

工作历时50天,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掘出城门两侧遗存墙体及基础,并发现保存完好的道路。经研究考证,此城门建于晚唐五代时期,属温州古城的北城门,是温州市区首次发现的古城建筑遗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城门面朝正北方向。城门洞阔3.9、进深7.85米。城墙结构为中间填土夯筑,两侧包砖。砖墙均用青砖错缝平砌。城墙始建时墙址宽5.93米,后经3次增筑,每次都把墙体增厚。现存城墙址宽7.85、外侧砖墙宽2.32、内侧砖墙宽1.33、中间夯土层宽4.2米。现城墙残存高度0.86、基础深1.42米。城墙两侧外壁略向上收分。砖层之间用黄泥砌筑。夯土层用青泥和黄泥相间重叠组成,青泥层每层厚约5厘米,黄泥层每层厚约2厘米。二种土质较纯净,含部分青瓷片,城门洞部分的城墙基础构筑坚固,底层为砖块瓦砾层,之上依次为黄泥层、大石板、黄泥层、青砖垒砌层。大石板呈紫红色,每块边长约0.68、厚0.08米。少量城砖在端面印有一字,多为“四”字,少量为“一、二、三、十、日”字,多数为阳文,个别为阴文。

贯穿城门洞的道路为大青砖立砌,路面保存基本完好。城门洞内路面靠北位置有一条宽25厘米的凹槽,推测此处系安放石门槛之用,即城门所在位置。凹槽北侧路面宽3.38米,南侧路面宽3.9米,内外相差0.52米,形成城门洞外小内大,防御时易守难攻,符合古代城门建造规律。各地层出土遗物有瓷片、钱币、动物骨骼、木器残件等,以瓷片为主。城墙基础附近、夯土层内以及大青砖路面上下地层出土的

瓷片多为唐代早、中、晚期,少量为五代时期,根据出土瓷片的层位和年代,城墙和道路应建于晚唐五代时期。

在唐五代路面之上还有多层路面。在距唐五代路面0.5米高处铺有一条小青砖道路,尚有二段遗存,路面有很多经长期碾压磨损形成的高低不一的凹坑。在城门外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青砖道路,在当时可能属于城外道路。根据出土瓷片的层位和年代分析,唐五代路面之上的小青砖道路应初建于宋代,城门外呈东西走向的小青砖道路应建于宋代。

温州古城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城址位置一直未变。据文献记载,宋元明清历代均有修缮增筑。温州北城门有二座:一座明代称拱宸门,清代称望江门;一座称永清门。此次发掘的北城门,其位置与明清时的拱宸门、望江门均相吻合,应属唐五代时期的北城门。

此次发掘的北城门遗址,建筑规模较大,筑城技术成熟,充分反映出唐五代温州社会生产力以及建筑技术水平。它的发现对研究温州地方史具有重要价值,是温州市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蔡钢铁 梁岩华 黄培量)

(特约编辑:徐 菁)

(责任编辑:周广明)

编者按:

《南方文物》立足于南方,坚持质量为本,是展示南方地区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从2006年起,本刊开始创办“‘发现的快乐,发现的意义’——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这一专栏,对每一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予以汇集,以让学界和社会各界及时了解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并充分展示南方地区考古工作者在探寻中华文明演进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栏目的顺利开辟,得到了南方地区诸考古单位的鼎力襄助,他们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考古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排名不分先后)。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文物报的相关报道,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希望这一专栏能够继续得到考古界同仁一以贯之的关心和支持,相信在您们的支持下,这一专栏一定会越办越好。最后,衷心祝愿南方地区文物考古事业兴旺发达!学术研究硕果累累!